

回忆亚东图书馆

YA DONG TU SHU GUAN

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柳肇瑞

封面设计：潘宏生

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6,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书号 7259·005

定价 0.79 元

序

王子野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排出清样后，编者寄给我看看并求作序。我早年同这家书店曾有过一段历史关系，对它的情况也知道一些，读了清样之后不能不说几句话，因此对编者所请欣然应命。

亚东从成立到停业恰恰是四十年，如果把它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历史也算进去，应该是整整五十年（一九〇三年——一九五三年）。实际上作者的回忆正是这么算的。

亚东是一家很小很穷的独资经营的书店，五十年中先后进用职工不过五十来人。但它在我国近代新兴出版业中的地位却不能小看。它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中产生的，所以它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称它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它的草创时期，从“五四”到大革命是它的黄金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它的后期出了一些坏书，影响不好。但从书后所附的出版物的目录来看，好书还是不少。其中特别是《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等几种文集，一批标

FH42/20

点整理的古典白话小说，“五四”以后涌现的一批新诗集以及蒋光慈等人的一批早期的革命文学作品曾经风行一时，有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应该肯定它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贡献。在《新青年》、《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刊物的出版、推销工作上，也是很有成绩的。

作者的回忆比较全面，比较完整，每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基本上真实可信。由于亚东与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知名人士有很深的关系，交往频繁，回忆中所讲的都不是仅凭记忆，而是有物为证，到处引用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这是很可宝贵的。特别是陈独秀的狱中来信一束，对研究陈独秀的生平是大有用处的。这批信大约有五十多件，前年据汪无功（汪原放之子）同志来信说：原件已在“文革”中丢失，无法寻找。真可惜！

书中多处讲到这些名人的遗闻轶事，也不是得之于道听途说，而是都有比较可靠根据的。例如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恳切要求陈独秀出来担任文科学长，几次登门拜访（当时陈尚在上海编《新青年》，因事去北京，住在旅馆里），有时候一早就来，陈还没有起床，蔡不让茶房叫醒他，只让拿张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外等候。这件轶事是根据亲见者汪孟邹的回忆写的（见本书三五—三六页）。又如陈独秀与胡适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都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日记整理出来的（见本书九四—九五页）。

关于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出版工作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过去材料很少。本书对上海的新青年社的情况以及它迁移广州的经过等都有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的出版重心移到武汉，当时成立了中央出版

局,先是张太雷同志担任局长,后由汪原放接替(见本书一一六一—一七页),这段史实似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出版史上还有许多问题过去都搞不清楚,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可贵的材料。例如《青年》杂志是如何发起的,后来又为什么改称《新青年》(见本书三一—三三页);又例如《向导》周报是如何创办起来的(见本书七九—八〇页),作者都引用日记材料作了较详细的介绍。此外还有五四时期几种《文存》的编辑出版经过,“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的标点、校读和出版情况,都是出版史料研究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这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因为标点白话小说的工作就是本书作者所做,所以讲得最清楚。有些事要是他不讲,谁也不知道。例如陈独秀为《儒林外史》写的序原来是汪原放写的,经过陈独秀修改了几个字就署了陈的名字发表了。这样的事如果作者不作交代,将来的版本学家就无法弄清。还有商务的《万有文库》,以前都知道是王云五搞的,读了这部回忆录才知道最初的倡议者是胡适,得到高梦旦和张元济的赞同才搞起来的(见本书九九页)。

总之,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书,研究近代革命史和出版史的人从中可以发现某些别处见不到的有用资料。还有这部回忆录的写法也别具一格,一忽儿引一封信,一忽儿引一段日记,一忽儿来一段对话,写得生动活泼,读起来引人入胜。

假如研究出版史有一个学习前人经验的目的,那么我以为在亚东这家小书店的历史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对待出版工作严肃认真。这主要表现在出版“亚东版”古典白话小说上。亚东在和当时上海滩上搞“一折八扣”粗制滥造书的书商作竞争中虽然吃了败仗,仍然坚持自己的

谨严作风，决不为争夺市场而去追踪粗制滥造的恶劣行径。宁可卖不掉，也不能自毁声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第二，讲究工作效率，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加快出版周期。在这部回忆录中讲到，一部上千页的《水浒传》从标点、校读到付排、印制成书，先后只有八个月，而标点、校读工作只有两个人担任。《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版也是同样高速度。虽然速度这么高，却又能保证质量，这真不容易。鲁迅对这些标点和校正的白话小说作了公正的评语：“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一九四七年十月有位署名萧聪的评论家在《大公报》写了文章表扬“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也特别优美”。说亚东版的书籍错字比较少是对的，说没有错字不符合事实。我最近查阅《胡适文存》三集，就发现了错字，连标题的头号字也错了几个。校对完全不出错字是很难的。

三十年代初我在亚东工作的几年，对他们工作作风中的以上两条优点是深有感受的。也许是因为年轻时受了这种感染，所以毕生对出版工作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亚东的主人汪孟邹老人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对新书业发生兴趣，同盟会革命来了，他又同情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他逐渐倾向同情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好，但是他怕得很，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老实话。我在上海的几年，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汪原放是一位学者，经常埋头校读古书和翻译。这两位出版界的老前辈曾经给我许多有益的教诲，支持和鼓励我业余自学，介绍我读进步书刊，赢得我对他们的尊敬。汪孟老我在一九三四年离开亚东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一九五〇年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时，在特邀

代表中有他的名字，我多么盼望能在北京和他见面。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堪旅途之劳，终于没有能来。同汪原老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去上海参加科普创作会议时。这时他已达八十一岁高龄了。见面之下，高兴之极，晤谈三小时以上，毫无倦容，分别时还约定下次到上海再去看他。想不到两年后他竟与世长辞，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写这篇序文时不能不怀念这两位可敬的老前辈。

最后再交代一下本书前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的来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遗物，去年我的侄儿回绩溪老家去找来的。照片前排左起第四人程健行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旧学很有修养的人，工作认真踏实。本书中提到他帮助汪协如校点《缀白裘》，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我查《缀白裘》的《校读后记》，的确是这么讲的。可惜他在一九三〇年春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五岁。父亲去世后留下寡母和五个孤儿。我居长，才十四岁，最小的弟弟才三岁。不用说，我们家庭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于是托人将我介绍到亚东去当学徒，这样我就在亚东工作了四年（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四年）。在亚东四年的业余自学生涯对我一生影响至大，它不仅使我学到了基础的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革命思想，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我后来参加革命的思想准备莫下了第一块基石。

书后的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单中的程敷铎就是我的原名。改用今名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开始的，姓王是随母姓。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

(1928年9月24日)

自左至右,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在我国现代新兴出版业中起过相当影响的一家书店。它的主人、汪原放的叔父汪孟邹，同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知名人士有很深的关系，交往频繁，在汪原放的这本回忆中多所涉及。难得的是，这些回忆不仅凭记忆，而是有物为证，到处引用日记、札记、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因此，它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史、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研究，都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目 录

序 王子野(1)

第一章 皖南三青年

先抄一封旧信(1)——“弃书学剑亦英雄”(3)——交得一班好朋友(4)——三兄弟剩下的一个终于“抛剑经商”(6)

第二章 芜湖“洋书店”与《安徽俗话报》

出门“寻生意”(8)——为什么人们叫它“洋书店”? (9)——闲谈过去的事情(11)——开办《俗话报》的缘起(13)——所谓“洪水猛兽”(15)

第三章 到上海办书店

武昌炮响以后(18)——惠福里—平和里—福华里(21)——《亚东宣言》和初期的出书(23)

第四章 《甲寅》杂志迁沪,《青年》杂志

创办

一则“秋桐白事”(28)——《名家小说》出版(30)——《新青年》的诞生(31)——仲、孟北上(33)

第五章 “五四”前后

出弄堂,上马路(37)——经理北大的出版物(38)——《建设》杂志与朱执信(40)——《少年中国》、《新潮》及其他(43)——乔年出国(46)——大叔吃了一趟官司(49)——仲翁被捕(50)——《尝试集》与《三叶集》(52)——“新青年社”独立(53)

第六章 “亚东版”古典小说

要出标点、分段的《水浒》(56)——适之兄南来(60)——仲翁提携后进(63)——三封信和一席谈(66)——鲁迅先生的误会(69)

第七章 几种“文存”的出版

《胡适文存》带出了《吴虞文录》(71)——出版了的和夭折了的《独秀文存》等(75)——这两年还出了哪些书?(78)——十年纪念(81)

第八章 编辑所正式成立后的头几年

出书与组稿(83)——家事和店事(88)——

与仲翁、适之兄等的往还(91)——又出了
三十几种新书(103)

第九章 大革命高潮中

乔年回上海(105)——“我希望加入共产党”(106)——上海总工会公开(108)——
和赵容同志接头后(109)——去武汉(110)
——开始在《民国日报》工作(112)——见
到陈仲翁(113)——国民党中央党部会上
(113)——二次北伐誓师典礼(114)——外
部的工作和内部的工作(116)——民国日
报馆(117)——中央出版局(118)——长江
书店(119)——长江印刷厂(120)——宏源
纸行(121)——史精益拿田契去卖(122)
——风声一天天紧了(123)——要一张“护
身符”(126)——陪陈仲翁回上海(127)——
回到上海以后(130)

第十章 盗版、禁书及其他

重排《红楼梦》(133)——乔年牺牲(134)
——五年新出的书(138)——出现了盗版
(141)——禁书种种(144)——叔侄相左
(148)——又去北平(151)

第十一章 狱中来信一束

陈仲翁又被捕(155)——去南京看望
(156)——关于章律师的答辩(159)——关

于买书(160)——关于亚东的出书和经营
(164)——关于重印《独秀文存》(168)——
关于朋友交往(170)

第十二章 江河日下

一九三二到三四年的出书(173)——营
业很差(177)——“群益”的保发生问题
(183)——大叔回店后(186)——又一次北
平之行(188)——“八一三”以后(193)——
仲甫从出狱到病逝(198)——故乡四载
(201)——回到上海(203)——从解放以后
到歇业(210)

收 尾 (214)

附 录

亚东图书馆出版物目录 (216)
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录 (229)
1919 年至 1935 年亚东图书馆收支情况 (230)
1934 年亚东图书馆国内外代售处一览 (232)
汪原放先生传略 (240)

编后记 (243)

第一章 皖南三青年

晚清时，皖南山城绩溪如果没有三个青年先先后后的到南京求学，就不会有芜湖科学图书社；没有芜湖科学图书社，卖过图书、仪器，出过杂志、新书，也一定不会有上海亚东图书馆。

先抄一封旧信

我想来想去，不如先抄一封哥哥给弟弟的信在下面。这是一封几十年前的旧信了，是先君希颜先生(1873—1902)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写到安徽绩溪老家给先大叔孟邹先生(1878—1953)的。用这封信开头，我认为还妥当，因为接信的人就是后来先开芜湖科学图书社，后开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先大叔。这实在是封长信，且只录一节罢。

孟邹吾弟左右：

兄自二月初四日(1902年3月13日)到堂，各种功课，知新温故，两无所有。东文虽较西文为易(日本语言难学，与西语同，而文字则较易，堂中分文字、语言为二班，兄是在文字班内)，而每日为时太促，进功颇迟。惟在上海购得新书、新报数种，日夕观览，大鼓志气，大作情

神，大拓胸襟，大增智慧。其得力最多者为日本新出之《新民丛报》^①，其宗旨在提倡一国之文明，其体例则组织学界之条理，中外双钩于笔底，古今一冶于胸中。吾谓学游六年，不如读此报一年；读书十卷，不如读此报一卷。此报一出，而一切之日报、旬报、月报，皆可废矣。何则？他报之能开风气者，述政艺不为不精（如《汇报》、《政艺通报》等），唱民权不为不烈（如《国民报》、《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等），论外患不为不切（各报皆然），置时局不为不快（亦各报所有，而惟《中外日报》、《选报》、《清议报》、《国民报》为最），讲学术不为不新，而究未有本天演之公例，辟人群之义务，洞环球之全局，澈教育之根源，如《新民丛报》者。

凡兹所言，弟未之见，亦难深信，兄已屡读而亦不能殚述，故虽价目不廉（每月两册，而字数不啻三册之多，连邮每份五元二角四分），兄既自购一份，又为吾弟另办一份，负欠典衣，在所不顾，而此报终不可不阅也。……

自今以往，吾辈但无冻馁，不以富贵为可羨，不以贫贱为可忧，不以世俗之毁誉关心，不以浮名之得失为虑，努力求学，努力做事，务养成二十世纪上一个人之资格。盖世界不同，立于世界之法亦自不同。弟读《天演论》，未通其意，望再读一过，并俟此报寄到，参观互证，当必恍然有悟。是耶？非耶？容与我弟辩难之。

① 《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梁启超主编。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1907年冬停刊。初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后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长信只录到这里为止。这封长信是先君在1902年3月25、26日写的。真很不幸，便是那一年的夏天，先君竟一病而去世于江南陆师学堂。

“弃书学剑亦英雄”

我为什么开头要先抄一段长信呢？

是不是表示，在那时，他们兄弟的思想是相当前进的呢？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接着是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那以后的一段年月里，《新民丛报》的影响，真很不小。单这一封信，也就可以看得出，那时关心国事的文人学子，只要读到《新民丛报》，没有不是如得异宝的。先大叔后来读到这个杂志，同样是如醉如痴。至于他们后来并不赞成君主立宪，那是后话。还有《天演论》，在那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凡是爱国的，要向新的方面努力前进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也没有不受它的影响的。

先抄这封长信，还因为要说到科学图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实在不能不先说到这两个书店的创办人的家庭情况；说到这一点，事实上又应该先说到“弃书学剑亦英雄，兄弟商量意见同”（先君句）的三个兄弟，怎么先后出门求学的往事。

先君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南京求学的。他是山城绩溪相当早的一个出门讲求新学的人。先君和先大叔都是二十岁左右中秀才的。早年他们同嫡堂的先二叔杰夫先生一起在家，由胡晋接（子承）先生教读。据先大叔回忆：业师胡子承先生非常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思想，常常叫我们要多读历史、地理以及新书、新报。后来，先君考进了江

南高等学堂，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后因高等学堂要多年才能毕业，经济来源有问题，加之学堂有裁并之说，先君乃于1900年考进了专讲中外兵法、旁及普通诸艺的江南陆师学堂。这就是先君当日家信中说的，“所谓学书不成，弃而学剑，亦大丈夫所不得已耳”。

陆师学堂课程有枪法、步法、军器、算学、测量、绘几何图以及外文等。先君进堂以后，觉得很好，又要先二叔去学。后来先二叔生病，不得不退学，他又要先大叔去一同求学。那时候，先君和先大叔时常通信，还交换看日记。据说，有一天，学堂总办到先君房里去，恰好看信和日记，总办很欢喜，说是可以免试入学。先大叔就是这样中途插班进了江南陆师学堂。这已是1901年（辛丑）春天的事了。不料那一年的九月，因父死，母又年老，先大叔又只好停学，留在家中。

交得一班好朋友

先君兄弟在南京读书时间虽短，却在那里交得一班好朋友。据先大叔回忆，先君在陆师学堂时，章士钊（行严）^①、赵声（伯先）^②都是同学，陈仲甫（独秀）^③是朋友。

赵声原来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后日渐倾向反清革命，为学堂监督所不容，乃自动退学，在陆师学堂旁边一个寺里租了一间房，读书，写字，非常用功。据说，陆师学堂的总办一次带了学生们到那里去玩，看见赵声很英武，就让他免试进校了。

至于结识陈仲甫，先君1902年4月23、24日写给先大叔的一封信中讲到：“善乎皖城志士程仲辅氏有言曰：（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

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

信中说的“程仲辅”，就是陈仲甫先生，也就是陈独秀先生。

还有一信，说到“今日皖城名士陈仲辅来会”，接着又说他只“十八岁”。我记得当初读到，非常诧异，怎么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可以称“名士”呢？这封信一时翻不到，只有待诸异日了。

《独秀著作年表》载有：

1901(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二十三岁。

在安庆与葛温仲等演讲反清，被缉，逃宁。识章行严，汪希颜。

1902(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二十四岁。

留日。

-
- ①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02年入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等。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后在上海任律师。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1973年病逝。
- ② 赵声(1881—1911)，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人。1902年底在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次年游历日本。1906年在南京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与黄兴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起义失败，忧愤成疾，1911年5月病逝于香港。
- ③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9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从先君家书看，与陈仲甫先生相识可能还在1901年之前。我疑陈仲甫先生在十八九岁时，到南京乡试，或和先君有过来往。不然，先君信中明明有“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的话，畅谈“训蒙”、“德、智、体”等等，当更在此之前；何况还有“十八岁”的“皖城名士”来会的话头呢？

记得我在蒙馆里不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就是因为先君最相信“皖城名士陈仲甫”的话，买了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寄给我们做课本，再后来读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了。

三兄弟剩下的一个终于“抛剑经商”

先君与先大叔等之间频繁的书信往返，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一是介绍新书新报。诸如《新辑地理问答》、《长江流域现势》、《泰西新史摘本》、《普通新历史》等等。兄弟之间在读了《新民丛报》、《天演论》后，还经常交换他们读后的感想与收获。

二是主张女子不缠足，要读书。从自己家的女孩子做起。先大姑的一个女儿就成了家乡第一个天足而又读书的女子。

三是鼓励交好朋友。先大叔孟邹先生同后来一起创办科学图书社的周栋臣交游，先君去信说：“周栋臣开通有志，亦吾郡仅见之士。既愿与弟往来，自当与之联络，以收攻错之益。《新民报》与《选报》，渠曾见过否？弟可劝其购阅”云云。

四是倡导经营书报，组织学堂。先君慨乎言之曰：“男儿

生当是时，欲稍植事业以卫宗邦，稍争名誉以光历史，殆舍经营书报、组织学堂以外，无进身地矣！”谈到曾倡议办《兵学报》，未果；拟创《女学白话报》，“尚未定议”；支持先叔在家乡设一不取束脩之小塾的拟议，等等。

1902年6月，先君给先叔的信还讲到：“兄现译明治历史中《中日战争小史》一书，意欲于暑假内成之，乘秋间乡试设法印行，以为我国人明耻之一助。”

译这部书的宗旨在于作为“国人明耻之一助”，极是好事。可惜，先君译未半而病逝，书也终于没有出版。

先君去世，同学有不少挽联、挽诗。这里只录章士钊的一首《哭希颜》：

狼豕纵横二十周，男儿新换好头颅。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铁血精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愿从天假杀人柄，豕尽中朝旧辈流。（末用放翁句）

同学友生章士钊初稿

先君去世之后，相隔只三年，1905年秋，先二叔也病逝了。“弃书学剑亦英雄”的三个兄弟，只剩下先大叔孟邹先生一个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以下要来谈一谈芜湖科学图书社了。也就是要谈一谈“弃书学剑”之后剩下的一个秀才终于“抛剑经商”开设的那个新书店了。且从我自己进店说起吧。

第二章 芜湖“洋书店”与 《安徽俗话报》

孟邹先生回忆：“一九〇三年，我的业师胡子承叫我的朋友周栋臣出来邀了一千二百元股子，叫我到芜湖开一个科学图书社。第二年春天，仲甫来信，要到芜湖办一个白话报，他便背了一个包裹，拿着一把雨伞来了。这个报，一班老辈，已经认为是‘洪水猛兽’了。”

出门“寻生意”

从前，章衣萍兄说过：“我们那个绩溪，抬头看看，天只有一只碗那么大。”绩溪县多么大，他形容得最好。

绩溪是山区，又是小县，有钱人很少，无钱人很多。不问你走到那里，听见人们谈心，谈的总是“出门”、“寻生意”。

我也一样，在思诚学堂还没有毕业，家中早就谈寻生意出门了。我心里想，读书也好，可是没有钱，读不下去，寻个生意也好。有人说：

“别人家寻生意难，他家容易。他总是进书店的居多。”

“他顶好，不用寻生意，现成的，只管去。有个叔叔在店里，叔侄在一块，多少好！”

我心里也很高兴；我的大哥在陆军小学，学本事，学父亲；我进书店，学大叔，倒很好。

我在思诚初等小学毕业那一年放年假时回家，大叔不久也来家过年了。过了年，我就跟大叔一道到书店里去了。这可高兴极了！

为什么人们叫它“洋书店”？

我们到了芜湖，由徽州码头上长街，进了科学图书社，觉得这个店真很可爱，和我所想的大不相同。我在绩溪城里看见过老书店，有人坐在柜台上订书，我去看看，无非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再是“四书”，店堂又不干净，无处不是灰朴朴的，很令人讨厌。而科学图书社，大不相同，很干净，到了夜里，很亮，因为有电灯。电灯比洋油灯、灯盏，真有“天渊之别”。

这里索性把房屋的情形说一说。于今并没有那个店了，可是在我的脑子里，闭目一想，仍旧还是在眼前。

科学图书社的门面不阔，只有一开间，阔不会有两丈，而长倒有十倍左右。

门口一排是六扇大玻璃窗，当中两扇常开。夜里上店门，上在玻璃窗门外面。因为有玻璃窗门挡住，所以店门只能朝外开。俗话说：“店门朝里开，元宝滚进来。”科学图书社不管，实事求是，只能朝外便朝外开了，这也是破除迷信之一。

第一进是店堂，进门反手有不大的陈列柜，上面有书橱，

陈列新书。差不多在店堂的中央，是直柜台，约有三丈多长。柜内有书橱，放着手头要卖的书。顺手，柜外，上面是玻璃书橱，下面是玻璃陈列柜，陈列仪器文具。

进到第二进，柜外有两扇短门，一般顾客到门为止了；只有批发的可以进入内堂。正对大门，反手靠墙，是管内账的坐的位置，还有管事的办事台等等。

第三进最长。当中反手有天井，天井对面象个小客厅，墙上挂有小中堂，两边是对子。后来挂过陈仲翁^①写的大字的对子，句云：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再进去还有第四进，还有楼上，不一一说了。

还有什么要说呢？不错，还要说几句：

1. 店里没有财神菩萨的龕座。
2. 店里也没有“老太”的龕座。
3. 店里从来不烧金银纸。

这几件虽是小事情，可是加上店门朝外开，竟得到一个“洋书店”的名称。

第二件要解释一下。“老太”是什么？就是狐狸。芜湖人，谁都知道。据说“老太”是不能得罪的；如若不然，它会报复。所以芜湖的店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恭恭敬敬地供养“老太”的龕座。可是科学图书社始终没有供养过“老太”！非但没有“老太”的龕座，还组织过打“老太”的“军事行动”呢！

^① 陈仲翁，即陈仲甫（独秀）。在这本回忆录中，大都称陈独秀为“陈仲翁”或“仲翁”，现均保持原貌，未加改动。

那时候，芜湖街上讨饭的很多，有的很凶。可是，到了科学图书社门口，如果还要瞎讨，甲头会过来说一声“这是洋书店”，他登时便会到别家去讨的。

闲谈过去的事情

科学图书社主要代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兼营仪器文具。它开设于1903——清光绪二十九年。我到店是1910——清宣统二年，算来已经开了七个年头。我进了店，才知道我的大叔是管事的，是经理。帮着他的还有周植夫伯、张衡山叔，再是已经出师的鲍惠卿兄、程宝书兄、周汝珍兄，以及先我一年进店的章灶余兄。在我以后进店的学徒还有许潜如、程幹宏。

后来听大叔说起，他是从贩书做起的，到安庆赶过院考，到南京赶过乡试，去卖新书。到1903年冬天，科学图书社才开张。开张三天，只卖去一本日本人著的《商工理财学》。当初，真是创业维艰。

那时，店里卖的，除教科书外，还有许多新书报，有的是反清的，如《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苏报》、《复报》等，还有许多创作的小说、翻译的小说、名人小传等等。工作余暇，我们可以看，不过要包好，不能弄脏。

店里的事，有时闲，有时忙。闲时，大家就会闲谈起来。

有次忽然有人说：“从前出过《安徽俗话报》，不知道何以后来不出了？”

有人回答：“主笔的教书去了。”

七嘴八舌了：

“不是的，去革命了。”

“革什么命?”

“革满清的命。”

“到孙文那里去了。”

“不怪哩。听说有个柏文蔚^①，在后楼躲过一个多月哩。”

“怎么不曾把他捉去?”

“风声不好，又走了，又换了地方了。”

“听说赵伯先也来过?”

“怎么不来过? 来过的。他们常常要在后楼谈天。”

“吴樾炸五大臣^②，在这里动身的。这里也不知道他要去炸五大臣。据说，他也是一个穿马褂袍子的人，文绉绉的。真看不出是一个大好佬! 真了不得!”

有一次又谈起陈仲甫先生办《安徽俗话报》。

1904年陈先生来办《俗话报》时，只有二十六岁。没有辫子，因为在日本留学时已经剪掉。怕惹人注目，所以又养，养得又不很长，又不能打辫，只好披着。

《安徽俗话报》是在上海印的。寄到时，陈先生最忙，发报，打包，送邮政局去寄，他做得非常起劲。

从陈仲甫又谈起柏大头(柏文蔚)、赵伯先。

“有一次，汪先生(指我的大叔)谈起，说他走镇江经过，下

① 柏文蔚，号烈武，安徽寿县人，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第一军军长，又曾一度任安徽省都督。

② 吴樾炸五大臣，为清末震动一时的刺杀案。1905年6、7月间，清政府为欺骗舆论，决定派载泽、绍英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说是“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满怀反清革命思想的吴樾，为击破清政府的骗局，于9月24日五大臣登车出发时，怀揣炸弹，赶往前门车站，炸弹引发，载泽、绍英受伤，吴樾以身殉难。吴樾(1878—1905)为保定高等学堂学生，赵声之好友，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亦有交往。

车去看过赵伯先。赵伯先真很英武，两朵眉毛，与众不同。坐了一会，赵先生说：‘烈武正在上操，我们一道去看看他吧。’那时候，柏先生还是营长。”

“赵伯先是什么位置？”

“据说是标统了。”

“据说，赵先生他们和孙文都有关系。”

“是的，说是同盟会。”

“不怪哩，陈先生也是剪掉辫子的，一定是革命党了。”

“不管他们那里去了，将来总有一日要出头的。”

开办《俗话报》的缘起

关于出版《安徽俗话报》的事，我从大叔手订的书信中看到一封胡子承先生写给他的信说：

陈君重甫（即仲辅、独秀先生）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然内地风气至为阻塞，加以专制之官吏，专与学堂、报馆为仇，若无保护而行此于内地，恐后祸未可预测耳。盖办报有二种：如南北官报之官样文章，实无益于群治；反是而欲输入东西政治文明之思想于吾群，则必受官吏之凌辱，不卜可知。

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先生）会面时当可妥商也。

结果怎么样呢？

芜湖科学图书社开张的第二年，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2月，《安徽俗话报》第一期就由科学图书社出版发行了。

陈仲甫先生为什么要办这个报呢？

第一期上他用“三爱”的笔名写的一篇《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说得很明白。这里可以节录一段：

唉！人生在世，糊里糊涂的过去，一项学问也不懂得，一样事体也不知道，岂不可耻吗？……因为想学点学问，通些时事，个个人都是要上学攻书，这岂不是一桩难事吗？

但是有一样巧妙的法子，就是买几种报来看看，也可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这就算“事半”而“功倍”了。但是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

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所以各省……就做出“俗话报”，给他们的同乡、亲戚、朋友看看。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还没有这种“俗话报”。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都看着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象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的。……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有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钱来，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

我这种“俗话报”的主义是很浅近的，很和平的。大家别要疑心我有什么奇怪吓人的议论。

我开办这个报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

好叫大家放心：

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睡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

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讲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

这就是缘起。

所谓“洪水猛兽”

《安徽俗话报》被当时的一班老辈看作是“洪水猛兽”。何以如此呢？

仔细算来，这个半月刊出世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子。所以详情不得而知。好在后来我在绩溪老家一口黄书橱里，偶然翻得了十几本破旧不堪，但于今实在不易得到的《安徽俗话报》，还有大叔孟邹先生保存的若干旧信等，使我可以据以作一点概略的介绍。

《安徽俗话报》是十八开本，每本二十页左右。月出两期，朔望发行。每期印四千本。每本售价五十文。由章行严（士钊）先生办的上海大陆印刷局承印，问事的是程吉甫先生。总发行所是“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报上印出的代派处有五十八处，除安徽各地外，有上海、北京、保定、南京、镇

江、沂州、长沙、沙市、南昌、新民屯等地。报社就在科学图书社。

《安徽俗话报》的内容，它的《章程》写明共分十三门，为：
1.论说。2.要紧的新闻。3.本省的新闻。4.历史。5.地理。
6.教育。7.实业。8.小说。9.诗词。10.闲谈。11.行情。
12.要件。13.来文。

在《安徽俗话报》上，陈仲翁常用“三爱”这个笔名发表文章，“论说”一栏大都是他的手笔，其他各栏也有他写的。就我看到的残缺不全的《安徽俗话报》上，陈仲翁写的就有：《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中国史略》（原名《中国历代的大事》）、《枪法问答》、《中国兵魂录》、《亡国篇》、《恶俗篇》、《黑天国》（章回小说）等。这里边，有倡导改良教育的，有谴责封建伦理道德的，有激励爱国热情的，还有呼吁挽救民族之危亡的，等等。除陈仲翁自己写的以外，各栏好文章当然也还不少。俗话报上还登过“安徽公学”的招生广告，登过“安徽调查会”的《章程》，提倡作社会调查，附有详细的要求调查的项目。举凡官府、民政、学堂、宗教、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等，诸如监牢的情形、钱粮的弊端、田赋的额数、地方卫生情形、会党的种类及现象、新旧各种书报的销数、各种寺院若干、庙产若干、洋商的势力等等，均在调查之列。

胡子承先生1904年写给科学图书社的一封信讲到：

至《俗话报》出版以来，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多訾议。如“自由结婚”等语，尤贻人口实。其实此时中国人程度至“自由结婚”尚不知须经几多阶级；若人误于一偏，不将“桑濮成婚”概目为文明种子乎？

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肯随声附和此报，

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重翁（陈重辅，即陈独秀）等商之。

胡子承先生主张：“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理由是：“现在民智低下，胆子甚小，毋令伊惊破也。”

胡先生是很赞成新思想的人，尚且抱这样的看法，可见《安徽俗话报》在当时确是惊世骇俗的了。不过，胡先生对陈仲翁还是一直很敬重的，他在给科学图书社同人的另一封信中说：“重辅兄血性过人，于社事尤为关照，凡事请与酌行也。”

《安徽俗话报》于1905年间停刊了，一共是办了二十三期。记得我大叔说过：

“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说“教书”，是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

科学图书社大概在1904或1905年，还出版过胡子承先生编的《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共四册。听店里人谈起，销场并不好。

以上说的是科学图书社初期的两种出版物。可惜眼前都无实物可查，只有略说如上。

第三章 到上海办书店

辛亥革命后，柏文蔚（烈武）当过安徽都督，秘书长是陈仲甫。我大叔去安庆看过他们。陈仲甫对大叔说：“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一九一三年，亚东图书馆就在上海诞生了。

武昌炮响以后

“都已经占领了！统统都占领了！”

“你拿出画的地图来看看。”

“你看，武昌、汉阳、汉口，不是都已经完全占领了吗？”

“许多地方都响应了。你看，这里宣布独立了！这里也已经宣布独立了！”

“满清一定要完了！”

这是辛亥革命时店里的议论。正谈得起劲，我的大叔走过来了，说：

“这两天要当心。店里有事要出门，要把辫子戴好。不好寻开心！”大叔这样讲，是因为我和许潜如早些时已经剪了

辫子，而后又在帽子上装上了一根假辫子。

有一天夜里，大家都睡了，是半夜里：

“不对，有枪声！”

劈，劈！啪，啪！响了好大一阵子。我们都起来了。

“轻轻的摸到前面门缝里去张一张罢！”

“我到楼上窗缝里去瞄一瞄！”

“是革命军上街来了！臂上缠着白布！有的很年轻，是学生军。黄军衣，臂上缠着白布，我看清楚了！”

“有的人家已经开门了。”

“我们也可以开了。”

“来，买白竹布来，挂旗。”

我们的“光复神州”的大旗横挂到街上去了。

一下子，满街都是白旗，有的上写着“还我河山”，有的上写着“推倒满清”，有的上写着“革命成功”。

过了些时以后，又听到议论：

“安徽都督是柏文蔚^①，就是柏烈武先生！秘书长是陈仲甫先生！好呵！”

“出头了！我早就说过：一定要出头的！”

“革命的人都出头了！”

1912年年终时，我回绩溪老家去了一趟。到家不久，消息传来，我的大叔做了“徽州特派员”，将到绩溪，再上屯溪。

大叔到家后，我听说胡子承先生做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先君在陆师的同乡卢仲农老伯做了屯溪茶釐局长，还

①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告对清朝独立。但执掌政权的政治势力很复杂。安徽最初由原来的巡抚孙家宝当都督，十二月下旬改由孙毓筠任都督，再以后才由柏文蔚任都督。

有一位汪孔璋先生做了巡缉队队长，周栋臣先生做了省议员。

后来又听见大叔和栋臣先生谈心，才知道大叔已到安庆去过，看过柏文蔚先生、陈仲甫先生和许多朋友。他和栋臣先生说：

“我看过烈武，在都督府里的朋友都来了，大家问问情形，说：‘你应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宣城去的好。’又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

“后来我和仲甫谈谈，他光着眼道：‘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事后仲甫和烈武谈谈，认为徽州还有一些问题，要我做徽州特派员。我耽搁两天，就要上屯溪去一次。仲农、孔璋已经要到了。”

就在我和大叔先后回到绩溪的那几天，周植夫伯从屯溪科学图书社来信说，那里事情忙，人手少。大叔要我到屯溪社去相帮。他自己也随后到了屯溪。几个月后，大叔去上海，叫我回家等信。

我到家不久，忽一日，接得大叔从上海寄来的一封挂号信，要我和同乡舒祥荣搭伴，速速由芜来申！

我当时高兴之至，马上和祥荣兄约定动身。他主张由杭州到上海。我们是搭民船到杭州，再搭火车到上海的。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过不了几年，忽然听见祥荣兄去世了，真很难过。他是我大姑的女婿，一个异常诚实的青年。

惠福里—平和里—福华里

我是1913年到上海的，时年十七岁。我的大叔比我大二十岁。

我和祥荣兄到了四马路(今福州路)，找到惠福里，只见弄口有两块黑底白字的洋铁皮招牌，狭狭的、长长的：一是亚东图书馆，一是科学图书社申庄。进弄到门口，还有两块招牌在门口，和弄口的一样。门上的号头想不起了。

许潜如随后也到了，他是由芜湖社里调来的。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好象要比我小一两岁。

我的大叔到上海办货办书，据说最早歇过小旅馆，后来才搭在相熟的书店里，以后在章士钊先生的苏报馆里认识了群益书社的主人陈子沛，这才在群益书社里搭铺。直到我到上海时，亚东图书馆还是刚刚单独租了房子，芜社申庄才设在亚东里面。

当时，在我的大叔面前只有我和潜如两个十几岁的青年。我们的工作，一是替芜湖科学图书社办仪器、文具、图书、杂志。各同行都是大叔逐家逐家带我们去接洽的。二是亚东在日本印的地图已经印好了一些运来，我们做发卖的工作。三是写帐，有亚东的帐，有芜湖办货的帐。此外就是洒扫等工作。

一天，大叔回来说：“不好，不好！这里要翻造，立刻要搬家哩！”又说，棋盘街(今河南中路)有个房子要出租，原来是平和里国学扶轮社的房子。我们都说：“那里倒很好，配书配货很便当。”待讲妥连家具一齐盘下来后，我们就搬过去了。那是

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搬进去时，后面房里还有些国学扶轮社的书，我们翻看翻看，有不全的《古今说部丛书》和《吴挚甫先生尺牍》等。版权上写着发行者“中国图书公司和记”。这才知道国学扶轮社和张季直的中国图书公司^①是很有关系的。

平和里这条弄堂，一头通棋盘街，一头通麦家圈（今山东路），即现在的交通路那一带。一天，潜如出去兑钱，刚在棋盘街那一头路东的一个小钱庄里兑好钱出来进弄，忽然听见枪声，接着许多人象潮水似的涌进平和里，向麦家圈那一头直奔。潜如夹在人丛中，进了弄堂，进了门，脸上都失色了，说：

“好险！好险！商务门口有人给人暗杀了！”

过后我大叔回店来说：“大家都在说，夏粹芳^②的马车刚到商务门口，刚刚停好，刚刚要下车，给一个人走上去打了一枪，立刻倒在地下，死过去了。”后来有人说：“据说国民党要攻打制造局，又要攻打闸北那一面，有人去和夏粹芳商量，说是打闸北进军，如果把商务的印刷厂打掉了，一定如数赔偿。夏粹芳不肯答应。”

不久后，1914年春，也是因为翻造房子，亚东又从平和里搬到了四马路江西路口的福华里。也是两楼两底，房子很新，比平和里还要好。福华里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一头在四马路，一头在江西路。出四马路朝西，第一家是广智书局，马路

① 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席子佩等创设。张季直参加投资。张季直，即张謇（1853—1926），光绪状元，1895年开始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后又举办多种企业，也举办了一些教育文化事业。

② 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青浦人。1897年创办商务印书馆。1901年商务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夏任总经理。1903年后，聘蔡元培、张元济先后任编译所长，业务日益发展。1914年初被暗杀。

口拐角是一个印刷厂。

《亚东宣言》和初期的出书

在陈仲甫怂恿我大叔到上海开书店之后，大叔后来回忆说：“我和我的业师胡子承先生商量，要印他的地理书以及挂图。我又向朋友凑了两千元股子，到上海准备开书店。地图等等，由胡子承先生的儿子翼谋带到日本去印。1913年春，我在惠福里一个楼下租了一间屋，挂上了洋铁皮的‘亚东图书馆’的招牌。”

亚东首先出版的几种地图，手头一种也没有了。我曾到图书馆去问过、查过，也查问不到。现在只有从保存的广告里作一些摘录。

亚东在日报上登出的第一个广告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现在全录于下：

中国书籍之兴，肇于《坟》、《典》，隆于晚周。暴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书缺简脱，而向、歆所录尚有三万数千卷，百家咸备，翳古艺文，炳焉可观矣。西方希腊、罗马，文教覃敷，亦当中国周、秦之际，东西相较，无多让也。

顾自意大利国文艺复兴，五百年来，欧洲列国，百家竞起，继轨增饰，制作之富，溢市闾城。官书度蓄，且轶天禄、石渠之盛。东邻文艺，虽不能比隆欧、美，亦足以蹀躞诸夏。识者将于此校民族之文野、卜国势之隆替焉。

诸夏之不振，因缘万端，宋、明以来，尊尚制艺，废置《诗》、《书》，人知以晦，国力以堕，此其大原也。近岁情势

稍稍变矣，然犹攘臂论政之士多，冥心著述之士少。人不知古今，予以印绶，则为土偶；予以戈矛，则为盗贼。群一国不学无文之人民，虽有圣君、哲相，求几及小康且不易，况期以共和大同也耶！

同人夙凜斯义，相与醵金立社，最（聚）海内耆宿、欧学巨子，综辑群艺百家之言，迺译欧美命世之作，接翼并轨，以趣修途，邦人诸友，倘亦乐观其成也。

这个广告曾登上海各报，只知是1913年（民国二年）的第一个广告，可惜一时查不出是几月几日，登过哪几家日报了。广告是由日报上剪下贴好的，不曾在旁边加注。

这个宣言是哪一位的手笔，也不知道了。只有黑底白字的一行“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好像是陈子沛翁的笔迹。

亚东最早出版的是“中华民国四大交通图”：《全国铁道图》、《全国邮政图》、《全国航路图》、《全国电线图》。每幅定价五角五分。广告上有特点的介绍：（一）是图为绩溪胡晋接（子承）、程敷锺两先生合著。两先生研究舆地二十余年，就其心得，著成是图，以供习政治地理者之用。（二）是图取法欧西，将铁、航、邮、电四大交通机关，各自为图，胪列现状，实吾国空前未有之作。（三）详明精确，一洗旧图芜陋之弊，于交通上，为外人所攘夺之权利，特加详载，使国民知所警觉。（四）附有简当明了说明，使人览之，一目了然。（五）镂印精美，彩色鲜明，张挂于学校、会社等处，最为相宜。

不久后，又新出了胡晋接、程敷锺两先生所编的“中华民国自然地理图”——《全国地文图》、《全国地势图》、《全国山脉图》、《全国水道图》。又出版了胡晋接先生编的《新编中华民国地理讲义》，内容分为十章：一，全国疆域；二，全国地文现

象；三，全国人民；四，国体、政体；五，财政；六，军备；七，教育；八，实业；九，交通；十，外交。

这里要补说一下地图是怎么在日本印的。子承先生的二儿子，就是胡广治（翼谋）兄到日本留学，带着接洽印地图的事。其实，群益书社在日本早已有庄，他们的书多数是在日本印的，如《英汉辞典》以及后来的《英汉双解辞典》等。我们在那里印，怎么接洽，也不是单靠翼谋兄一个学生，还是靠群益书社帮助的。群益创办人陈子沛翁兄弟很多，好几位都是日本留学生。

那时候，我们亚东到货，经常就是日本印的装箱的地图。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批分类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这部地图又大又厚，印得真好，装得也好。我现在想来，至少有十英寸阔、十五英寸长，厚也近寸。是咖啡色的布面，白字。定价是大洋六元。

后来还登过一个分类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和分类的《中华民国地理讲义》合在一起的广告。除通常的各项外，还刊有梁任公（启超）、马君武、黄任之（炎培）、章行严（士钊）、陈独秀的评语。好在文字不长，且照录如下：

梁任公先生评：

浏览一过，钦佩无量。治地理学最苦干燥，此书注重人文，导以趣味，而归诸实用，其津逮学子之效远矣。

马君武先生评：

近人所编中国地理书，大概取材日本图籍，谬讹百出。胡君是书，详审精确，于前二百年中国领土范围考核尤详，体例完善，殆近年所出地理书之冠。不惟学校宜用为教科书，一般中国人皆宜读之。

黄任之先生评：

胡子承先生，且学且晦，不厌不倦，素所心折。是书注重人生地理，令读者多所触发，兴味浓郁，于中等教育最为相宜。盖其学地也，而学之者人，乌可抛荒本位而从事；况其为本国地理，固当以阐发国家思想为要义。

章行严先生评：

胡君是书，独详著人生地理，已为国中斯学创见之作矣，其中尤令人心惊血涌者，则《领海丧失图表》及《华侨居留地图》是也。仆以为不徒学界宜重视之，凡议员、行政官、外交官皆当置诸座右。

陈独秀先生评：

其最卓越寻常者，于讲义则缕述三百年来国家领土之变更，于图则自然地理外，殊详人事：斯二者皆国中图书所未有也。今日中国人人干禄弃学，吾皖人士，见闻尤陋，独胡先生蛰居万山中，学不厌，海不倦，鄙人之景仰先生者岂独此图书已耶。

除上述地图和地理书以外，还出了一本《新体英文教科书》，编者CC生。“CC生”，就是陈仲甫（独秀先生）。当时，袁世凯打倒四都督^①，陈仲甫先生又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

①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一步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3年3月暗杀宋教仁。4月，向帝国主义列强大量借款。6月，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一说包括湖南谭延闿，称袁世凯罢免四都督的。柏文蔚《癸丑讨袁失败记》说：“时袁氏对南方四督，不可一朝居，亟思去之，以金钱势力，摆布成熟，计先在江西，次广东，次安徽，组庵〔谭延闿〕似有门径，势甚和缓。”）这时，国民党被迫应战，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讨袁。此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倪嗣冲入皖，柏文蔚出逃。

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就是这时候，替我们编了这本英文教科书。原计划分四册，应中学四年之用。先出了第一、二册。生意不好，不曾编全。

这本《新体英文教科书》是在作新社排的。校样来时，我们无人能校，大叔只好拿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蒋熙光兄是群益书社的学徒，已经出师，夜里在教会里学英文，程度已经很好。群益书社时常要用英文，所以他得到夜里学英文的允许。

我早就想学英文，这时更强烈了。后来，经过常在我们店里作客的绩溪章大木先生（我们有时称他“大木先生”，有时称他“观根哥”）替我给大叔说好，同意我到青年会夜校去学英文。大木先生带着我去报名时，大叔拿出十块大洋，对我说：“你要知道，这是血！这是汗！你要好好的学！”大木先生道：“原放，去罢。”于是我拿着十块大洋，跟他到青年会去了。时年1914。实现了多年的愿望，真是天大的乐事。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第四章 《甲寅》杂志迁沪， 《青年》杂志创办

亚东从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八年生意很不好。但一九一五年印行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亚东图书馆的名字已经叫人认识了。

仲甫想出一本杂志，我们实在没有力量做，介绍给了群益，——这就是《新青年》。

一则“秋桐白事”

先看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确切日期弄不清了，推算起来应该是1915年初。出现于上海各报的这个广告分两部分：“秋桐白事”和“《甲寅》第五期预告”。“秋桐”即章士钊（行严）先生，这不用说，大家都是知道的。

“秋桐白事”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仆以孱弱之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慚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

上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林町七十八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收可也。^①

“《甲寅》第五期预告”由亚东图书馆出面，说明第五期已付印，“不日即可出版。自后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负责”等等。

从《孟邹日记》看，《甲寅》第五期于5月出版，以后大致每月一期，下旬出版。

那时候亚东地方很小，广告刊出，来买的人挤满客堂间，一面又忙着去寄邮包，有小包的，有一卷一卷的，真很忙碌。

记得是第九期，发表章行严先生的《帝政驳议》。厨司把杂志送到邮局去，过了半天，把邮件一齐车回了，脸上很气恼，说：“不寄！禁掉了！”原来因为反对袁世凯被禁了。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种遭禁的期刊。真好比浇了一杓冷水！邮政局寄不出，零卖还没有到禁止的地步罢？果然总算平安无事的过去了。

1916年6月6日，下午五点光景，有人来说：“老袁已于上午病歿！”一打听，果然是袁世凯死了。可称吾国四万万人之福也！

于是又有一个《爱读〈甲寅〉者鉴》的广告出现于日报：

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

① 二次革命中，章士钊曾任黄兴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章流亡日本。1914年5月，创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违反共和原则。《甲寅》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获得很大的声望，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至第十号，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五分。

接着还有一个《甲寅杂志社启事》：

癸丑(1913)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清釐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在日本出了四号，在上海出了六号，一共是出了十号。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陈独秀(署名“CC生”)、李大钊^①、苏曼殊、东荪、梁漱溟、高一涵等。《甲寅》杂志，同后来在北京出的《甲寅周刊》不是一回事。《甲寅周刊》就是通称为“老虎周报”的，不是我们发行的了。

《名家小说》出版

《甲寅》杂志停刊以后，我们于1916年印行了一部《名家小说》：选定者，章行严；出版者，甲寅杂志社；印行者，亚东图

①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回国，历任《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编辑。十月革命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书馆。

这部《名家小说》的篇目是：上卷：双桢记（烂柯山人，即章士钊），西泠异简记（寂寞程生，即程演生），孤云传（白虚，即陈白虚）；中卷：说元室述闻（兹），啁啾漫记（匏夫），侠女记（匏夫）；下卷：绛纱记（昙鸾，即苏曼殊），焚剑记（昙鸾），女贼记（老谈），白丝巾（老谈），孝感记（老谈）。

这是一部四十八开的小本小说。全书是文言的。其中《说元室述闻》和《啁啾漫记》是笔记，余者都是创作的小说。全都是《甲寅》杂志里发表过的。不过这里所收，每一种都是完全的。如《西泠异简记》，在《甲寅》杂志只发表了六章，后面还有一半；《名家小说》则一齐印入，成为十二章的全本了。

几十年来，这部小说时常还有读者要来寻访购读的。

1922年，章士钊还编纂了一部《甲寅杂志存稿》，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后面还附有他的《独立周报存稿》。《独立周报》是1912年先于《甲寅》杂志出版的一个期刊。

《新青年》的诞生

1915年的《孟邹日记》里，有这么一条：

七月五日，星期一，晴。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

这里说的“青年”，即《青年》杂志，即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是由群益书社出版的。群益是陈子沛翁1907年创办的。这里说的“子寿”，就是他的弟弟陈子寿翁，在群益店里相帮的。子沛、子寿同我大叔过从甚密，情谊极深。

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

“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决定要标点、分段。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的。子寿翁为排《新青年》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为什么说亚东“实在没有力量做”呢？当时亚东地图生意不好，又正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甚为棘手。在大叔的日记中，时有“社务乏款，焦急之至”，“芜（芜湖）款未至，焦灼万分”，“暂借到洋五百元，真正可感”之类的记载。所以，无论如何，实在是无力再出一个杂志了。如果介绍到群益，又不同意接受，那么，仲翁想出的“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的一个杂志，就决不能在“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五日”问世了。

还有一个问题：《青年》杂志怎么会改名《新青年》的呢？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

关于这件事，我大叔的日记里记有：

三月三日，星期五，晴。……晚饭后到仲甫宅，适子寿

亦在此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①……

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就正式改名《新青年》了。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新青年》，就是这样诞生的。

仲、孟北上

我的大叔说过：“亚东从1913到1918年生意很不好。”那几年经济上很困难，是的确的。

记得有一年过旧年，我们店里窘不堪言，非上当铺不能过关。旧历除夕前一天的下午，我大叔出去弄钱还没有回来，忽然李次山先生来了，对我们说：

“汪先生不在家吗？回来时，你们告诉他，我明天上午送一千元来。”

说过便去了。

我的大叔回来，我们连忙告诉。他说：“你们真幼稚，哪里有这样容易的事情！你们要晓得，钱，难如登天呵！”

第二天，大除夕，一清早，李先生果然把一千元送来了，只要我大叔写了一张收条，口头约定多少时归还。

大叔随后拿了两百元，要我的大哥（乃刚，当时也在店里做事）送去给柏文蔚先生。

我大哥去了回来以后，背后和我们说：“我去时，柏先生正

① 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说：“《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页）

在门口等哩。我交了钱出来,经过一个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包‘上将服’。我如果不去,看来要上当铺了。”

当时尽管自顾不暇,我大叔还是常常帮助柏先生调款,我们知道是为了“倒袁”。

那几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亚东一方面紧缩房屋,一方面减少人手,事事俭省,以求立足。后来,我大叔还曾一度兼做杂粮生意。

1915、1916年间,酝酿过一个“大书店”计划。起初曾有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邹北上之行。

1916年的《孟邹日记》有如下记载:

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仲甫、己振同来,根本赞成竭力相助亚东与群益合并另行改组之事,云候子寿回申,拟出“计划书”,渠等二人北上一行,以便搜集资本。此事如就,关系甚大,非仅予一人之所深愿也。

十一月二日,星期四,晴。上午九时即至陈宅,与佩(子沛)、寿(子寿)议论各事件,复至己振宅上;未几而仲甫亦到,互论亚东与群益合并扩充之事,首即资本问题,次即人材问题,然后方及内部如何组织之法。初次会,结果尚佳;但子寿似乏猛进之气,略有缺点。晚间,仲甫为曼殊饯行,予与子佩(子沛)、子寿均与饮焉。

十一月三日,星期五,雨。晚间,仲甫、己振、子沛、子寿同来此间开二次会议,并拟“意见书”及“招股章程”。各稿议归子寿起草。谈至十二时方归。

十一月五日，星期，雨。……晚间略具粗肴，仲甫、己振、子沛、子寿同来此小饮后，即开三次会议，决定各稿，亦近十二时方散。

十一月七日，星期二，阴。……晚间秋桐来此小饮，予及仲甫、己振、子沛、子寿与他商量书店之事甚详。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晴。晚间为书店事，请烈公（柏烈武先生）、秋桐晚餐。予与子沛、子寿均到。……谈至十时方散。结果甚佳。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晴。上午往访仲甫，又同访己振，决定二十六号首途北上。

我的大叔和陈仲翁 1916 年 11 月 26 日去北京，大叔于 1917 年 1 月 17 日先行返沪。这一个多月大叔的日记，大都访友、宴请、看戏一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子民先生^①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我记得，大叔回来后说起过：

“蔡子民先生请仲甫做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仲甫已经答应了^②。

①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留学。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

② 1917年1月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说：“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页）

“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

我们听了议论说：“这很象‘三顾茅庐’哩！”

“陈仲甫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大书店，实在要好得多。”

“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

对于亚东、群益合并改公司，我们背后也有许多议论。不外是说：

“好是好的，恐怕不成功。群益生意很不差，亚东比他们不上。亚东愿意，群益不见得愿意。”

“群益过去好，近来听说也不很好了。他们的《英汉辞典》、《英汉双解辞典》，不如以前了。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帐，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后来商务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群益也急哩。”

“中国图书公司都搞不过商务，群益怎么搞得过。而且，中华书局也在出英汉小字典等等的。群益实在很危险，搞不过资本大得多的商务、中华的。”

“恐怕子佩翁、子寿翁有眼光，和亚东一并，靠湖南、安徽的资本来大干，也来一个大公司，也说不定。”

“公司一定改不成。”

“什么道理？”

“‘同行必妒’，合作很不容易。”

“群益、亚东，亚东、群益，只有‘各奔前程’。”

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果然没有合并成。

第五章 “五四”前后

亚东、群益合并改公司虽然未能实现，仲、孟北上却依然给亚东带来了新气象。这就是：经仲甫推荐，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发行《建设》、《少年中国》、《新潮》等杂志；出版《尝试集》、《三叶集》等书。一句话，“五四”前后，出版才上了路。

出弄堂，上马路

我的大叔说过：“仲甫最不赞成亚东缩在弄堂里。他常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

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好不容易迁上了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西首了。

那时候，要在适当的地点找一个店面，也不容易。这次是等到了一个机会，“中德药房”迁移了，亚东才租了下来的。可是，如果仲翁不曾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如果不推荐亚东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我的大叔还是不敢断然的搬上五马路的。

原中德药房的这个店面，是坐北朝南的两开间，西边是公

顺里。我们拿东边做了四扇玻璃门，西边做了一个大橱窗，可以陈列书籍、杂志等。请人写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做招牌，另做了一块横长的小招牌，记得写的是：“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楼上也有大小四间。

同事也有些变化。我表哥章洛声（我大姑母的儿子，正名洪钟）原来是同胡鉴初（仲荪）分管内账外账的，这时被北京大学出版部请去相帮了。鉴初兄介绍他哥哥胡铁岩进店，大叔答应了。店里还有一个程本海，是早已出师的，有时也帮着搞内账。胡竹林、章观璋刚出师，什么事都做。再有一个学徒程际安，就这么几个人。

那时柜上卖的，不外以前所出的地图以及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至于期刊，“五四”以前，记得不过《甲寅》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几种。到了“五四”以后，大不相同了，新出的期刊雨后春笋一般，我们不但代卖，还总经理了好几种期刊。下面再一一地说。

经理北大的出版物

亚东经理北京大学的书籍后，在报上登了一则《购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者鉴》：“北京大学出版部新书甚伙，全国风行，其价值无待辞费，只以南方各省销数甚多，直接北京，颇感不便，故特委托本馆为上海总经理处”云云。并宣告，“今因扩充营业，并添售仪器文具，特迁至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八十四、八十五号，定于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幕”，折扣优待，一月为限，等等。

北大出的书，有历史、地理、诗词、文字学、曲谱、数学、伦

理学、哲学、经济、财政、法律等等。有一张报上登载的书目，节录如下，以见一斑：

中国史讲义(上世史)	杨敏曾	四角
中国史讲义(中世史)	杨敏曾	四角
史记探源	崔适	六角
春秋复始	崔适	六角
清史要略	陈怀	三角
诗学	黄节	一角二分
文字学形义篇	朱宗莱	二角
文字学音篇	钱玄同	二角
论语足徵记	崔适	一角
程选模范文	程演生	四角
重印词源	张炎	一角二分
南曲谱		一元
重印北词广正谱	徐于室	六角
本国人文地理	钱正椿	五角
代数学讲义第一、二篇	石鸿燾	六角
西洋伦理学史一、二篇	杨昌济	二角五分
伦理学之根本问题	杨昌济	五角
哲学概论	陈大齐	四角
新编印度哲学概论	梁漱溟	七角
德意志之战时经济	嘉塞尔	二角七分
财政学参考(预算篇)	王祖建	一角四分
现行律例关于民事有效部分		一角
欧洲战时之经济财政	堀江归	铜元十四枚
强制执行法草案	左德民	四十二枚

破产法草案	林行规	十三枚
票据法草案	周家彦	九枚
德意志刑法草案	王荫泰	四十四枚
现时战事国际法	张家森	七十八枚

最后注明：“尚有外国文书籍多种，目录另登本馆书目，函索即寄。”可惜这种目录一张也找不到了。

《建设》杂志与朱执信

我大叔回顾亚东的历史时说到：“‘五四’来了，我们由朱执信^①介绍，替孙中山印过《孙文学说》，发行过《建设》杂志^②（一至二十四期）。朱执信说无处找书店印行，所以我们答应

① 朱执信(1885—1920)，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大符，字执信。原籍浙江肖山，生于广东番禺。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5—1908年，在《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改良派的谬论。1910年与赵声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在激战中负伤。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1913年参加讨袁运动，之后在南方坚持策动讨袁武装斗争。1918年随孙中山到上海。1920年赴广东，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

② 《建设》杂志，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创办的，可以说是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刊物。1919年8月创刊。它的主导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的说来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围。在《建设》杂志上出现了一个同盟会、国民党报刊从来没有的现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介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说：“《建设》出到二卷六期（1920年8月）后停刊。”（该书第234页）《建设》六期为一卷，两卷共十二期。但汪原放引述汪孟邹的回忆说，《建设》杂志印行“一至二十四期”，下文还说到他看到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三卷第一号。《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4页注1也说《建设》“先后刊行两年共二十四期。”

做了。钱是他们拿出来的，不要垫款，所以我们可以答应。”

我们怎么会得到印行《建设》杂志的机会的呢？当时亚东代派的月刊有《新青年》、《国民》、《新潮》、《北京大学月刊》等十七种，周刊也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生活》、《星期日》等十多种，已经是一个专门代派最新的期刊的新书店了。而当时印刷机关缺乏，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关，如商务，象孙中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以至朱执信说无处找书店印行了。孙中山先生和朱执信先生们在“五四”后，对于新文化运动，认为“苟能继涨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所以就决定找到卖新杂志的亚东图书馆来接洽接洽《建设》的印刷、发行了。

《建设》杂志原定全年十二册为一卷，后因图订装便利起见，改为半年六册一卷。《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有一、二卷的目录。我现在只看到第三卷第一号是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以后的暂时没有查出，只有待以后有机会再来列一详表了。

《建设》第二卷第3号的内封，印有一则“交换广告”的启事。当时期刊之间交换登广告，相互登同样大小的地位，一概不算钱。值得注意的，是《建设》这个启事第三条规定：“非有关‘新文化运动’者，主张军国主义者，辩护资本主义者，概不交换。”据说是出自朱执信先生的手笔。

这里说一说朱执信先生。

朱先生是一个瘦瘦的书生，极和蔼可亲，但意志很坚强。我们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一个早在1905年就向中国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人。

建设社来到我们店里接洽一切的总是朱先生。鉴初兄接

待他较多。我还记得，那时在他们社里主编《建设》的是廖仲恺先生，接洽排印等等的是朱先生，到结账时打支票给我们的是胡汉民先生。^①

朱先生来接洽稿子以后，往往要随便谈谈。有一次谈到剪辫子，他说他的辫子剪得很迟，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剪掉的。他说，当年如果把辫子剪掉，有许多事颠倒做不动了。

后来才知道，他在年轻时，几乎做了轰轰烈烈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记得朱执信先生讲过，“黄花岗那一次，我还养着小辫子，穿着长衫，只不过前后系了起来。在清兵追紧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弄口有一个女子抱着一个小孩，又照应着一个孩子，也很小。我走到那里，把那个站着的孩子抱了起来，面朝弄里。我又有辫子，又穿长衫，又不象学生，又有点象一个做生意的，竟避过了，不曾给清兵捉去。”

《建设》杂志在1920年7月1日出了第二卷第六号后，大概因为朱执信先生到广东去了，又牺牲了，所以一直到12月才出第三卷第一号。朱先生离上海那一年，还预备大规模地出“建设丛书”。后来改称“社会经济丛书”发过一则预告，列出书名十六种，大都为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的著作，译者有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胡汉民、林云陔等，也有少数不是翻译而是编著的，由亚东总经售。可是，不久后，多数的编、译、著者，都到广东去忙更重要的事情了。“丛书”计划只有放过一边去了。

① 《建设》杂志主编人说法不一。《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4页注1说：“由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主编”；第105页注46说：“朱执信、胡汉民主编”。

《少年中国》、《新潮》及其他

我们印行少年中国学会^①的《少年中国》月刊，创刊于1919年7月。从当时的广告看，是从第五期起归我们发行的；第一至四期因已脱销，也由我们再版，都是1919年11月出齐的。记得那时是在大新街的华丰印刷厂排印的。当时出版时，来买的人是相当多的。

来亚东接洽《少年中国》出版的是宗之樾(白华)先生。他曾担任过《时事新报》的《学灯》的主任编辑，后来才留学法国去的。店里分工，印行《建设》，是鉴初兄负责；印行《少年中国》，是我负责。《少年中国》我们印行了两年多。大概是从第四卷起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于接洽《少年中国》的事，我同宗白华先生渐渐的很熟了。

迁到五马路之后，我开始用白话文译英文的短篇小说。有一次，宗白华先生来的时候，我拿出我试着转译的一篇托尔斯泰的《只有上帝知道》来请他改改。他拿去了。想不到，竟在《学灯》上刊出了。月底，《时事新报》上登一条通知，要投稿的人去领稿费，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去领了，原来有八元之多！我高兴之极，宗先生再来时，我谢谢他。在当年，八元很得用

① 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间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先后加入者一百多人，遍及全国各地。李大钊是发起人之一，曾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主任。恽代英、邓中夏等积极参加学会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分化，大部分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以曾琦、左舜生等为代表，反对共产主义，信仰国家主义。学会出过《少年中国》月刊(北京总会负责编辑)、《少年世界》月刊(南京分会负责编辑)、《星期日》周刊(成都分会负责编辑)等期刊。

的。我记得做了两身小褂裤，又还买了皮鞋、袜子等等。这第一次发表译稿，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有时有空，总欢喜看看英文小说了。有空也译一些放着，慢慢儿的改改校校，力求“信、达、雅”。可是真很不易做到哩。后来我陆续译的有白话诗、神话、童话、短篇小说等，以投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居多，也有继续投给《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因为投稿关系，向这两个报社各讨了一份报纸来，从《觉悟》和《学灯》上，得益是比较多的。

从1920年起，我们又接着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种月刊《少年世界》。当时介绍说：《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则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

我们经理发行《新潮》^①，是从重排重印它的第一卷第一至五册（订正三版）开始的。《新潮》第一卷是1919年1月至5月出的，初版早卖完了，再版出来，不到半月，也卖完了，而各界要求的信，还是来个不了。这时候，北京大学出版部正要出《新潮》的第二卷，再要重排重印第一卷实在忙不过来，只有把三版委托我们代办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也实在很忙，可是有陈仲翁和适之兄^②的函商，就一口答应下来，毫不推辞地担当起来了。

傅斯年有一篇《〈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说到《新潮》创办前后的经过情况。概要是：

“民国七年的秋天，……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成功（指办一个杂志）。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

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

“十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杂志,不使它杂乱无章,不使它有课业性质,定它的原素是:(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英文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中文名字叫‘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

“十一月十九,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大钊)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北大出版部主任)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

“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不落在随便发

-
- ① 《新潮》月刊,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参加)组织的新潮社编辑的刊物。发起人是罗家伦、傅斯年等,傅、罗先后任《新潮》的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以前,《新潮》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新潮》追随胡适向右转。
- ②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骝,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经汪孟邹介绍,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建立了联系。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新文化运动拉向右转。从此以后,他就一步步站到反动营垒中去了。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年病死。

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

这里说到的好期刊，有的是亚东经理的，有的是亚东代派的，亚东又是北大出版部的经理，所以《新潮》第一卷订正三版的印行自然而然地到亚东来了。

讲到《每周评论》，是仲翁在北京办的，1918年12月创刊。我记得亚东上了五马路，《每周评论》某一期不曾到，问的人已经很多；到了寄到发售的时候，一下子可以卖光的。每期只有八开的一个单张，只不过卖几个铜板，青年学生没有买不起的。记得那时寄到的，也有几百张，只不过从来不曾有过上千张的时候。

除代派的不算，亚东还印刷发行过《新群》月刊，是上海中国公学编译社出版的，一共只出了四期。此外，还印过同济医工学校的《自觉月刊》，和同德医学专门学校的《同德医学》（月刊）。

乔年出国

早在亚东还在福华里的时候，延年、乔年^①月月要来拿学

① 陈延年（1899—1927），陈独秀长子。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6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牺牲。

陈乔年（1902—1928），陈独秀次子。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6月遭杀害。

费。那时他们正在震旦学院读书。仲翁托我大叔，每人每月给他五元。我大叔常常要说起他们很用功，很肯吃苦，是很好的青年。有时我的大叔要出去了，十元钱会另外放在抽屉里，他兄弟俩来时，立刻可以交给他们，免得空跑。

兄弟俩一同来时很少，乔年来得多，延年来得少。如果两人同来，延年往往在弄口等，乔年拿了钱出去给他的哥哥，再回来和我谈谈再去。我们是可以算做世交的。我记得我们相见，非常要好，时常要谈谈什么书好，什么杂志好，什么文章好。

乔年来时，看见有他做得来的工作，无不登时动起手来做的。亚东上五马路之后，每星期六、星期日，乔年必来。他也学会了站柜台，拿书，算账，开发票，打邮包，打大书包等等，实在可以说得上是店里的一个不要报酬的相帮的。

是亚东迁到五马路以后，仲翁在上海的住处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有一个楼上的长厢房给我们用，我们堆了一些卖不了的杂志等等在那里。后来我大叔又要鉴初兄和我到那里去住。我们每天早上由渔阳里到店，夜里由店到渔阳里去睡。

有一天早上，大概是星期日，我和鉴初兄起得早，乔年也起得早，在后门头等着我们下楼。他对我说：“呃，要请你做先生，教我一点英文。”我说：“我的英文不好，不要给我教坏。”他说：“不要紧，我只要学一点生字。再说，我要预备好。”我问：“预备做什么？”他回答：“不久，恐怕要到法国去哩。他们说，学一点英文有用，不一定学多少。”我说：“好。”他又说：“你学一点法文，好罢？我们交换。”我说：“好，都不叫‘先生’。”

我在青年会夜校学英文一共学了四年，1918年以后已经不上夜校了。可是还是坚持自习的，有时读英文日报如《大陆

报》等，有时又去买了英文的《林肯传》、《弗兰克林传》和神话、童话、小说等来自学。乔年和延年是早就在学法文的。我同乔年讲定之后，就天天早上在渔阳里互教互学。后来我和鉴初回店住了，乔年天天一大早就到五马路来和我互教互学。有一段时间我生病，他时常来看看我。我知道他急于学英文，来时总教他一些生字。他懂法文，记忆力又好，所以学得很猛，很快。

有一天，乔年又来了，说：“我要走了，动身了，到法国去。你瞧。”他把脚抬起来给我看，是雪亮放光的皮鞋。我说：“不怪哩，一身新到底了。”后来谈到衣着都是由廖仲恺先生那里一道发的。临走他说：“有些事还要预备一下。我上船以前，还要来一次。”

果然，上船前他又来了一次，上楼，和我握手，说：“我今天动身了，再见。”接着大笑，说：“再见了，我回来时，一定要拿名片见你了！”^①

乔年为什么说他回来要拿名片会我呢？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出胡适的《尝试集》和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了，《建设》、《少年中国》等杂志在出下去，还有消息要出“建设丛书”，他认为亚东营业一定会很发达的，他很高兴。

乔年到法国后来过信，是在里昂，一面读书，一面在工厂里做工。后来又寄了许多风景明信片来，说是发工资时搭发的，要我把它卖掉，把钱汇给他。我立刻把它放在柜上卖，又分寄一些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去卖，钱随时汇给乔年和延年。

① 1919年底，延年和乔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这年11月23日，某人写给上海华法教育会干事的信中说：“今又有陈先生延年、乔年昆仲，拟乘十二月初八日出发之船赴法。……”

大叔吃了一趟官司

这里要补说一件事。

在乔年出国前，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个人，有几种书想拿来托卖。”我道：“好。什么书？你看好不好？”他说：“好哩。”我道：“你要他来罢。汪伯伯会答应的。”

于是，一位郑佩刚先生来了，拿了一包书，说是乔年介绍他来的。只有几种书，我们收下放在柜台上卖了。我一本本的看了，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文字很通俗，很流利。书名记不清了，好象有的是什么“实录”，有的是“克鲁巴特金”的什么什么。

不几天，竟卖光了。郑先生来看看，再又送了一些来。他也说起过：“泰东图书局也卖掉不少了。”

一天早上，我们开了店门以后，忽然有一个外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进店堂来了。其中一个中国人指着无政府主义的书，问道：“这种书，你们还有吗？”我们回答道：“还有。”两个中国人一齐说：“你们一齐拿出来罢。”那个外国人登时大怒，连连说：“I am very angry! I am very angry!”摆出一副十分难看的面孔。两个中国人道：“我们是巡捕房里的。外国人很气恼，你们竟卖这种坏书！你们经理在家吗？”于是立即把我大叔从楼上叫下来，捉到巡捕房去了。店里人赶紧到泰东去看，原来也有人在搜书，也把赵南公捉了去哩！

我随即到群益去细细的告诉了子沛翁和子寿翁。他们商量了一会，对我说：“不要紧，不要急。我们马上去找行严先生。”

不多一会，子寿翁到店里来告诉我道：“不要急，我们已经看到行严先生了。他答应想办法，一定可以从轻处罚的。”

到开庭的时候，先是巡捕房律师提起公诉，再是我们请的律师辩护，那律师好象是章行严先生介绍的。然后宣判：赵南公先生和我大叔各罚大洋五十元。郑佩刚先生也被捉去一起审的，判坐牢多少时。赵先生和我大叔当庭释放，子寿翁、鉴初兄和我，好不高兴欢喜。这也是 1919 年的事情。

事后，乔年照常来，我的大叔并不曾说他一句什么。

仲 翁 被 捕

1919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期上，载有一首李大钊的诗《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这指的是“五四”后不久陈独秀在北京被捕的事。据我查考，是 1919 年 6 月中旬被捕，9 月中旬出狱的。

陈仲翁在北京出了监牢，还怕不安全，辗转回到上海来养息。大叔去看了仲翁回来说：“据说是李守常（大钊）先生陪他

到天津的。李先生从前逃走过，熟路。这次打小路走，是装做病人，躺在很巍峨的骡车上，用风帽裹着头，一直躺到天津的。李先生说是最好是落大雪的日子走。李先生把他送上火车，自己再回北京去的。”^①

大叔说：“仲翁谈起过，他在牢里，倒也可以得到消息，听说是泽丞（洪）、彤侯（江）、叔潜（汪）他们都在奔走。泽丞恰好在京师警察厅多年了，厅长吴炳湘对于泽丞倒还买账。今回难得泽丞硬起头皮来出过力。”

陈仲翁在上海有时要到店里面来。我们大家对他非常恭敬，背后常谈：“什么监狱监牢，他直进直出！”

住在渔阳里时，仲翁又被捕过一次。

那是我和鉴初兄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一夜，我和鉴初兄到渔阳里，叫开门来，厨子很紧张地告诉我们道：

“唉！老先生给巡捕房（法租界）里捉去了！”

“是一个人吗？”

“不是的，还有三个客人。”

我和鉴初兄很着急，要厨师等门，我们赶紧回店去告诉我大叔（那时店里好象还没有装电话）。

我的大叔吓坏了，立刻起床，商量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还是回去罢，我马上去看子沛、子寿去。”

那一晚，仲翁家没有人，只有厨司、鉴初兄和我过夜。

第二天，我们到店，我的大叔道：“昨夜和子沛、子寿又一道去找过行严（章士钊），再看今天的情形怎么样。真急人哩！”

① 据茅盾回忆，当年陈独秀谈起这次来上海，“是李大钊设法，化妆商人，保护他到天津，然后乘轮船南下。”（见《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70页）与此处所说，在细节上略有出入。

后来我的大叔从外面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

“好了！好了！险呵！险呵！仲甫已经出来了！和他一道捉去的，还有邵力子。他们四个人正在谈，大概是开一个什么会，巡捕进去，一齐捉去了！”

“据说有人打了一个电报给孙中山先生，他立即打了一个电报给法国领事。

“巡捕房里忽然叫他们四个去到一个房间里谈谈，很客气，还给椅子请他们坐，又不知道讲了些什么话，就让他们出来了。”

因为没有记日记，这件事究竟是出在哪一月、哪一日都不知道了，连年份也搞不清了。不过，仲翁住在渔阳里，我们又住在他家里时，他总是被捕过一次的。那时有许多学生代表由北京来，由别处来，有不少总是住渔阳里，而我们又在五马路店面楼上新租得一个过街楼，于是约在1919年底、1920年初，我和鉴初兄就住在店里，不夜夜到渔阳里去了。^①

《尝试集》与《三叶集》

亚东出胡适的稿子最早是翻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是由到北大出版部去相帮的洛声哥挂号寄来给我们出版的。共十篇短篇小说（有法国都德、莫伯三〔莫泊桑〕，俄国契诃夫，瑞典斯特林堡等人的），末尾附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我们收到后好不高兴，立刻划好格式，付排，细校，很快出版了。这

① 汪原放对此事时间的回忆不甚确切。据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等有关材料，陈独秀这次被捕的时间为1921年10月。

本书是1919年10月10日登广告的，到第二年止，我们印行了三版，计七千册之多。

接着就是白话诗集《尝试集》，是1920年3月出版的。广告云：“放翁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有自序，有钱玄同先生序，书分两集，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为“附录”。

1920年5月，又出版了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通信集《三叶集》。为什么叫“三叶”？田汉给这本书写的《序》说：“Kleeblatt，拉丁文作Tri-folium，系一种三叶叠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Kleeblatt结合了。”三人通信所论的问题是：一，歌德的文学。二，诗歌问题。三，近代戏曲。四，婚姻问题。五，恋爱问题。六，宇宙观和人生观。



《三叶集》书影

到1953年亚东结束为止，《尝试集》总印数为四万七千册，《三叶集》为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册。当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新青年社”独立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说到：“新青年社由群益书

局独立时，书社的老板提起过诉讼”。（见现代书局 1933 年版《创造十年》第 17 页）

《新青年》从 1920 年 9 月出第八卷起，脱离群益，独立出版，由陈独秀邀陈望道参加编辑，设新青年社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大自鸣钟对面，另设编辑部于环龙路渔阳里。这是出版史料里有记载的。

“提起过诉讼”，我不很清楚。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铔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

“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1921 年，“新青年社”迁移到广州昌兴马路 28 号二楼。上海方面，托伊文思图书公司和民智书局经售。前后几年，“新青年社”出版的书不少，从一次“大廉价”的广告里得知的书名就有：《社会主义讨论集》、《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哲学问题》、《阶级斗争》、《工团主义》、《俄国共产党党纲》、《列宁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记实》、《京汉工人流血记》等二十多种。广州“新青年社”后来并入人民出版社了。

“新青年社”在上海创立时，经理是苏新甫先生，迁广州后，

想必也还是他负责的。还设在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时，有一天，同事罢工，几个人都跑掉了，上午到了十点钟还不能开门。苏先生急得没法，去找仲翁，仲翁写了条子给他，他连忙到亚东找我的大叔。结果，从亚东去两个人帮忙，才把店门开开做生意的。我大叔到牯岭路时说起，是为了闹工资，他调停了一场，大家倒都重新回店了。

第六章 “亚东版”古典小说

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一篇杂文中说：“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说我“已经成了古人”，是一个误会。至于说我标点的“亚东版”中国古典小说“有功于作者和读者”，则真叫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要出标点、分段的《水浒》

是“五四”后，我大病一场，到1920年初，总算好了。有一天，我忽然对着鉴初兄（胡仲荪）说：“仲荪哥，我有一个计划，要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大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先出一部《水浒》，要校得没有错字。如果不成功，算了；如果成功，再做第二部。”

仲荪哥搓着手，笑着说：“好，好。我看一定行。”和仲荪商量什么事，他总是搓着手道：“好，好。”后来大家竟给他起了个浑号：“搓手板的”。

我于是只管去买了几种石印的、铅印的《水浒传》，又买了

红银砂，动手标点起来了；同时用蓝色做分段的记号。

记得我把《水浒》标点、分段都已经预备好，急于要付排时，我的大叔对我说：

“事情大概可以做。不过把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一概删掉，妥当不妥当？事情不是好玩的，标点、分段，靠得住靠不住呢？”

“仲翁来的时候，我要问问他，究竟做得做不得。不要闹出笑话来。”

“几百页的大书，不是好玩的，凶险哩！卖不掉，老本亏掉，不得了！”

他走开后，我和鉴初兄说：“我敢说，仲翁一定赞成的！”鉴初兄只不响，又只管搓手板了。

仲翁又到店来了，大叔和他谈起我标点《水浒》的事。仲翁很高兴，说：“这有什么出不得！好的，我来拿去看看罢。”当即把头本包好拿去了。不料，第二天仲翁又到店来，上楼便说：真糟糕！昨天买香烟时把一本《水浒》忘在香烟店柜台上，丢失掉了。我赶紧说：“不妨，不妨，我再点一个头本。仲翁如果有空，我拿第二、第三本请仲翁先看看要得要不得，好吧？”仲翁说：“好的。”

过不了两天，仲翁又来了，说：“我看过了，还要得。眉批夹注，删掉不错，让读者自己读。”一面又对我大叔说：“前些时，适之有信给我，说他要写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我昨天有信给他，告诉他原放在标点、分段，打算要排印了，要他早点把《水浒》的文章写好，或者可以放在前面做序。且看他回信怎么说。”

大叔道：“仲甫，你也要写一篇才好哩。”仲翁当然答应了。我连忙再去买了一部同上回买的同样的石印本《水浒》，

把头本重新点好。立刻去印刷所打了一个样张来，大家看了，对每面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天地头，都再三的商量、讨论，认为很妥当了，于是开排。

有一天，仲翁又来了，拿了适之兄回给他的一个明信片来给我大叔和我看。上面有一句，我记得是：“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

我们店里几个人都知道了，都很高兴、欢喜，我大叔也只管去筹划出书的钱了。

正在这时候，1920年春天，我去印刷局从牯岭路余庆里路过，看见一张红纸“招租帖”，是牯岭路114号招租。在我的坚持下，大叔同意租下这一楼一底。主要是图近便，这里离“民友社”和“太平洋”两家印刷局都近，到协顺装订作也近。这样我伏案的时间多得多了。我和鉴初兄说：“来，我们两个再来过渔阳里的日子罢。我们搭两个铺。我一个人校，吃不消，你夜里来，我们来赶《水浒》出版。”

我们校校样，至少三校。我校初、二校，鉴初兄来时，再同校三校，一起商量、讨论，力求校得一字不错。这样一来，往往在夜里很忙，因为两个印刷局的校样，差不多总要到傍晚他们歇工时送来，而我们又总想早上便把校好的样子送去改正。牯岭路的房子里还没有装电灯，我们便用洋蜡烛校书。夜里和鉴初兄同校，其味无穷。大概到夏天，《水浒》便差不多排成了。

有一天，店里打电话到“太平洋”，对我说：“《水浒传考证》寄到了，一卷稿子，要你去拿。”我真高兴极了，心里想：“我打的一份有光纸的《水浒》清样寄去倒不多几天，《水浒传考证》，有几万字，竟做好了。真快！”

我把适之兄的《水浒传考证》拿到店里，恰好卢仲农先生

也在店中，立刻上楼去看。卢先生，我大叔，我，仲荪哥，挨着一页一页看。卢先生先看完，高兴地对我说：“小哥，附上骥尾了！”

我随即拿到牯岭路划好排式，马上送到“民友社”，请他们加快排。

陈独秀的《水浒新叙》“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七日”便写成了。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是“九（1920），七，二七，晨二时脱稿”，现在也差不多排成了。总在8月初，我们预备登广告了。

这里要补叙几句我同胡适之的关系。早在1916年，我在思诚学堂的同学许怡荪（他在高等，我在初等），从日本留学后回上海，我大叔、我、洛声哥、仲荪哥去旅馆看他。他拿出胡适之从美国寄给他的《藏晖室劄记》给大家看。我看得不肯放手，他干脆借给我带回去细看。记得其中有《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等，我非常赞成，还录了一些放在手头。后来《新青年》第一次发表《藏晖室劄记》时，有署“怡菴识”的“绪言”。这“怡菴”，就是许怡荪兄，后来他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书，不幸死于校中。

1917年，偶尔看到广告，三井洋行华文打字部招考练习生，我同洛声哥去应试，在那里学了几个月中文打字。之后，三井洋行又要我随同他们的人去汉口、北京推销华文打字机。到北京，想住绩溪会馆，但无空房。当时，翼谋兄（胡子承先生的儿子）在会馆，他说：“我来和一涵先生、适之兄商量一下，如果住到他们那里，离三井洋行近得多了。”

第二天，翼谋兄就陪我住进了适之兄和高一涵先生的住处——竹竿巷一庐。从1917年12月初到第二年1月中，在

适之兄处住了一个多月。适之兄就在这期间动身回里结婚的。我日记上还有替他饯行的记载。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适之兄看见我在看英文的《希腊史》，他翻翻说：“我看不如读读《莎氏乐府本事》。”又要我和他侄儿思聪看看《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

因为有这段交往，亚东又出了胡适的新诗《尝试集》和翻译的《短篇小说》，加上有陈独秀的关系，所以他热心支持我出版标点、分段的《水浒》和其他古典小说。

适之兄南来

《水浒》快要出版了，忽然接到适之兄的信，说是他日内要到上海，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办的暑期学校教书。我好不高兴，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向他请教的。

不日，店里有电话到“太平洋”，说：“适之先生到了，要来看你，你来先看他罢。”我立刻去了。我们谈谈《水浒传考证》已经排好，正在预备做封面，等等。差不多是中饭时了，适之兄要请大家吃徽馆。我的大叔道：“适之，我来请你才对。徽馆，第一春很不错。”

我们到了四马路昼锦里口的第一春菜馆，在吃酒时，适之兄笑着，站了起来，道：“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

我也站了起来，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很不容易做好。这回是尝试试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

饭后，适之兄兴致很好，竟同鉴初兄和我到牯岭路去看看

我的工作场所。他把印好的大部分的《水浒》翻看了一回，说：“印得还不错。我看，你最好还要写一篇《校读后记》，把校读的经过说一说，不必多，有些认为有问题的地方，都举出一些例子来说一说。我的意思，还要再做一篇‘句读符号说明’放在前面才好，不妨用本书的句子做例。”

我认为很好，过去实在不曾想到，当时便说：“好，好，我就动手写起来。写好送到你那里，请你改一改才好。”

第二天，他又有空来过一次。我连忙拿出打好的草稿请他一看、一改。他改掉了一些地方，说：“很好，很好，行了，你拿去排罢。”原来《水浒》版权页上“句读者”写“亚东图书馆”，适之兄又提出：“原放，‘句读者’应该老老实实的打上‘汪原放’。”我依了。我想：打上个人名义，责任更重；如果挨到批评，不好推到亚东图书馆上面便算了。

适之兄又说：“我在南高暑校有一些时的课，讲哲学、文学。我看，你还可以做一本样本，排几页标点、分段的《水浒》，再把《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等各排一两页，订成小册子，寄一些给我，我讲课时可以散发一下。孟邹说预备到那里去卖，出书的时候，可以去。如果去，可以到南高梅盒找我，我住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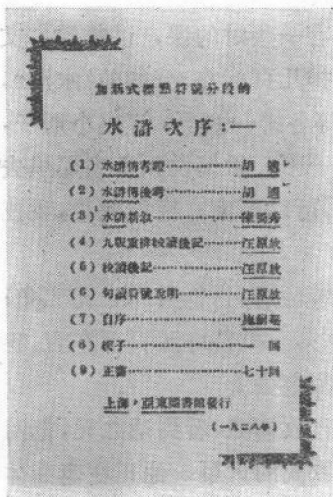
8月中旬，《水浒》出版了。洋装两册，售价大洋二元二角；平装四册，大洋一元八角。装订作第一批装好四百部左右，我叔父决定让我全部带到南京高等师范去卖。

我到了南京，雇了一辆马车，直放梅盒，看到适之兄，把四大包书放在大厅旁边。我随即去看我的大哥，他正在南高体育科学体育。他又去约了在别科学学习的章洪熙（衣萍）、胡培翰（大刚）两位同学来。他们都很热心，说：“夜里就要布置一



“亚东版”《水浒》书影

下才好。”于是衣萍兄和我便到北门桥去买红绿纸、墨汁、浆糊等，大刚兄便去打听南高大门边的一个大披棚明天什么时间可以给我们卖书用。当夜贴出了许多“明天下午一时在大披棚发售标点、分段的《水浒》”的招贴。



《水浒》九版重排本的目次

第二天上午，适之兄上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了《水浒》。饭后，一点还没有到，已经有人来买《水浒》了。后来，越来越多，大概不多大一会工夫，四包书已经卖完，只好收摊了。衣萍、大刚兄说：“带少了，照情形看来，再有四包，也卖得完。”当夜，我就回上海了。

我8月18日到南京，19日回上海；次日，8月20日，正是店里开卖《水浒》的一天。

仲翁提携后进

我从南京回到牯岭路，最急的事情是要赶出《儒林外史》。因为资本问题，商量来，商量去，《红楼梦》篇幅过大，不能不放到后面再出。

《儒林外史》将排成时，适之兄来信说，可以把他写的《吴敬梓传》放在前面，还有四种附录，等他的侄儿们抄好寄来；同时说，他已经请钱玄同先生写一篇新序，不日可以寄到。我们很高兴。

正在这时候，我的大叔又去请仲翁写序，岂知他说：“你要原放写一篇，拿来给我看看，如果有不当的地方，我来替他改一改。”我的大叔道：“恐怕不行，他怎么会写！”仲翁道：“如果真不能用，我一定再写一篇。”

我的大叔回来告诉我，我想：只好大胆试一试了。我写完后，去看仲翁，他立即细细的一看，拿起笔来改了几个字。临走，我问：“这后面的一行要写上名字……”仲翁道：“你写我的名字好了。”我回店告诉大叔，随即加上了序末的一行：“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我的大叔要仲荪哥看后，说：“仲甫！……”我当时想，他没有说下去的，无非说仲甫肯奖诱后进、提携后进的意思。

我老实说，从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曾为标点、分段的旧小说写过一篇什么别的序了，实在很辜负仲翁的期望哩！不过凡我标点的，部部书的《校读后记》和《标点符号》都是我一手包办的罢了。

《水浒》初版本来预备印二千部，一次次地决定加，临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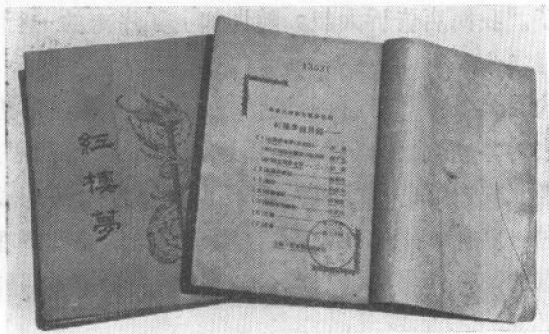
时决定加到了五千部，卖了一年才再版。《儒林外史》初版印了四千部，但只卖了三个月便再版了。

《水浒》、《儒林外史》先后出版后，报上见过一些评论文字。有滥加攻击的，不去说它。也有既鼓励也有所批评的，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力子（邵）先生的“《用新标点翻印》的《水浒传》”，晓风（陈望道）先生的《评新式标点的“儒林外史”》等。适之先生还曾寄给我日本京都《支那学》第三号正（？）木正儿的一篇《新式标点“水浒”》。后来《水浒》、《儒林外史》等都曾依据大家对标点、分段的指点，修改重排过新的本子。

紧接着出的是《红楼梦》。《水浒》出版于1920年8月20日；《儒林外史》，同年12月1日；《红楼梦》是1921年5月5日出版的。

这部《红楼梦》载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后记》，顾颉刚的《答胡适书》和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在出版预告中声称：“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写成于“十（1921），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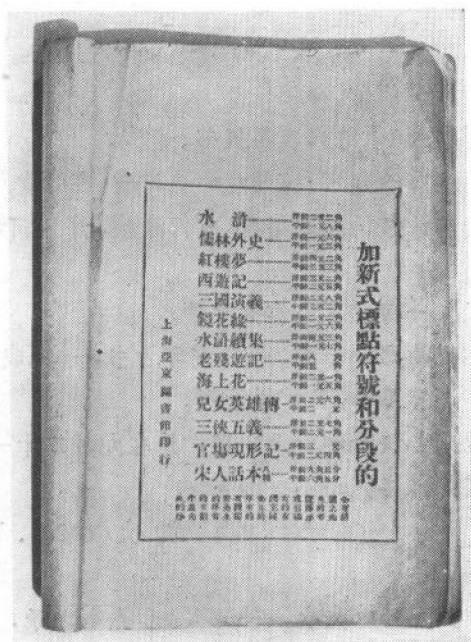


“亚东版”《红楼梦》书影

七”，由北京寄来。陈独秀先生的《红楼梦新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叙于广州看云楼”的。那时他正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长。

《红楼梦》平装六册，要抵一部半《水浒》（平装四册），抵三部《儒林外史》；初版共印四千部，计二万四千册。定价每部三元三角（洋装四元二角）。

随后我陆续标点中国古典小说有《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有的书其他同志也参与工作，例如《镜花缘》我标点



印于本版书上的加新式标点符号
和分段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广告

了十分之四，下余是章希吕、余昌之两君完成的。后来，我的大哥乃刚、妹妹协如也曾标点过《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今古奇观》等旧小说和话本。以上都由亚东出版。

三封信和一席谈

适之兄和仲翁关心标点本古典小说的编辑出版，还有什么可记述的呢？

手头还有适之兄的三封信，可以照录。

第一封：

原放：

谢谢你的信。

洋装的《水浒》，我要五部。

你借得一部木板《儒林外史》——齐省堂版，很好很好。请将此书的出版年月，有何序跋，序跋何年月，一并告我。

又末一回也可决作为附录。

你说的那个念头，——翻印古书，——我也曾有过。但此事不容易办，当缓缓计划。

北京各校开学尚无定期，约在九月二十一左右。此时来甚好。洛声还不曾回来。

适。九(1920).九.三。

又一封云：

昨见金仍珠先生，——即金和先生之子，——他说，看《儒林外史》，发现一个大笑话。我回来一查，果然。

三十五回，十一页，末行。“不象杜少卿要把樽壶带

了清凉山去看花！”

各本皆作“尊壶”；一本“壶”误作“壺”，但无作“樽”者。

“尊壶”（“壶”读如“阍”），不知如何改作了“樽壶”，便成了笑话了。

又钱玄同自己告诉我他的序里也有一个大笑话。

页一八，“王玉辉……旱路上船，”

原文是（四十八回，页九）“王玉辉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钱先生匆忙中，把“旱路”二字连下读，遂成了“旱路上船”的笑话了！

寄此二事，以见错误之容易。

原放：

适。十（1921）。一。十七。

再一封云：

原放：

你的信收到了。谢谢。

你如此做去，我可断定你得益不少；等到你圈读第四部书时，你定可不须别人帮助了。

“每段起头无主词”一句话，说的容易，做到很难。上次思永为了“大观园题咏”一回，感受困难不少。他来问我，我也着实感受困难。那一册你收到了吗？

词、诗、序、评，我另纸圈出。

七十八回，明天寄出。

我的木板（活字木板）《红楼梦》前面有高鹗一序及“小泉（即程），兰墅（即高）”合作之《例言》为他本所无。序为乾隆五十六年，例言为五十七年，皆可供考证。故我叫

永抄出寄给你付排，可排在程伟元一序之次。我这部确是乾隆辛亥本。有正本并不是原本，其题为“国初抄本”，更不通！有正本已有批注，其为晚出本无疑。

《西游记》亦须早日访求好木板本。最好是无有“悟一子”批注的。切勿匆匆动手！我若早知你们动手点读《红楼梦》，我早把我的乾隆无批本借给你了。等到我知道时，你们已排了七十回了！我近来买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传》。……

适。十(1921).一.二三.

适之兄如此关注，亚东如何酬谢呢？1923年《孟邹日记》有一则，照录如下：

四月二十八号，星期六，晴。下午到馆，晚请适之于都益处，旋同至馆中谈商一切，告以每月送他一百元：一是报他已往助我们的劳绩；一是托他以后介绍并审查各稿云云。

在牯岭路的几年，仲翁只要在上海，隔几天便要来一趟。有一次，恰好和适之兄碰面了，两人大谈特谈。那时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如《今古奇观》等，有些淫秽的地方，给青年们看了，学生们看了，不很好，不知道要怎么办好。于是有了两人之间一席谈：

适之兄主张删节，用“……”表示有删节。

仲翁道：“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我们依了仲翁。

鲁迅先生的误会

1924年的时候，鲁迅先生怎么会以为“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呢？

这就要讲到洛声哥不幸去世。洛声哥正名章洪钟，是先大姑的儿子。前面提到过，他曾在亚东工作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来服务于北京大学出版部。在北大出版部时，就住在胡适家里；每年回南一次，回家。不料，1923年夏天，竟病死里中！

洛声哥去世，对亚东的影响很大，可以说在北京少掉了一种大力帮助的力量了。亚东出胡适译的《短篇小说》，是他到北京后寄来的第一种新的出版物。《尝试集》也是他寄来的。可见他处处关心亚东。

俗语云：“十里无真信。”洛声哥和我是姑表兄弟，两人都时在胡家来去，和胡家的关系很深，听见有人死了，也搞不清楚究竟，一传两，两传三，竟错把洛声哥去世当做我去世了。这种误会也是有时会有有的。鲁迅1924年1月28日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杂感《望勿“纠正”》，就是由于这种误会而闹错了。

1924年4月，我为编辑出版《胡适文存二集》的事到北京去，走进适之兄家，他一见面就笑着道：“报上说你死了，你知道吗？”后来同游中央公园，洪熙兄（章衣萍）们又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古人’了吗？怎么跑到公园里来玩了！”

据适之兄对我说：“鲁迅先生在中央公园看见我，问我说：‘原放在不在？’我说：‘他已经到北京来了，住在我家里。’后来他知道误会了，把洛声当做你了。”《望勿“纠正”》一文收进《热

风》时，鲁迅先生特意加了一个短短的跋^①。

鲁迅先生这篇杂感的意思，无非希望把校点古书的工作做好，不要随便才好。说我标点小说“不免小谬误”，这是多么原谅我、宽容我、袒护我、善诱我！又还说我的工作“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真使我十分惭愧。

^①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卷第409—410页。

第七章 几种“文存”的出版

孟邹先生回忆：自从有独秀和适之等帮助做序的《水浒》出来以后，很受欢迎，亚东营业已有转机。后来又出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营业更蒸蒸日上，同事也加到二十多人了。

《胡适文存》带出了《吴虞文录》

记得《红楼梦》还是我和鉴初兄在洋蜡烛下校成的。这部书出版后，章希吕兄来了，不久余昌之弟也来了。这时牯岭路房子也扩充了，把 115 号完全租下，楼上打通，成了两间，一间是我、希吕、昌之的办事间，一间做了卧室；楼下也打通，做了栈房。也是这时，才决计装了电灯的。我的大叔起初不许，后来才不干涉了。

希吕兄原是徽州府第三中学教员，同我大哥同事过。事先，我大哥向我提起，希吕兄很想来相帮。我道：“好是好，只怕不会来。在中学教书薪水大，这里薪水小，恐怕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

后来我的大叔说：“事情真多，真有点忙不过来了。我天

天要在外面跑。鉴初也要完全顾店里的事，不能帮着校书了。希吕来，很好哩。不过薪水是问题。太少，他来不合算；太多，亚东又负担不起。”

我道：“他在那里有三十多元一月，到这里来，拿十二元总不行。我看至少要二十元才好。”

商量的结果，希吕兄、鉴初兄和我的薪水都定做每月二十元了。原先鉴初和我每月十二元，是店里最高的。

1921年，除了希吕兄、昌之弟以外，店里还新进来一些人。全店同人一共已经是十八人了。

《红楼梦》出版后，我和我的大叔回绩溪老家去了一趟。虽然栈里有希吕兄在应付，但我手上的事还多，所以不几天，我便先我的大叔回上海了。

不多日子，我的大叔也回上海了，说他和适之兄通信，已经得到他的同意，决把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部文集。大叔要我到北京去和适之兄接头，把稿子搞好，带回排印。我对于这件工作，当然十分赞成、欢喜，立即准备北上了。

适之兄那时不住在缎库胡同，已经迁居在钟鼓寺了。钟鼓寺的房子大得多了，好象是四合式，院里有大树。书房里临窗的办事台比从前的小台要大上几倍了。我去了，同他的侄儿思聪、思永住在一处。这回，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嫂。适之兄到北大去上课时，自己有包车了。他仍旧只穿一件竹布长衫，象一个大学生。

有一天，杜威先生和夫人来了。关于杜威先生的讲演录，在《新青年》等等里都曾看过。在他快要回国的时候，竟有机会看见他们夫妇一面，真很高兴。

又一天，适之兄和我同游中山公园。正在吃茶，忽然有一

位先生从座旁经过，适之兄招呼他，他便一道坐下了。适之兄介绍说：“这位是吴又陵先生^①。”又介绍我，说是“亚东图书馆某某。”后来吴先生提起文集出版，适之兄说可以由我们担任。

“‘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的《吴虞文录》决定给我们出版，这是很难得的。后来适之兄说起，这部书里的文章引用古书很多，标点、分段都很不容易。结果，他去和钱玄同先生一谈，钱先生一口答应了标点、分段的工作，真很可感。老实说，我们店里的人是很难胜任哩。

我记得在北京的时间并不久，我就回南了。《胡适文存》有许多都是发表过的，可以在期刊上剪下，大家相帮收集，把目录编定，我就可以回上海付排了。想不到除了这部大书，又还另外得到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小书《吴虞文录》的出版，真是说不尽的欢喜。吴又陵先生有不少非儒的诗，在《甲寅》杂志里倒是早已拜读过的。

在北京时，还和适之兄讨论过标点符号、分段、排式等等。我说起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工作渐渐的觉得很难了。他因此谈起北京大学招考要考标点、分段。他说：“标点、分段确实不很容易。因为北大招考要考标点、分段，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会，讨论了一下子。随手拿出一本《汉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有的说：‘考标点，最好要定出一个标准来；不然的话，看卷很不容易。’有的说：‘很好，我们何不来试一试。’大家赞成，就分头标点了。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哈哈，没有一个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

^①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论》等文章。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任教四川大学。1949年病逝于成都。

谈到排式，设想了几种：一种是标点符号排在字下，占一个字地位，缺点是遇到行头点不好办；另一种是排在字旁，也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同字旁要排的专名号发生冲突；第三种是标点符号排在文字的一边，专名号排在另一边。后来《胡适文存》决用第三种排式，再加上一条：每句空一格。

《胡适文存》是我和希吕兄一同排校好的，昌之弟有时也参加。这本书的校对是比较困难的。适之兄虽然很细心，但是引用的文字有时还是不免有错。所谓错，是说有的地方或者会漏了一句引文，甚至也有漏了一小段的。有些年份，有时也会错掉十年、百年，譬如1777年错为1877年、1698年错为1688年之类。这些小处(?)虽然不多，我们既发现了，总要找到原文来校定，因此我们随时要买参考书了。那时我们的参考用书实在太少，自从出《胡适文存》，随时添置，经过几年，我们应用的参考书才相当完备了。

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立刻会提出，记下，进行查考。常有这种情形：

昌之道：“我看这一句一定是漏掉了，不是他有意要删掉的。”他翻着木版本的书里的那一段，夹着纸条，做了记号。

希吕兄立刻查对，说：“一定是漏掉了，不是删；如果是删，他会用‘……’的。”

我再一看，说：“这一句是要加上去才好。”

三人商定，改好了。希吕兄有时会说：“博士常常要摸夜，疲倦了，抽一支香烟，再接下去抄。漏掉一句，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校书时，往往在初校就提出的问题，到二校还不能解决，一直要到三校，甚至末校，才能改定。总要查考下来，肯定是错了的，才改定；同时立刻发快信到北京和适之兄商定妥当



《胡适文存》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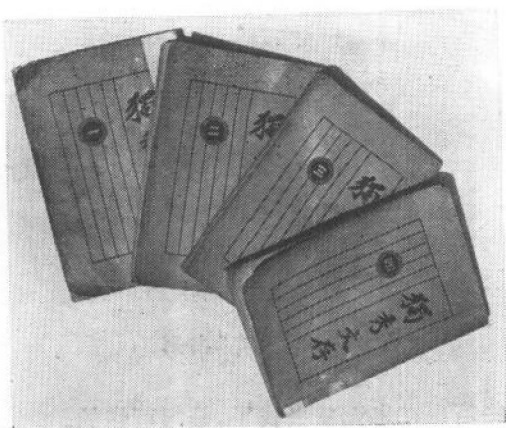
与否。这些信现在也无从去找了，是很可惜的。

《胡适文存》1921年12月15日出版，全书六百余页，五十余万字，分为四卷，初版印了四千部。《吴虞文录》比《胡适文存》早两个月出书，初版印三千册。广告云：“吴又陵先生是一个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这部集子里的文章，非孔的居多数。要知道孔子之道何以不合现代生活，不可不看。卷首有胡适之先生序。”

出版了的和夭折了的《独秀文存》等

1922年9月，赶排了《独秀文存》。我的大叔同仲翁商定后，仲翁就动手编。快成功时，我才到渔阳里去接洽了一番，便拿来付排了。比之出《胡适文存》，要跑北京，总是方便得多。

这年的11月、12月，《独秀文存》各印了三千部。当时店里有人说：“出迟了一点。”又有的说：“印少了。”意思是，如果出得早一些，还可以多印些，两个月里不会只售出六千部。不过出《独秀文存》，实在是战战兢兢地出的，当时仲翁因在大世



《独秀文存》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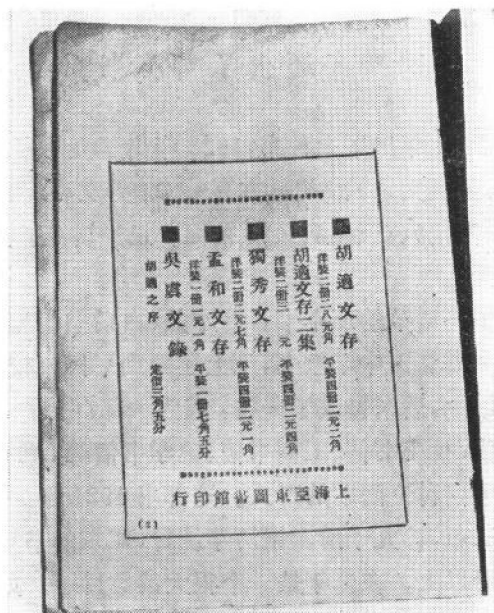
界散传单被捕，出来还没有多少时哩。虽然这部《文存》里的文章，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面已经有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了。到了《独秀文存》二集又由仲翁亲自编定以后，竟就不敢出版，只有搁下了。

那是还在牯岭路时候的事情。仲翁编好《独秀文存》二集拿来了，在目录上，哪些文章没有找到，他都一一注明，要我们想办法找一找。他自己也在找，找到，就拿来。他有时来，会带一些他找到的文章来，有的是剪下来的，注有时日等等。

瞿秋白先生的“文存”，也编好了，是他一包包的交来的。

那时候，时局有点紧张了，我的大叔主张缓一步再排，要看一看情形，因此搁下了。想不到时局越搞越紧，不但不能排，而且不能不想东放西放、东藏西藏了。^①

^① 作者在另一处说，他的大叔曾经讲过：“这里还要一说瞿秋白的文集。一九二七（民十六）年，他给我出版，后来遇到反动国民党清党，只有将排成的版子毁去。此稿由我保存到解放，共二十三年，才由杨之华来拿了去。”



印于封底里的几种“文存”、“文录”的广告

结果，两部大书(《独秀文存》二集、《秋白文存》^①)都不曾排印出版。当时如果只管排、印、卖，也可以做到；可是我的大叔总说：“不能不看一看风头再动手。出事，吃不消呵！”

除《胡适文存》、《吴虞文录》、《独秀文存》外，出了书的还有《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和《孟和文存》（1925年）。《孟和文存》是陶孟和先生1915年—1924年的文章，分为三卷，卷一关于社会方面，卷二关于政治方面，卷三关于教育方面。

① 1927年瞿秋白自编的文集，书名为《瞿秋白论文集》，有自序。

这两年还出了哪些书？

亚东 1921 年出了七种书，1922 年出了九种书。

其中《吴虞文录》、《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和标点本《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前面都已经讲到。此外，还有什么书呢？

还出了高语罕的三本书。一本是《白话书信》。当初高语罕先生在芜湖赭山中学教书，晚上还要到平民夜校教课，他用书信体教学生，后来修改了一番，成为一部《白话书信》，内容有家庭书信、社交书信、工商书信、论学书信等，独创一格，采用了来往书信讨论问题的形式。这部书 1921 年 1 月出版，当年就印了三版，计九千册。据历年统计，亚东的书只有这部书印过十万册以上。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如果连后来给人家盗印的计算在内，数目更大了。1922 年 8 月他到德国去留学，自用与家用，全靠这部《白话书信》的版税。版税照定价一成，《白话书信》定价八角，版税就是八分一本，总算的数字是很可观的哩。高先生回国后，还写过《白话书信》二集，获得的读者也很多。

1922 年 9 月，又出了高语罕先生编的《国文作法》。同年还出过他的一部《广州纪游》，是用日记体裁记叙广州的市政、教育、社会状况的。《国文作法》获得的读者不少，初版印四千，不久便再版，历年大概印了三万几千部。《广州纪游》销场不很好。不过高先生在德国留学两年多，靠《白话书信》和《国文作法》两书的版税，勉强可以够用了。

1922 年还出了四部新诗集：俞平伯先生的《冬夜》，有自

序和朱自清先生的序；康白情先生的《草儿》，主要是新诗，附有几十首旧诗词和《新诗短论》，有自序和俞平伯先生的序；汪静之的《蕙的风》，有朱自清、胡适之、刘延陵的序和自序；本社编的《新诗年选》（1919年），计选入四十二家诗八十二首。

另外还有三本是：

李璜译《法兰西学术史略》，系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内容有：一、哲学史略（柏格森著）；二、群学史略（涂尔干著）；三、教育学史略（拉比著）。

孙俚工编的《中国语法讲义》。这部文法曾在漳州第二师范、长沙第一师范作过两次实地试验。书前有邵力子、陈望道两先生的序。

胡适著的英文的《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这部书是胡适之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这部英文书是托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排印的，真排校得又快又好。末校送来时，我们也细校一过，可是竟不曾校出几个错字。我觉得商务的组织真很严密而精良，非常佩服。“民友”、“太平洋”虽也可排英文，但只能排小件，绝对不能排书。

还有应当提到的是《向导》周报的出版。

1922年的《孟邹日记》有一则：

九月六号，星期三，晴。访仲甫，与我谈商周刊事甚详。

仲甫谈的“周刊事”，就是《向导》周报。

为《向导》事，仲甫还曾有一短信给我，如下：

原放兄：

周报用最好的报纸印四千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

询明示知。

弟重辅白

九月八日

这是1922年的短信，是用中式信笺、毛笔写的。我记得和鉴初兄参考我们的“成本计算表”，把初版、再版的计算法完全告诉他了。

记得在《向导》出版前，有一天，李达先生到牯岭路看我，说是陈仲翁要他来和我商量《向导》要怎么排印才好。我说：

“《每周评论》是八开的，不好收拾。我看还是照《新青年》，十六开的好。

“现在的周刊，如果用十六开，四页也好，八页也好，我不必装订。不知道你的意思觉得怎么样？”

“版心分上下两排好。”

《向导》第一期出版于1922年9月13日。出版地址是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分售处：广州昌兴马路28号；上海亚东图书馆；北京国立大学出版部；长沙文化书社^①。出到第二十六期，上海分售处改为上海书店、民智书局。出到第九十六期，分售处加多了，也有芜湖科学图书社代派了。

① 亚东图书馆同文化书社等早已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据汪原放的《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文说，陈独秀曾为恽代英同志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各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1920年5月到7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帐册上均有原始记录。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十年内乱中，这些帐册都已经散失了。（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五期，刘建整理）

十年纪念

亚东图书馆从1913年在惠福里开始营业，到1922年恰足十年了。

我们搞了个“十年纪念廉价”，编了二十个广告，实际上是图书分类广告。例如，胡适的著作《先秦名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短篇小说》合为一个广告；新式标点的中国古典小说五部为一个广告；还有陈独秀、胡适、吴虞的《文存》、《文录》；新诗五种：《尝试集》、《草儿》、《冬夜》、《蕙的风》、《新诗年选》（1919年）；高语罕的三种著作；胡适的《短篇小说》、章行严的《名家小说》等等，都各各分别做成一个广告。还有一个广告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的合装本，还有它的增刊、特刊和丛书，计有“诗学研究号”、“妇女号”、“日本号”、“宗教问题号”、“学会问题号”和一本《法兰西学术史略》。

归总起来看，亚东十年一共只有二十多种书，连《少年中国》合装本以及几种特刊算在内，也不过是三十种左右罢了。但是话又要说回头，出书种数虽不多，却也不能算少。因为所有这些书，都是1919年“五四”以后陆续出版的；而且其中又还有些大部头书，一部要抵不少小本的书了。

到1922年，我们的书有的已经再版、三版、四版了。我们一共究竟印了多少书呢？到1922年年底截止，列举如下：

1. 《名家小说》，印了一版，一千部。
2. 《短篇小说》，印了四版，共一万一千部。
3. 《水浒》，印了四版，共一万四千部。
4. 《儒林外史》，印了四版，共一万三千部。

5. 《三叶集》，印二版，共六千部。
 6. 《尝试集》，印四版，共一万五千部。
 7. 《胡适文存》，印三版，共一万二千部。
 8. 《吴虞文录》，印二版，共五千部。
 9. 《中国语法讲义》，印二版，共八千部。
 10. 《红楼梦》，印二版，共七千部。
 11. 《西游记》，印二版，共五千部。
 12. 《法兰西学术史略》，印一版，二千部。
 13. 《白话书信》，印六版，共一万八千部。
 14. 《先秦名学史》，印一版，一千部。
 15. 《国文作法》，印一版，四千部。
 16. 《三国演义》，印二版，共五千部。
 17. 《新诗年选》，印一版，三千部。
 18. 《冬夜》，印一版，三千部。
 19. 《蕙的风》，印一版，三千部。
 20. 《独秀文存》，印二版，共六千部。
- 杂志印数不详，不再录了。

第八章 编辑所正式成立 后的头几年

一九二三年十月间，亚东于长沙路成立编辑所。此后若干年，年出书十种左右。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适之兄来申治病，居我家数月，往来人等，议论种种，颇有值得一记者。

出书与组稿

牯岭路 114 号、115 号是两个一楼一底，后来 116 号又把楼面租给了我们，所以是三楼两底了。楼上很够用了，但楼下做栈房却不够，还得要租房子。

据《孟邹日记》，1923 年 9 月 28 日决定租下长沙路 210 号（正贤坊口）的房子，随即装修，10 月 22 日编辑所移至长沙路，24 日装好电话，26 日一切布置妥帖。为此在报上登过广告。此后我们出的书上，总要分别列出五马路发行所和长沙路编辑所的地址和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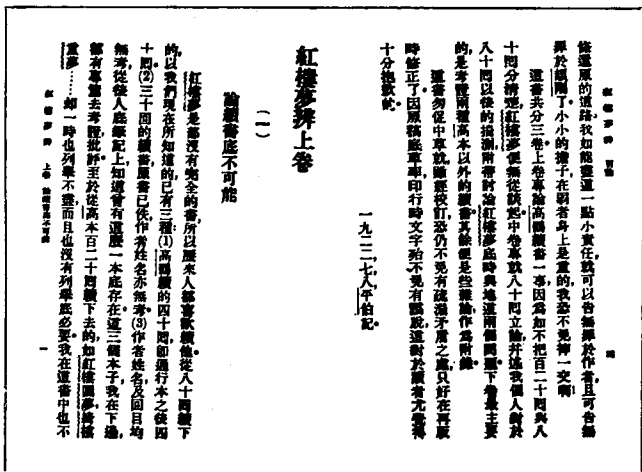
我想起 1920 年租牯岭路房子的情景来。当时，大叔一再说“怎么租得起！”还埋怨我“真正胡闹呵！”在我一再坚持下，

才算租了下来。想不到现在竟可以再租一个三楼两底，连一个过街楼，而且牯岭路的房子还可以保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以下我打算还是先写出新书的情形。

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的书也不多，只有八种。一一列下：

《红楼梦辨》，俞平伯著，顾颉刚序。全书分三卷，文七十万篇，共十余万字。



俞平伯《红楼梦辨》引论末页与正文首页

《镜花缘》(标点本)，有胡适的《镜花缘引论》。

《屈原》，陆侃如编。全书分三部分：一、屈原评传，陆先生著，凡五万余字。二、屈原集，将屈原的作品加标点，照新诗格式排。三、附录，校勘记等。卷首加《楚辞地图》。

《渡河》，陆志韦白话诗集。

《虚助词典》，施括乾编。

《科学与人生观》。这是一本论战文集。张君勱发表了他在清华学校的演讲——《人生观》，主张“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丁文江便作了一篇《玄学与科学》驳他，责难说：“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因此引起国内学者的讨论。本书所集的为张君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唐钺等十九人的文章，约共二十五万字，有陈独秀、胡适两篇长序。

《实生论大旨》，德国杜里舒著，江绍原译。

《流云小诗》，宗白华著。这是宗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出版的诗集。

1923年《孟邹日记》里有写到接洽稿件与排印情形的，录一些于下：

五月三号，星期四，阴。下午近三点，知行(陶)^①来馆，与他接洽《渡河》之事，结果不要稿费，只送他若干部的书即可行也。

五月四号，星期五，阴。上午到一品香访知行，未见。适之已由杭回，但亦未见得。……

五月五号，星期六，雨。上午十点，往晤适之，直谈至四点方回。……《虚助词典》，他谓可印，已与施君面决。

五月七号，星期一，阴。下午至华丰商量印书之事。《渡河》交他付排。

① 即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病逝于上海。

五月八号，星期二，晴。 下午又至华丰，《虚助词典》又交他付排。……

五月十号，星期四，晴。 ……今日介初（胡鉴初）去晤适之，病已较好，《镜花缘》序已经着手，幸事也。

五月十四号，星期一，阴。 午后到商务印所接洽印《名学史》之事。……

五月十九号，星期六，晴。 下午往访适之，畅谈一切。他说徐嘉瑞之《中古文学概论》尚可印行。此是机会，注意注意。

五月二十一号，星期一，阴。 陆志韦来讯云，《渡河》要钱，且所望颇大，与行知所许送书之议不符。此后此种间接交涉，须要再三谨慎为要。

六月三号，星期日，晴。 下午三点，知行到馆面商《渡河》之事，我答以稿费一百元，送书三十本云云。

六月六号，星期三，雨。 近日看“科学与人生观”各方面论文甚多，甚有意味。晚间请适之于功德林。

六月七号，星期四，雨。 今日接知行来讯云，“与陆君说好，《渡河》办法，一切同意。”

七月二十七号，星期五。 ……晚与介初同至北站候俞平伯君，接受江君所译之稿。

七月三十一号，星期二，晴。 上午九时，江绍原君到栈，面谈稿事，并付他一百元。

十月十七号，星期三，晴。 午请适之、兴周于第一春。《努力月刊》之事已与适之言明，归商务办，为有条件的让步。

十一月十号，星期六，晴。 下午到编辑所与希吕、昌之讨

论《水浒续集》之事。

十一月二十一号，星期三，晴。上午适之至编辑所做《科学与人生观叙文》。

十二月九号，星期日，阴。希吕、昌之去看梅兰芳戏，而仲甫独在编辑所做文，未免寂寞，我因陪他，至晚饭后方回馆中。

十二月十五号，星期六，雨。为明日《科学与人生观》等三种新书出版，发表十三种书特价，终日在民友社督工，晚至二时方睡；虽极辛苦，但已达我目的，全不以为苦也。

这很可以看得出接洽稿件以及排印的情形。可惜他的日记至此为止，再不记了。

日记里分别讲到11月21日、12月9日胡适、陈独秀在编辑所给《科学与人生观》写序。记得我的大叔曾谈过：

“他们都真有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

这两篇长序，我都读过的。我最欢喜陈仲翁驳张君劢的一大段。他说：“张君劢举出九项人生观，说都是主观的，起于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而不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律的科学所支配。”然后就大家族主义和小家族主义、男女尊卑及婚姻制度、财产公有私有制度、守旧维新之争持、物质精神之异见、社会主义之发生、人性中为我与利他两种本能、悲观乐观见解之不同、宗教思想之变迁等九项，逐一剖析。例如讲到财产公有私有，仲翁说：“在原始共产社会，人弱于兽，势必结群合作，原无财产私有之必要

与可能；（假定有人格之单一性的张先生，生在那个社会，他的主观、他的直觉、他的自由意志，忽然要把财产私有起来，怎奈他所得的果物、兽肉，无地存储，并没有防腐的方法，又不能变卖金钱，存在银行，结果恐怕只有放弃他私有财产的人生观。）”等等。最后归结说：“以上九项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

那时真很想多多的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才好。我读过《独秀文存》，看了这九项，老实说，有些懂得。况且我又还读过《共产党宣言》了。

家事和店事

这里要插叙一点我个人的家事。

我在这一年（1923年）9月1日结婚。妻子是南京吴秋霞。

在我的婚姻问题上，是经过一些曲折的。我从小就由家长做主，同周栋臣先生的女儿周锡琬订了婚约。1921年，锡琬和鉴初兄的未婚妻静仪一起，随希吕兄一起到了上海。锡琬、静仪又一起考进了爱国女学，由我和鉴初兄分别负担两人的学费。不知怎的，我和锡琬并不接近，后来更觉得和她同在一起，一同吃饭，是最苦的苦事，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于是我表示，我和锡琬绝难结婚，要求解除婚约。这件事，遭到大叔的反对，为此我和我的大叔大起冲突。1922年底，《独秀文存》赶出后，我手头已无急事，就跑到南京大哥乃刚那里去了。

这件事也蒙仲翁关心。他从莫斯科回国，到了北京，听说我同大叔闹冲突，跑到南京去了，即写了一封快信到上海，上海又用快信转寄到南京给我。

原信摘录如下：

孟邹先生、

原放兄同鉴：

《文存》出版否，至以为念。

弟于本月十日安抵北京，一切平安，特此告慰。

适之、洛声略略告我原放兄婚姻事件，弟以为孟邹先生应承认原放兄婚姻之自由，（即以栋臣兄付托论，强原放所不愿，终身不谐，又岂是幸事！）原放兄应觉悟，不可以恋爱妨碍了立身建业。男女之事，不过在生活上和吃饭、穿衣、饮酒、吸烟同样的需要与消遣而已，顽固老辈看做伦理、道德大问题，幻想青年看做神圣事业，都是错了。……我盼望孟邹先生仍应叫原放兄回店安心经营商业，原放兄亦应有觉悟，你两位都勿把此事看做大问题，要看做一种游戏的小问题。……

与君曼书，望即转交。

我在京尚有三星期勾留，望即回我一信。

程志孟白

一月二十五日

“程志孟”就是陈独秀先生。这封信是1923年的。他的信到时，我解除婚约的目的已经达到，可是对于我的终身大事的决定，是大有帮助的，我很感谢。

5月下旬，我同新订婚约的吴秋霞以及大哥乃刚等，由南京回到上海。经过一些准备，于9月1日结婚。我大叔特地

请烈武(柏)、行严(章)二公为证婚人,蒙即许未辞。婚礼是在都益处举行的。记得那天柏先生在都益处门前下车,想不到路边有两个破衣破裳的人跟上来,一声声的叫着“都督!都督!”向他讨钱。估计总是他的部下。我的大叔对我说:“仲翁从来不到的,都是君曼(高)到就是了。”君曼女士约我们俩次日游半淞园,她带了照相机去。又约到卡尔登(今长江剧场)看电影,喜子和黑子^①一起去。

当时牯岭路人多了,实在很挤。我就在白克路怀德里租了一间楼上的客堂间成家。结婚前一段时间,为经济问题,我同我大叔之间闹得很不愉快,在我大叔日记里有“他们(指我和我的兄妹)竟不知物力艰难,任意乱用如此,使我深为痛心不置”,“他(指我)之奢侈,已至于此,不能再忍下去,非决心使他与我分离不可”之类的记载。这也是我搬到外头住的一个原因。不过,相隔不长的时间,编辑所移到长沙路后,我又搬回牯岭路了。1923年10月底,我母亲和大姑(就是洛声哥的母亲,当时洛声哥刚去世不久)都到上海来了,也住在牯岭路。那时我大哥乃刚还在南京读书,二妹协如还在浒墅关蚕桑学校读书,也都到上海来团聚团聚。秋霞则于婚后上了神州女学。还有我婶母,先已经来上海了。

我的大姑、我的母亲,都在牯岭路见过仲翁的。我的大姑早已看过《安徽俗话报》,非常尊重他。我的母亲也知道他是我父亲的好友。仲翁来牯岭路时,有时是在晚饭后。我的母亲、婶母总要商量煮面或炒蛋炒饭给他吃。他最喜欢面食。我的母亲、婶母常说:“他苦呵!没有什么好的吃呵!一碗面,他

① 喜子,是陈独秀幼女子美的小名。黑子,是陈独秀幼子哲民的小名。

总觉得是很好吃的！”

仲翁的思想很新，但是他的派头还是一个老古派。我们弟兄姐妹见到他，真象是自家伯、叔一样，他也很象一个伯、叔。他做起文章来，有时是“金刚怒目”式，可是和我们谈谈，却真是很和蔼的。不但是对于我们，便是对于希吕、昌之，也是对自家的子弟一模一样。其实，对我们一店的人都一样的好。他问问出版的书的销场，听说还好，便觉得非常高兴欢喜。

那时，希吕兄和昌之弟他们已经搬到长沙路工作了，我还在牯岭路时居多。1923年，章焕堂表弟进店来了；还有周育和弟，也进店来了：他们都在长沙路工作。到了1924年，陈啸青兄、周道谋弟、我的大哥和我的协妹（他们都已经毕业），也都进店来了。只有陈啸青兄不久便调到发行所去了。还有学徒周观清也进了店来，在发行所工作。1924年，全店同事已有二十一人。

一直到1926年4月间，我们又顶下了新闸路鸿祥里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同时把牯岭路的房子顶出去。我在牯岭路首尾住了七个年头，这时换了新房子，办事间也搬过去了。

与仲翁、适之兄等的往还

这几年里，亚东与仲翁、适之兄的交往，一直是很频繁的。单是1923年11月，《孟邹日记》就有以下的记载：

十一月七号，星期三。午刻邀适之到栈吃粿，仲甫亦到栈，共谈一切。

十一月八号，星期四，晴。仲甫到栈，面取去大洋百元。

十一月九号，星期五，晴。陪适之就长沙路午饭。

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二，晴。今日又与仲甫闲谈一切。

十一月十四号，星期三，晴。上午访适之，与谈一切。……

今日又与仲甫谈论。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晴。上午与适之谈各事，晚请他在栈中吃“六大盘”。

十一月二十五号，星期日，阴。晚请彤侯（江）、仲甫、适之就栈中小饮。

十一月三十号，星期五，晴。我与介初（鉴初）、希吕、昌之同往北站送适之首途回京。（这趟适之是十月三十号由杭来申的。）

可惜，“共谈一切”、“闲谈一切”、“与谈一切”的“一切”，不知有些什么内容，竟都没有记下。

我当时最高兴的事情是知道陈仲翁拿了一百元去了；前几天，君曼女士到店拿过五十元。我知道是《独秀文存》的版税。我很高兴欢喜，因为我想起以前来了。那是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的时候，仲翁在上海，的确很苦。我的大叔有时要说的：“仲甫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要拿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回去了。”

仲翁在上海时常来，有时我的大叔没有回来，他会先和我们谈谈说说的。有一次，他谈到某先生（是指适之兄）。他说：“思想是不进则退的。”又说：“文学革命不仅要革去文言，提倡提倡白话，便算了事；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干的。一二百年前，也有很多的大部大部的书是用白话的。在今天，却不能不把用白话写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仔细的看看了，决

不能把那用白话写的东西，一概都作为好的了。”末了他还说：“一部大大的《圣谕广训》倒也是白话的！”这次仲翁谈的，是我记在自己的“劄记”里的，日期是1924年5月17日。

1925年春，我正在做重排《水浒》、《红楼梦》的准备的时候，正在布置把《儿女英雄传》和《老残游记》付排校读的时候，发生了“五卅惨案”。

那天一大早，我妹妹协如的一个女同学丁郁女士来了，丢了一封信给我的协妹，说下午要参加游行，立即匆匆忙忙的去。她的信象一封遗书一样，说是如果死了，望替她通知在绍兴的老母。我们都很担心。

记不得是夜里不是了，丁郁才回来。她说：“巡捕捉人，我们不答应，一齐跟进巡捕房，把巡捕房都挤满塞满了。正在这时候，听见外面有枪声！街上的尸首还没有收，血光狼藉的。真正气死人了！”

“五卅”之后第三天，6月1日，上海开始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二十多万人。我们店里也和五四运动时一样，和大家一道罢市的。

6月12日《民族》第三期刊载柏林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为“五卅”屠杀案于6月5日发出的宣言。宣言“很诚恳的慰问上海及全中国正在奋斗的民众”，严正申明“五百万组织在国际革命者救济会里的白种劳动知识阶级及工人现在和你们同声反抗黄白种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的土匪对于和平的工人及学生之屠杀！”宣言最后说：“你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各国黄、白、黑种民族之工人及劳动的知识阶级之世界大联合万岁！”签名者有英国肖伯纳、柏塞尔，法国巴比塞、郭龙，美国辛克

莱,德国赤德经女士等。

后来,8月间,宗白华先生从德国留学回来了,有一天,恰好在五马路店里看见他。他谈了不少在德国的情形。谈到“五卅”事件,他说德国人很表同情,说中国的进步很可惊,欧洲人实在赶不上。起先,他们以为又是“义和团”发生了,后来才知道是对英国、日本帝国主义,于是都承认是一种很可佩服的民族运动了。

9月下旬,胡适应武汉大学之聘,去武汉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10月10日,来到上海。事前曾来一电,由我和希吕兄替他到“远东”定好房间;当晚去北站接得适之兄,到“远东”小坐。

在我的日记里,记着仲翁同适之兄的一次会谈:

十月十三日(八,廿六)星期二。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

十月十四日(八,廿七)星期三。……午后四时,适之哥、君曼女士同时到。仲翁到五时左右才来。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他们去时很迟,我们到十二时才睡。

仲翁和适兄所谈,还是老问题:“问题”与“主义”。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10月28日,适之兄去南京。11月3日,从南京回来,寓“一品香”十三号。不久后,又住到我们家里来治病。

就在这期间,仲翁同适之兄又有一次争论。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我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一句话没有说，脸上也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的大叔的袖子，连连的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适之兄这次来申情形，且先录几天我的日记吧。

十一月四号（九月十八日）星期三。《老残游记》的新序，

适之兄已经做来近二十页了，昌之已拿去付排。

午后，适之兄来吃芜社带来的蟹，又打牌，又写字。

十一月五号（九月十九日）星期四。把适之兄从郑振铎先生那里借来、他在南京用一元买来的原版石印的二十八回本《海上花》四册一校，有很多不同之处，分给竹（竹庵兄）、道（道谋弟）、志（志金弟）同校去了。

十一月七号（九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上午，适之兄便来接做《老残游记》的序，一直做到下午六时才去。《老残游记》的序已经成功了。

午后陪婢母和秋霞到“一品香”适之兄的房间外面看跑马厅赛马。

十一月十号（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晚间，大哥与希吕兄同到“一品香”，适之兄决来住我家。他的痔，大叔和

黄先生^①谈过，黄先生介绍一位好中医，可以替他治好。他在协和开割两次，不曾治好，仍旧要发。

黄先生介绍的是潘念祖医生。

十一月十一号(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适之兄先把书籍等等都搬来了。

十一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适之兄搬来住了。今天的人客最多，仲翁等都在这里吃午饭。

适之兄搬来前两天，我们把房间布置了一番。母亲、大哥和我同秋霞住115号(牯岭路)楼面。114号楼面完全让适之兄用。我们替他安了一张床，在床前，安了办事桌、椅。房间里还有两只办事桌，他的箱子、书籍(真不少)只有分堆在桌上，抽看倒也方便。适之兄来时，看看，觉得很好。

关于适之兄住在我家的事，我打算以日记作参考，一事一事慢慢地写来。可以注出时日的便注；注不出的便不注了。

12月1日。上午，刘半农先生来看适之兄。我第一次会见他，闻名已久。适之兄请他校一校《海上花》，并且请他写一篇序。他是江阴人，苏白说得很好。

日前，有一位先生来告诉适之兄关于《海上花》的作者的消息。他走了以后，适之兄说：“今天大失望！并没有好消息，得到的不过是一点消极的报告罢了。据说，作者^②没有后代了，族谱也没有了。”

记得后来，适之兄和我寻到派克路去看过孙玉声先生，他是《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在他那里得到了一些资料。孙先生

① 名黄钟，与汪孟邹、汪原放往来甚密切的一位医师。

② 《海上花》即《海上花列传》，作者为清末韩邦庆，字子云，江苏松江人。又，下文提到孙玉声，即海上漱石生。

有一片上海书局，出过一部《退醒庐笔记》，其中也有一些资料。我们立即去买了一部来作为参考。

也是12月1日，和适之兄谈到翻印古书的事。他主张出一部“中国哲学丛书”，把一切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重要著作一概整理出来。我很赞成。

他一面想，一面写出了一些书名来：

《朱子年谱》。

《王阳明传习录》。

《颜氏学记》。

《费氏遗书》。

《李直讲集》。

《明夷待访录》（黄梨洲）。

《伯牙琴》（邓牧）。

《明儒学案》。

《近思录集注》（江永）。

仲翁来了，他看了看，拿起笔来再写下了两部书：

《神灭论》。

《非神灭论》。

12月12日。今日的《字林西报》有适之兄的朋友索克司君的一篇翻译，译自《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的“成老爹”一段。前几天，适之兄问我可曾买得有北京的方言短篇小说。我问做什么用。他说想给人翻译。我说：“译一篇吴敬梓的作品，好不好？《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聊斋》、《今古奇观》都曾见过译文，但是《儒林外史》还没有。”他说很好。于是1925年12月12日，吴敬梓的作品有很少的一部分和西人相见了。

1926年1月15日。今天我在商务印书馆买了几本英文书。有一种是房龙(Van Loon)的《上古的人》。请问适之兄，他说：

“房龙还有一本《人类的故事》，沈性仁有译本。

“他有一次到过中国，在山西大同看见‘景教碑’，想把它偷到外国去。他想了一个法子。中国工人的工银很低。他雇了许多工人，做了一个‘景教碑’，和真的一模一样，打算把真的运到外国去，把那个假的照样竖在那里。后来给人发觉了，他只好把假的运出去了，现在纽约博物馆里面。

“他曾在康奈尔大学教过书。欧战的时候，因为他的文字有袒德的嫌疑，被逐。”

后来我们出过一册任冬泽的房龙的《上古的人》。

3月4日。今天适之兄谈起，“古短篇小说丛书”可出如下几种：

第一种 《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加一种，叶德辉刻)。

第二种 《今古奇观》。

第三种 《拍案惊奇》。

第四种 《石点头》。

第五种 《醉醒石》。

他用宣纸信笺写给了我。

《今古奇观》，仲翁早已说过，文字很好，可出。

适之兄从我们家搬出去之后，4月间有一天，他来，说李笠翁的《觉世十二楼》很好。“古短篇小说丛书”又多一种了。

后来我们出《宋人话本八种》吃过官司，只好改出《宋人话本七种》，把叶德辉刻的一种删掉了。据说叶刻靠不住，不是宋

人作的。

适之兄是1925年11月13日来住我们家治痔的，1926年3月半月半左右搬到索克司家去的。索克司是适之的同学，相互感情好。适之兄前后在我家住了四个月左右。

这期间，王云五先生常来看适之兄。张元济先生也曾来看过他。还有高梦旦先生，来的次数很多。

适之兄说他从前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校长是王云五先生。谈到王先生，适之兄说过：“梦旦先生要我到商务帮忙。我把云五先生介绍给他们了。”又说：“菊生先生（张元济）也很赞成云五先生。”

适之兄还说起：“我提了一个意见给他们：最好出一种小丛书。薄薄的本子，价钱要定得很低。或者是几分钱一本，或者是一角一本。梦旦先生他们都很赞成。”他提出的小丛书，后来变做了《万有文库》那么大的大丛书了。

我后来还曾找出一份适之兄在牯岭路时替商务拟的一个计划——其实就是《万有文库》的初议，上面还有张元济的批注。不妨照录。

适之兄的计划是：

《常识丛书》（《日用丛书》）

一、字数 一万或二万，题目大者分两册或三册。

二、价格 极廉，于发行所中专派一人司推行的事，要使茶馆、车站之书贩皆乐于兜售。

三、文体

1. 白话或浅近的文言。

2. 用标点符号（至少用、。“ ”三个）。

3. 可插图表。

四、办法

1. 先编出十部或十五部作样本，限两个月交齐付印。
2. 出书后，另拟数十题征文。
3. 征文办法：a. 格式、体裁，依先出之十余部。b. 录取之书，酬报每部若干元，其特别优长者另赠。c. 如某题所得文无佳者，则此题宁缺毋滥。d. 凡引用书籍皆须注出书名、篇、页。e. 所征之文，初读由本馆分人任之；初读通过者，由本馆托专家审查之。

拟题（先出之廿五部）

1. 日本。2. 英国。3. 美国。4. 俄国。5. 德国。
6. 孔子。7. 释迦牟尼。8. 耶稣。9. 华盛顿。10. 交易所。
11. 银行。12. 飞行机。13. 电报。14. 无线电报。
15. 过激主义。16. 法律。17. 国会。18. 律师。
19. 法庭。20. 盐。21. 蚕。22. 蜂。23. 棉花。
24. 茶。25. 煤。

再：文字要活泼、有兴趣，方能令读者不倦，或用问答体，或用小说体，或用游记体。

（以上是用华文打字机打成的。）

下面是张元济先生在黑色长行格纸上写的六条：

- 一、先出样本，自可用普通题目。
- 二、限两个月出书，能否办到？必须有多数执笔之人，一时恐不易得。
- 三、袁世凯问题，颇难着笔，不用何如？
- 四、第四项中，拟加《布尔什维克》，或仍称《过激主

义》。第五项中加一《煤》或《煤油》，拟去《电话》一题，仍为二十五题，当否？

五、“征文办法”原拟第三项“所得文无佳者，宁缺毋滥”，恐人以我为吝此百元之酬报，此层有碍否？

六、“文字要活泼有兴(趣)，方能令读者不倦，或用问答体，或用小说体，或用唱本体，或用游记体”，不审可行否？

济谨注。10.7.24.

适之先生又在顶上用毛笔批道：

二注。限期不妨稍长。此时可试请人分任。

我试任《孔子》与《耶稣》二题，何如？

五注。此条为防弊起见，似不得不如此。

六注。第一项题可用游记体。第二项或可用小说(演义)体。第三、四、五项可用问答体，或演说体。但唱本体恐不易做，蠲之。

适谨注

上面“二注”、“五注”、“六注”六字，是张先生加的。

用打字机打成的计划已经没有《袁世凯》、《电话》等，可见是定稿了。

我觉得“价格，极廉”四个字，倒不单是生意经，而是要扩大读者群。只是后来《万有文库》有些却成了官府以及大人先生们的客厅里的“摆架子”的东西了。

适之兄在我家治病时，常来看他的还有徐志摩先生、罗文幹先生、汤尔和先生、郁达夫先生等。有一天，顾维钧先生来访。那一天客人真多，适之兄房间里已挤满了朋友，顾先生几乎无地可坐。恰好还有一只小木箱似的，他就只管坐了上去。

每天的客人真不少，适之兄来了不几天我们便在大门上装了电铃。这还是他提出的。

适之兄搬到索克司家去后，我们从牯岭路迁往鸿祥里，他还是常来走走的。直到5月8日，他乘船北去之后又出国去了。适之兄出国时，在船上，有一信给我的大哥和我，劝我们努力把店事搞好，工作做好。

4月间，高语罕先生从广东来。那时高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一说他是中山舰事件后逃到上海来的；一说是党里把他调到上海来的。那一次来上海，他是不是住在长沙路编辑所的，记不清了。记得后来在鸿瑞里又租得一个楼面，他又到那里去住过几时似的。

高先生在外面说话很谨慎，但在促膝而谈时，他有时会很气愤的说道：“真不象话！我老实说：我们先要打倒校里的‘段祺瑞’！”“真不象样！校里的屋顶上竖着一面大旗，上面有一个大‘蒋’字！”

他对我说，他要好好的译一点书。有一天，忽然写了一封短信给我，说他预备要译《震荡世界之十日》，我很赞成。可是他没有译成，到别处去了。

1926年发生过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的“三一八事件”。事件发生后不几天，有一晚，大叔回来说：“仲翁今天到店里来过。他到我的桌子上去写了一封信给章行严先生，说是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是快信寄出的。他气极了。”

这一年，仲翁到五马路的时候比较的多。因为要看他的人很多，我的大叔总答应替人约好时间见面会谈。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一句：“近来，我们的门槛都给人踏坏了！要看仲甫

的人真多呵！”

有一次，仲翁要和柏先生（烈武）见面谈谈，我的大叔替他们约好了，在家里吃一席酒，由馆子上送来的。记得柏先生对他说：“仲甫，我看你们那班青年人，你要多管管才好！”仲翁没有响，只管吃菜。

有一段时间，仲翁的女儿玉莹害肺病，要请黄钟先生看，住在我们家。仲翁隔几天要来看她一趟。也要和我们谈谈，问问店事。他总是说：“要认真，要好好的干，‘不进则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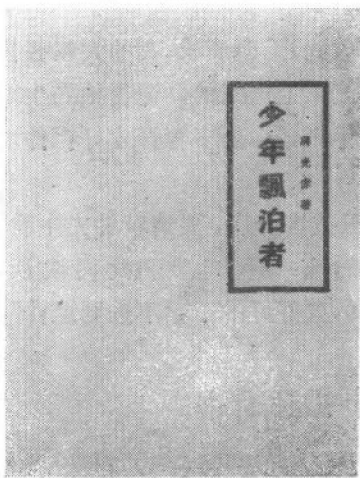
又出了三十几种新书

从1924年到1926年三年里，亚东又出了三十几种新书。

1924年出书十种。有：俞平伯的第二本新诗集《西还》，朱自清的新诗和小品集子《踪迹》，《胡适文存》二集，《普希金小说集》，OM同人的《我们的七月》，标点本《水浒传集》，还有胡适编的《胡思永的遗诗》，等等。思永是胡适之先生的侄儿，死于1923年春间。对于他的诗，适之先生曾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

每种大都印三千册，其中《胡适文存》二集每部四册，印四千部，共一万六千册。这一年全年出的新书共印五万五千册，又重印了过去出的书也是五万五千册。从1916年印行《名家小说》算起，到1924年为止，亚东出的书总印数是五十八万三千五百册。

1925年出书有十七种。其中有陶孟和的《孟和文存》，OM同人编的《我们的六月》，收有自清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平伯的《析爱》、圣陶的《暮》、颉刚的《不寐》、大白的《旧诗



蒋光赤《少年漂泊者》书影

新话》、子恺的漫画等；李秉之译的《俄罗斯名著》；丰子恺的《音乐的常识》；陈独秀1913年亡命上海时闭户著作的《字义类例》；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二集和《现代的公民》；李季译的《通俗资本论》；等等。《通俗资本论》有很多人来买，后来被禁掉了。这年还出了标点本《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又重排了新版的标点本《水浒》。

1926年只出了七种新书。其中有蒋光赤（光慈）的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这是一个少年给一个不很相识却很可敬的友人的一封信，述说他从前所经过的漂泊的历史；陶孟和选辑的《国文故事选读》；长篇小说《致死者》（张维祺著）、《小雪》（超超著）；标点本《海上花》，有刘半农、胡适序；还有斯丹大尔原著、任白涛译订的《恋爱心理研究》和苏儒善著《教育的理法问题》。

第九章 大革命高潮中

这一章的内容同亚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一九二七年这个年头，“四一二”前后，“七一五”前后，由上海到武汉，由武汉回上海，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还是很值得记录和保存的。

乔年回上海

实在记不清时日了。五卅运动后，一天，乔年上楼来，笑着，握手，一面说：“还好！还好！没有拿片子（名片）见你！”我也大笑。我们很高兴。

我一看，他还是和出国以前一样，仍旧是穿一件长衫，穿布底鞋，毫无洋气，还是一个学生一样。我心里很佩服。

我们大谈别后的情形。他一时不离开，时常见面细谈。谈得更多的是国际和国内的情势。

我问起他的生活情况。他说是在东方大学读书，有时担任法文翻译。他在上海震旦读法文，已有根底，加之到法国已有几年，法文当然更有进步。

记得我又请他讲讲共产主义。他谈了不少，记得后来他

说过：“列宁有一本《论国家》，是一个小册子，很好，可以看看。”有时候，乔年晚上来，我和我大哥等常常先听他谈；后来，昌之、道谋也由长沙路来听了；再后来，五马路店里也有人来听乔年讲共产主义了。他们平时都是要看《新青年》、《向导》和新青年社的出版物的。

有一次谈起“三一八”。其实，那一次，乔年自己也受过伤，吃过枪柄，是胸膛上挨了一下，大家把他扶走了。可是他却不曾提起。

又一次，他同我谈起党里的人们有的太露的问题。他说：“这是毛病。凡是太露的、太显的、太左的、太红的，往往不能做事，不能做工作。人家看见，往往走开了，不来接近了。真的，有些工作，实在不是那些人做得成的。有时候还会败事。”

“我希望加入共产党”

有一天，我对乔年说：“我很希望我可以加入共产党。我看国民党实在没有前途。将来，要把国事搞好，只有靠共产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难统一，利害冲突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党，是统一的，又不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唯一的目的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终究是可以大功告成的。”

记得他笑笑，说：

“我仔细把你看看，你是一个国民党左派。

“我也不信，把你再放到解剖台上看看，看来看去，你是一个国民党左派。

“我再也不相信哩，再把你又翻过来放在解剖台上细看，看来看去，一点都不错，你还是一个国民党左派。

“国民党左派呵。……”

我说：“我看起来，国民党左派也不能成事。他们还是只要资产阶级的民主，骗人的，什么自由、民主、博爱，委实是空话；比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来，实在差得很远很远。”

过些时后的一天，乔年来了，他对我说：“有事吗？我同你去看看一个朋友去，好不好？”

我们一同到了闸北，差不多是工厂区了，走进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看见一个和乔年上下年纪的青年人，乔年介绍说：“他是郭伯和同志。”

我们谈了一会，走了，郭同志说：“回头我把表格给乔年带给你，你填好再拿来罢。”

我把表格填好的时候，问乔年道：“要填两个介绍人。你，填上了；还要填一个。”他道：“填伯和罢。”

并没有入党宣誓等手续。

从此，随时有通知来了，交支部书记我收。有时叫到某地某号开会，日期、时间都很详细。

有一次，是在闸北工厂区的一个一楼一底的楼上开会。我上楼一看，只是一个空空的楼面，地板上有报纸，报纸上一头有砖头。我心里想：也许是工作的人随时用来过夜的地方。正想着，开会的人陆陆续续来了。看那样子，是工厂里的工人。有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小脚的女工；有十四五岁、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工，最特别的是有些小姑娘，只十多岁，打了小辫子，辫根还扎了大红的洋头绳。不一会，一楼面都是人了，挤满了，不能坐下，只好大家站着。一会儿，伯和同志来了，讲了一会话，发了单张给各人。他们都是久经训练的，拿到单张，有的放在袜子底下，有的收在裤子的夹层里。后

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纱厂里的。

这种会，我参加过几次，地点回回是不同的，不过总在工厂区。

上海总工会公开

有一次会后，郭伯和同志要我等一等，拿出一个文件来，对我说：“组织上有点变动，你们编到那里去了，那里书店多。你去看一看赵容同志。”我拿着了。他又给了我三个白布的票签，说：“总工会公开了，这是入场券。”我也拿着了。

我回到家，再仔细一看，一个个票签上面都有一个“上海总工会”的红色的图章，布是白细布的，还有一个号码。我的大哥和协妹很高兴，说：“要起早去。”

上海总工会公开，大概总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即1927年3月22日以后的一两天。第三次起义胜利后，选举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记得我的大叔对我说过：“仲翁今天谈起人民政府，人选实在很难。我提起赵南公先生，他觉得很好。”

上海总工会的地点在闸北青云路的湖州会馆。我们兄妹三人到了宝山路口，只见红旗飘飘扬扬，又是匾哪，又是幛哪，又是对联哪，又是工人队伍哪，又是纠察队哪，又是枪哪、刺刀哪，排排列列、密密连连的，一直到青云路，一直在不断的前进。

开会时，第一个讲演的是罗亦农同志，第二个是彭述之，还有别的同志接着讲，最后是陈仲翁讲话。仲翁、彭述之从台上下来时，恰好打我们旁边走过，仲翁一眼看见了我们，说：

“你们都来了吗？”他很忙，便过去了。以前，仲翁并不知道我们进了组织了。

和赵容同志接头后

我到渭水坊看到了赵容同志。他很瘦，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但是精神很足。后来，赵容同志也到我家来过。

在渭水坊，我们的支部里一共有六、七人了。

通知常有，有些事记不起了，不过有几件还有点印象。

有一次到棋盘街商务印书馆的很高的楼上，他们的职工宿舍里去开过会。记得说的是关于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方面的事。

又有一次，到法租界米业公会去开过会，报告的是施英（赵世炎）同志。施英同志的个子和伯和同志差不多，但比伯和同志的身体好些。他说普通话，口齿很灵清。他穿长衫，站在台上很挺拔，面部很英武。

记得他最后说：

“我们要打倒孙传芳，欢迎革命军。”

这一次，通知是闸北发的，还是渭水坊发的，记不清了。从口号看，还是总工会公开之前的一次会。

仲翁有时要和我大叔谈起党里的人才。我听见过“赵世炎”这个名字。可是“赵世炎”就是“施英”，还是乔年告诉我的。

又有一次，通知里附有铅印的列宁的照片，反面有列宁传，那是列宁逝世的纪念日。通知要大家戴黑纱，但不要系在臂外，要系在里衣的臂上。

去 武 汉

1927年春，当时《水浒》、《儒林外史》都已经修改重排，《红楼梦》正以适之兄的乾隆“程乙本”为底本修改标点和分段，准备出一个新本子。

我正在忙着校《红楼梦》，忽一日，店里来电话，说高语罕先生给我一个电报，已经带到我家里了。

电报大意是：

我担任《民国日报》总编，希兄相助，任国际编辑。月薪九十元。能来否？电复。语罕。

我决意去，大叔、大哥等都不反对我去。但要通过组织，我就去看赵容同志，他也说应该去，支书可由我的大哥担任。我立即复高先生一电，不日到汉。

乔年知道了，一大早来看我。说：“我们也正要去，一道走罢。”他又说：“述之、碧兰、精益也一同走。”

我买好船票，约好时日，大家来我家吃了饭一道上船。

我的大叔对鉴初兄说：“鉴初，你明天写一个收帐的摺子给原放带去，汉口、武昌、汉阳那几家都开上去，到现在止，结欠多少，可由原放收取。要用，可以去拿一点；不用，也不要紧。备而不用罢。”

我们五人——彭述之、陈碧兰夫妇，乔年和史精益夫妇和我，是乘英国船到武汉的，同坐三等舱。

记得快到黄泥港左近，忽然岸上有枪声，很密，都打在船边沿栏杆的铁板上。睡上铺的都吓得爬了下来，我在下铺，倒不惊慌。一会儿，只见有英国兵舰飞也似的上来，和我们坐的

轮船并排向前开去。这枪,有人说是国民革命军打的,有人说是乱兵打的。

长江景色极好。我们的长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不让帝国主义的船只横行呢?

到了武汉,我们五人分开了。我住进了旅馆,再去看高语罕先生。哪里知道,到了民国日报馆编辑部的时候,总编已经不是他而是沈雁冰先生了。沈先生告诉我高先生住在哪里,并且要我只管担任国际编辑,说是正缺人,来得正好。

我寻到高先生那里,他的房间不大,只他一个人住。他也一样的告诉我:“我已经和雁冰说好,国际编辑仍旧是由你担任。”他又说:“以前是郭沫若先生总编;后来他走开,由我担任;我现在有别的事,又由沈先生担任了。”^①

于是,我就在《民国日报》编辑部安下了铺位,和李宪仲同志的铺相连。房间里还有两个编辑的铺。我又理好了一只办事桌,就在宿处的门口。房子是一个大三楼三底,楼上除一个厢房是宿舍,其他是一统天的,共同工作的不过六、七人罢了。宋云彬先生耽搁在那里,不久他还要到别处去工作的。

《民国日报》发行部和编辑部不在一处,但相隔不远。路

① 沈雁冰在回忆录中说:“大约在四月初(一九二七年),中央决定让我去编《汉口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工作。……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总主笔是我,而编辑部的编辑,除了一个石信嘉是国民党左派,其他也都是共产党员。”“也可以说,《汉口民国日报》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的原总主笔是宛希俨,他调任汉口市党部宣传部长后,就由高语罕代总主笔。我就是接替高的工作。”“《汉口民国日报》的人员不多,编辑部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还记得有宋云彬、马哲民、倪文宙、石信嘉等。”(见《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322—324页)汪原放的回忆同上述略有小的出入。

名、门牌，一概都忘了。

开始在《民国日报》工作

“新来乍到，摸不着锅头锅灶。”加之我对于新闻工作毫无研究，毫无经验，虽然答应下来，实在心慌。

几个一起工作的，一两天便很熟了。其中有一位石信嘉先生，对部里的事真很熟悉。他和我谈谈，把国际新闻的编法，如重在各通讯社来稿、要译一些外文报刊等，也一一说给我听。还有一位李宪仲先生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回来的，他担任哪一部分工作，我忘了，只记得他很少出去的。这两位是我比较地更接近的。

石先生是外勤编辑，还会拍照。他出去采访，常邀我一起去。因为他的缘故，使我见过不少世面。

有一次，沈雁冰先生和我谈谈的时候，告诉我一句：“信嘉是吴佩孚《正义报》时的旧人。”我这才知道他事事熟悉的原因，不过同时要对他稍稍小心留意了。

沈雁冰先生常要写社论，他又在学校里担任教课，常要过江，晚上才回来工作。

我到部即转关系，知道李宪仲同志是支书。我转关系时，他笑着说：“前天和你谈了几句，我就知道你是同志了。”

星期日，有许多人来看他，有男的，有女的，年纪都差不多，他一个个的介绍，说：“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过了不多天，每天的工作，勉强可以对付了。除了编编国际新闻，还可以做一些别的工作。

见到陈仲翁

有一天夜里，我因事外出。回来时，见到我的办事桌上有一封信，是给我的，有“蔡絨”两个字。当时我再也想不出是谁。

雁冰先生后来告诉我，信是他收下放在我桌上的，又问是谁的信。我告诉他：“是蔡和森先生给我的信，要我去看独秀先生。”他道：“很好，明天我们坐车去，先送你到那里门口，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去看汪先生（精卫）。 ”

什么路，多少号，记不起了。我下了部里的汽车，进了门，问到一个小房间，问蔡先生，原来正是和森同志。他说：“你等一等，陈先生正在开会。”他进去了一下子，又出来要我进去。

我走进会场，有七、八上十人在谈论什么。仲翁一眼看见我，立刻问：“你怎么来了？”我把接到高先生的电报告诉了他。他说：“语罕真乱来。你走了，孟邹怎么好？店事怎么好？我看，你还是回去罢。”我道：“叔叔也让我来。编辑所有希吕兄、昌之，还有大哥、协如，工作倒没有什么妨碍，可以照常进行。”他听了，再想了想，说：“那么，你暂时耽搁下来再说罢。”

我和和森同志握手而别。

和森同志的个子相当高，两朵眉毛很竖，面部很庄严。说话不慌不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会上

我进民国日报编辑部时，恰好在发徽章。挂了它，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出。

有一天，信嘉同志要出去采访了，约我同去，说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会。

我们进场相当早，到了时间，陆陆续续的到了不少人。信嘉同志认识的很多，一面动手拍照，一面告诉我是谁是谁。

那一天会上的主席团，记得有谭延闿、孙科、陈友仁等。

开会时，有鲍罗廷^①的报告，译者是张太雷同志。

鲍罗廷说着说着，忽然说：

“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牺牲了！”^②

接着说：“在狱里，受过种种苦刑，用竹签插进他的十指的指甲！”又说：“他是上绞架绞死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因为张太雷同志已经哭不成声，不能再译下去了。

鲍罗廷扶住太雷同志道：“哭什么？忍住罢，再讲下去罢。”

全场的人的脸上，看过去，都是很悲伤的。

记得回部后，报道是石同志写的。

二次北伐誓师典礼^③

记得是在武昌南湖。因为我还记得，有不少轮渡都在渡

① 鲍罗廷(1884—1951)，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1923年10月来华，1927年回国。

② 李大钊同志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师东征讨蒋。但中共中央的多数决策者跟着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所部会师后再来对付蒋介石。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

人过江。

石信嘉先生和我仍旧提前到场了。但是有些队伍却比我们还要到得早。我们打码头上走进会场，路上的队伍还是川流不息的。红旗招展，比上海总工会公开的规模还要大得多。

主席团还没有到齐，石先生说：“我们上台去看一看罢。”

我们上台时，张国焘看见了我，同我握手，说：“你来了？”还是“五四”时，在渔阳里相识的。

我走到石先生那里去，唐生智正在让他给拍一个照片。

我们从台上下来时，看到有一个将军，骑上了白马，跑了前去，其快如飞。我看来真是一个英雄好汉呵。石信嘉告诉我：“那是邓演达。你看，他的头发那么长，披在后面，是有名的‘莎士比亚的头发’。”

在场的军队、纠察队的枪上的刺刀上，都贴有小条子的标语：“打倒蒋介石！”学生、工人、农民的小旗上同样是：“打倒蒋介石！”会终喊口号，“打倒蒋介石”的呼声真是响彻云霄呵！

那一天的报道好象也是石信嘉写的。

接着是二次北伐出师。

是当天还是另一天，不记得了。我又和石先生同到大智门车站。

我们到了大智门，车站上讲演台已经布置好了。红横幅很多。

宣布开会后，讲演的不少。记得谭延闿也说过几句话，接着是韩麟符同志、彭湃同志讲话。彭湃同志讲话，滔滔滚滚，一气呵成，真是性如烈火的农运领袖。

记得石先生要我写了一篇报道，我请他改改，雁冰先生也看过，次日发刊在报上。我只写过这么一条较长的新闻。

外部的工作和内部的工作

五一节前两天，组织上把我从编辑所调到发行部，担任营业主任。前主任定在五一节把一切交代给我。

上午，总经理董必武先生来了，记得他说过几点：1. 营业主任即经理。我在武昌的时候多，汪先生要多做一点事才好。2. 工作的人最好重新调配。3. 本来要加一个书记，汪先生可以申请派来。4. 在德国定的转筒机差不多要到了。房子正在建筑，要营造厂加紧赶造。这是要紧的事。其他还有什么，记不清了。

说到经费，好象是每月有津贴二万元似的；财政部贴一万二千一月，湖北省党部是每月贴八千元。

五一节有游行，大会场在跑马厂。我们是下午再到跑马厂去的。红旗、队伍排列得很齐整，真是盛况。“赤都武汉”，名不虚传呵。后来我才知道，各种集会、游行，布置得那么好，向警予同志出力最多。

那时，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公开做工作，这是对外的；但是里面还有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是内部的工作。

我的外部工作是民国日报馆营业主任(经理)。我的内部工作还有：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局长。
2. 节制长江书店。
3. 节制长江印刷厂。
4. 开一个纸店(要立即筹备)。

《向导》是独立的，照旧。

乔年同我说：

“中央出版局原来是太雷担任。里面的情形很乱，急于要整顿一下。

“长江书店那里，会计告经理。哪一天，我们要去和他们先谈谈。

“长江印刷厂里，纸张经常有问题。

“要赶紧开一个纸店，越快越好。这要由你到上海去办纸才好。

“《向导》的纸型，东也有，西也有，很乱，差不多要不全了。要集中，要秘密地藏好。”

下面把外部的工作和内部的工作，就还记得的分别说一说。

民国日报馆

同乔年谈的时候，说起报馆方面的事，我道：“来的那位小姐，很时髦，有些事她做不了，可不可以换一个男的来？”乔年笑笑，说：“为什么？”我道：“你调一个男的来的好，有时做事要出一点力。”

第二天，那位女同志调到别处，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要到编辑所、排字房、机器房有事，他都可以去跑。一捆捆的纸，一卷卷的纸，他也能搬。有时我有事外出，把一些事交给他，他一一记下，都可以做好不误的。

我去看看雁冰先生，他说了几点：1. 报上错字不少。2. 报纸不白，太黑。3. 每月到日子拿薪资，有时要用三、五元，没办法拿，很不便。我表示，一定想办法解决。

原先在哪里办印报的纸张，还是照旧，但要质量稍好的，每令略加一点钱，并不很多。

我要会计处印一种传票，只要是在每月的薪资上支用，可以签字，到会计处支取。编辑部发去一本给沈先生。

为解决错字问题，加一个看清样的，报纸校好，再由他通读，改正错误。恰好程友仁兄带了我的大哥的信来，说他要到武汉做事，钱不计较。他刚在东南大学毕业。谈到看清样事，他很愿意担任。得到董必武先生允许，他便进了校对科。自他看清样以后，错字很少很少了，大家赞成。

董先生常来。谈到厂房和机器，我问起前主任是怎么接洽的。记得说起还有一位先生，联系此事很得力。我主张仍旧由他一手办。那位先生的姓名，我忘了。承建厂房的营造厂厂长曾来一谈，我请他们加紧工作。他同我去看过进行的情况。德国洋行有一个德国人曾来过几次，说转筒机将到。有一次，要我到他家去吃西餐，我谢谢他，不曾去。

董先生谈起，听乔年说过，知道我的事多。有一天，他说：“汽车你用，我在武昌有车，过来时少。”不过事实上，我用车的时候很少。

董先生还谈过订户不多、广告收入不多等问题。这些事都在分头进行。

天天出来的报，纸白，错字很少，心事稍轻，我不能不料理一下内部的工作了。

中央出版局

中央出版局只有一个小房间，没有人，从来是上锁的。

我去的那一天，有人送一笔钱来，约八百元。又没有帐簿。我立刻立了一本。

第二天一大早，太雷同志来找我，说他要拿八百元。我要他写了收条，如数付给了他。

我们谈了一会，他说实在没有时间，事情误了不少，有些乱糟糟的地方，希望我整理一番。

我第一步立了帐簿，第二步就去买了四只旧皮箱。先把东一包、西一包的纸型分装起来，其中最多的是《向导》的纸型。这四只旧皮箱，看去象衣箱，再放些别的东西在浮面，遮住纸型。

桌子的抽屉里有一块木头，象一个树根似的，我以为是一种摆设，翻翻看看，底下刻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之章”。我认为很好，很隐晦，不知是哪一位设计的。我把它也放进了叠起来的、下面的一只皮箱里。

我一概把箱子都上了锁。锁是买皮箱时一道买来的，也是旧货。

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也都理了一理。

长 江 书 店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67页有一条注：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党在武汉设立一个长江书店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由苏新甫负责。当长江书店开幕时，所有上海、广州运去的书刊，三天之内完全售罄，因添配的书接应不上，曾经一度“拉铁门”，其盛况可以想见了。长江书店除重印新青年社、上海书店等一部书刊

外，亦曾出版许多新书，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份当时在武汉出版的《民国日报》和《中央日报》，所以除少许已发见的版本外，无法知道其他出版物的详细书目。

乔年和我约好，到长江书店去看看新甫先生，再看看会计。暂时不谈他们的问题。等机会，先个别一谈。

我们去时，上海到书有十几大箱，又有不少大书包，各家的书都有。正在开箱时，旁边已有不少人在等。箱子开开，来不及上架，只好就凑在箱边卖。不一会，来买的人更多了，想必是闻风而来的。有人看一看书上的定价，付了钱便拿了书走了。可以说是一抢而光。

记得有一家同业新开张，要送贺礼。我请沈先生做对子，他要我做。我试写了一副，句云：“赈济知识饥荒，完成世界革命。”当时的青年人争读新书，真是如饥如渴。不少女子争买《妇女运动概论》（杨之华著），男女都抢着买《现代的公民》、《白话书信》二集等。

新甫先生在楼上，我们和会计约了一约，后来在外面单独和他谈了一两次。乔年和我商量商量，再到店和他们两位一道一谈，帮他们调解了一番，要双方让步。后来他们倒照旧合作如常，不曾决裂。

长江印刷厂

乔年和我又一同到长江印刷厂去看看。那时经理是倪忧天同志。在会计处，看见洪孟博兄（洪泽丞先生的儿子）。他留学德国，已经回来，在印刷厂工作。

记不清长江那时能打纸型不能了。有一天，乔年说北京、

广州等处要《向导》，到那里再排印实在太慢。我说：“最好是多打纸型，作快件，或航空寄去，到后马上浇版印刷，要快得多。”后来长江加了打纸版间没有，也忘了。我所保存的《向导》的纸型，都不是在武汉打的。

长江好象有几副对开架，也有脚踏架。

忧天同志谈到报纸困难，汉口的纸太差。我们答应想法到上海办来。

宏源纸行

在民国日报左近不远的一个里弄里有空房，看看谈谈便租定了。是一个两楼两底。

我写信给大叔，问起办纸事，开来价目和运费在内，比在汉口合算，质料又好。信上又说道谋（周）想到我这里来，我要他快来相助。岂知与他同来的还有程绩咸兄、胡广平弟。他们也想做工作。于是赶紧要他们住在一起，再安排分头做事。

我取名“宏源纸行”，大家赞成。我要道谋当经理，他不答应。说：“经理当然是你做，事情我来办。”他精神抖抖的，我毫无心事了。事后有次和乔年同看仲翁，他说纸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万不要用时髦的字样。

谈谈，绩咸兄、广平弟、道谋弟都想入党。我说，等一等，一道和乔年一谈罢。广平是东南大学毕业的，后来通过组织，派他到罗易那里去工作了。

第一批报纸到了，二十件（二百四十令），就放在客堂间。

我事多，天天要到报馆，宏源只道谋一人，很难对付（绩咸

兄是医生，打算另找一处房子开诊所)。大哥从前在屯溪有个同事程志和兄，带了大哥信来，托找工作，薪水不计较，于是留他在宏源相帮。

不久，纸行已经象样了。只是报纸供应长江还不够，要陆续再办。

后来乔年同我谈起，他和精益住的地方不好，想来住到宏源楼上。我说很好。住的地方，恐怕不能只有一处了，要多几处才好。谈到出版局，决计不动。宏源只是一个纯粹的纸店，楼上只是住家。

我住报馆，但是在宏源也搭了床铺。

早晚和乔年、精益碰面，消息灵通得多。可是有时乔年和精益并不来住。

史精益拿田契去卖

有一晚，乔年和我说：“明天是星期日，我们早上过江，到精益家吃饭去罢。”

第二天，我们坐了小船到武昌。到了史家，精益同我们一道，过了一斤又一斤，也不知道有多少斤，房子实在很大。

饭后，乔年问精益：“搞好了吗？”她说：“差不多了，还要上去再拿。”乔年要我一道去看看。穿过几个厅，到了一处漆黑漆黑的房间，里面都是一排排的木架，古色古香的。精益用梯子爬到顶上又拖出了几捆来，递给乔年。

快要上船回来时，我禁不住问乔年道：“那么一包一包的，是什么？”他道：“田契，拿去押、卖。”我道：“她家那些老太太会知道的罢？”他道：“她们才不管事哩！”我道：“她们知道的时

候,不好罢?”他说:“有什么!有什么用!押,卖!”

我知道组织上经济有点窘了!田契,地契,押,卖,也好,也对,是正当的用途!

一天,我回到报馆,接大叔信,汇来一千元,要我交给高语罕先生。

那时正是高先生一次病后,我再去看他时,他已经好了。我告诉他一千元的事,把大叔的信给他看了。他说:“我还有钱,不用钱,还是你拿去用罢。”因为大叔信上有“如果高先生不需要,你便放在身边”的话。

记得那时我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工资与生活费(报馆九十元,内部三十元)。对于资助绩咸兄开诊所,还没有办法。有了钱,我就到宏源纸行,让道谋把绩咸兄找来,按他的预算借给三百元。“程绩咸医生”的招牌就挂起来了。绩咸兄又替道谋和我预备了一个铺位,备而不用。

风声一天天紧了

从5月“马日事变”,直到“七一五”汪精卫举行所谓分共会议,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武汉风声日紧。

武汉的钞票渐渐的跌落。5、6月间上馆子小吃,三人同去,一人一元可以对付了。可是后来,油条、烧饼涨得厉害,别的想不起了,只记得鸡蛋到过一元一个。

查街也加紧了。

有一次会,我去了。到的人并不多,宪仲同志没有到,看来又不是支书会。会上有人说是许克祥差不多打到花园了。这次会上看见向警予同志。她很瘦,穿黑短裙、竹布短衣,肩

后面已经有小裂缝了。她还带着一个小姑娘，打着两条小辫子，我不曾问起是谁。

渐渐的不对了，时常有些军队开来开去的。街上有些店家，常有军队耽搁一夜。有时也进民国日报馆，讲讲说说，客气一番，倒也肯到别处去了。可是有一次，说也无用，他们只管进来，到处摆起背包、枪械等，并且铺好军毯，预备过夜了。我们有人跑去告诉军事委员会，拿了印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字样的很大的布告，在大门内张贴起来。于是，他们才走了。

6月间，和乔年见面的时候，听说一点大概；说是国际有指示，有四条，在罗易^①手里。要土地革命。现在有人在说“过火”，要是提出，国民党更要害怕得要死了。要加速武装工农。要提出，他们更怕。说是正在商讨，提出不提出，没有决定。7月间，又问问那四条，据说还在讨论、研究，没有递出。

是7月14日夜，我正在民国日报馆中工作，乔年来了，只和我说了句便走了，说：“你今天晚上不要在馆里睡。”

我把工作做好，出馆，岂知门口已经有上了刺刀的荷枪的士兵站了岗，却还不曾不许人进出。

我再碰到乔年，他道：“罗易已经把四条交出去了。立刻要决裂了！要当心！”

是“七一五”，汉口白色恐怖开始。到处捉人。枪毙，惨杀，也时有听闻。

①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中国。这里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罗易后成为叛徒，1929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我照旧到报馆，有人告诉我：

“汪主任，昨天晚上，编辑部李宪仲被捕，据说今天早上，刘佐龙把他枪毙了！”

我觉得非常难过。我在编辑所不到一个月，我的铺位和他头碰头，有时要谈两句再睡，真可以说是有连床共话之乐的。而今永无相见之日了！

后来问问，才知道宪仲同志是到刘佐龙的军队里去联系工作，给他们跟着跟到编辑部，在夜里把他捉去的。又有的说是他正在那里联系，给他们当场扣住的。

我和宪仲相聚有一个月左右，实在不知道他是做联系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的，也就是说，是做军事工作的。

宪仲是滁州人，瘦瘦的身材，瘦瘦的脸。是一个学生的模样。头发从来是蓬蓬的。人真和蔼可亲，可是意志很坚强。

这时候，乔年病倒了，躺在宏源楼上。

我觉得他穿的仍旧是老布长衫不很好。我说：“要穿绸的才好。”记得精益替他做了白绸的小衫裤，又做了长衫。

随后又讨论了送乔年进医院的事，我觉得最好进外国医院。于是精益送他进了一个英国医院，睡三等病房。当然改名换姓。照料的是外国护士，这很好，可以少交谈。

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乔年在外国病院里倒平安过了好几天的。

我问过：“事误不误？”他说：“我告诉精益，她去告诉，没有误掉什么。”

乔年出了医院，身体精神如常了，又去忙他的事了。

要一张“护身符”

有一天，乔年同我说：“今天，父亲对我说，要你去看看光明甫先生，告诉他在报馆工作，最好请他替你说一说，到柏先生的三十三军办事处去搞一个什么位置。他的意思是要一张‘护身符’。”我答应了。

我去看了光先生（名昇，字明甫）。他问问我的大叔好，又说说谈谈以后，他说：“我联系好，再要人到宏源看你。”

记得是张目寒先生到宏源看我，再同我去看常樊侯先生，他是三十三军办事处主任。他也问问我的大叔。他说：“关于位置的事，我们开会后，再要目寒告诉你罢。”

目寒兄又来了，说：“会上通过了，你是少校参谋。你可以穿军装，可以穿长统皮靴。”我谢谢他，因为他跑过几次了。

我记得只是一个挂名差使，根本不做事，也不拿钱。我也没有做军装。我只要有一张“护身符”。有过公文没有，我也忘了。如果有，后来也毁了。

“七一五”以后，我身上的事还依旧在进行，不过比过去要分外小心罢了。

那时，绩咸兄、广平弟，还有黄梦飞兄，好象都到南昌去了。他们担任什么工作，不知道；只有绩咸兄是担任军医，还记得清楚。

“七一五”后，我们几个熟朋友，在工作完了以后，往往约一个地方，晚上要打打麻将了。乔年老要笑着说：“很好哩。可惜我不会。打牌的人，是赌博鬼，没有人谈政治的。现在，灰朴朴的好。”

陪陈仲翁回上海

有一晚，乔年对我说：“今天父亲对我说，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罢。”

我们去了，走到一个一楼一底的门口，一张竹床上，有一个人面孔朝屋内，头靠着门躺着。乔年和我进了门，他一头坐了起来，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上还拿着一把芭蕉扇，说：“来了？”我才知道是仲翁。

我们进屋去谈了。

仲翁先问问我手上的事。我都说了。

他道：“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我说：“好的。”

他又说：“你手上的事，完全交给泽民(毛)好了。”又对乔年说：“明天就要泽民去接事。”又对我说：“把事一概交好，你就动身到上海去罢。”

差不多要走时，他笑着说：“刚才你来时，看见我象一个工人罢？”我道：“这一带是工人住处，凑门乘凉的，我看见很多。朝里躺，更好。”

泽民兄依时到了民国日报馆，董先生也到了，先把主任的事，印鉴等等，一概交给了泽民兄。

是下午，我们先到中央出版局那个房间，泽民兄带来了三、四个女子，都是学生似的，身体个个都好。

我把一桩桩、一件件都交给了泽民兄。泽民兄，在上海常

会，很熟。苏新甫、倪忧天两位那里，虽是熟的，我们也一同去了一趟，说明此后由泽民兄负责了。宏源也一同到了一到，和道谋会一会面。

我告诉泽民兄：“我和道谋还住宏源，到我们离开，你们再接收；如果有人要去住，请你和乔年接头一下。”分别时，我又说：“你把各事摸一摸，有要问明白的，我回来时再谈罢。”

在动身回上海前一夜，我还听过一个报告。是在一个很大的中学堂里听的。

接到听报告的通知，上面有一个“口令”。好象只有一个字，什么字记不得了。去开会的路上，果然有人问口令。

开会了，主席说：“现在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大家寂静无声的听了。

先是说国际，再是说国内形势。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只有一段话，还在脑子里——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一定要训练五百个地下武装队。起初不要多，只要五百人。这个武装队，要能吃苦耐劳，要训练得好。我们要立刻转入地下，日日夜夜的操练起来，训练起来。……

散会后，我回到宿处，心里想：真好！这一下，大有希望了！

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和大叔商量同仲翁一起回上海的事。

大叔说：“不要紧，可以来。‘四一二’时，那是万万来不得的，现在不妨了。”

家里人都好，我的大儿子无级也很好玩了。店里的人，希吕兄、昌之、鉴初兄、啸青兄，个个都好。

大家不免谈谈。大哥、协如妹说起“四一二”，还是要失色

的。我说起“七一五”，同样是要失色的。最后说：“你回来再谈罢。”

那时鸿祥里的房子已经回掉，我问起时，大哥和协妹说：“房子实在可惜，刚布置得那么好。不过真不能住了，危险呵，查，问，前门后门的看，不能不搬走了。”

我要再到汉口去了，大家不放心，大叔说：“要啸青同你一道去罢，省得大家着急。”

我同啸青兄返汉口后，同仲翁，还有文容先生，一共四个人，一同乘英国船“公和”回上海的。

仲翁说他决意装做病人，吃饭也可以在房里吃。我们包一个官舱。官舱只有四个铺的，没有三个铺的，因此加了一位文容先生同行，免得搭进生人。

官舱定好了，上船了，仲翁戴了风帽，在秋天，只有病人可用的，面部可以遮住不少，不易叫人认得出。

在船上，有时可以在船边走走，看看江景。傍晚，仲翁也曾到船边走过一、两次，但熟人太多，不少人注视他。

我们闲谈时居多，只是闲谈。仲翁有时会说一句：“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我一次在船边走走时，忽然看见一张英文的通告，贴在舱口。我一看，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要在船上捉人、捕人，本船概不负责。我回房间一说，文容先生也立即去看，回来说：“靠码头，我们只管关起门来睡觉罢。”

我们到了上海，下了船，在码头上雇了一辆汽车，仲翁戴了风帽，我们扶他下船上车，开到酱园弄，进了彭礼和家。彭礼和正在家里。我们很高兴欢喜：平安无事！

仲翁要我告诉大叔去看他。

在上船离汉口前，仲翁还布置了一件事，把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架印刷机拆运到上海。当时只有报关手续没有办好，我要道谋运出再回上海。乔年、精益还是和道谋同在宏源。

印刷机已经拆掉时，忽一日，接到瞿秋白同志给我一个条子，要我一去。我到时，他对我说：“《向导》已经出不成了，现在打算出一个单张。”我只好告诉他：“印刷机已经拆走，我的事已经交给泽民兄。印单张，我已经办不到了。加之我又要到上海去一次，马上要动身了。”后来，他也离开武汉了，这件事，大概只有搁下了。

我们到上海后只几天，道谋便回来了。乔年和精益到上海比较的迟。

回到上海以后

家人、同事会面时，他们总要问问武汉的“七一五”，我总要问问上海的“四一二”。讲起“四一二”，真是“狼虎成群（杨虎、陈群）”呵！只要谈起这些事，都不敢高声，只能轻轻悄悄的谈谈说说。

大哥、协妹所谈，记得的有：

我走后，开过不少会，真危险呵！赵容同志到我们这里躲过几次。听说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现在赵容同志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支部会也不曾开过。那个房间也没有人了。

到处捉人。鸿祥里常有穿黑长衫的进进出出，又时常在门前门后的看。大叔决定搬屋。长沙路也有人来查问。

在编辑所，鉴初兄、希吕兄、昌之谈的有：

呵！怕人呵！什么书都犯禁，消息最不好的时候，《新青

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每周评论》等等，都只好烧，因为卖废纸也怕。一天不能烧多少，烧饭时烧，不惹疑心，有烟也不妨。差不多天天要撕、扯、烧。又急于要烧，又不能不慢慢的烧。烟囱的烟一天冒到夜，也要出事。一面烧，一面又心痛！

《现代的公民》、《白话书信》二集、《妇女运动概论》等等都不能印了，只有把纸型都烧掉。

到店里，大家也谈谈。说是有一回，发往长江书店的几十大包书，一齐给外国人丢下长江了，损失差不多有一万多元。据说一个外国大班出舱走走，问水手：“那是什么？”“书籍。”外国人走上去扯开一看，恰好看见是《新青年》，登时大怒，叫了许多水手来，把所有的大书包一概丢下长江了！我们的很不少，别家的也多！

他们还谈起，有一天，忽然接到一笔电汇，是一万元，下面没有署名。汪先生（我的大叔）不敢收，退回去了。他们问我：“你知道这件事吗？”我说：“并不知道。”

“四一二”、“七一五”的白色恐怖，是宁（南京）、汉（武汉）要一路走了！

我到武汉去的时候，关系是转去的。这一次回来，转关系的手续也没有办。现在，支部已经涣散，联系的地方也已经没有，赵容同志又不知道是哪里去了。这再怎么好？

大叔看过仲翁了，说不要几天，就要另搬一处。仲翁也知道鸿祥里搬了，搬到温州路了。他很想来。大叔说他对仲翁说：“仲甫，你不要再去了。我老实告诉你，我的老太婆常说：‘不能再来了！怕人呵！他还要来，我要吓得爬屋走了！’还有我的老嫂嫂，要吓死了！”“还是我有时来看看你的好。”仲翁搬

家后，我的大叔是有时去和他见面的。

不多时，乔年来了，说汉口的事都已经办好，所以他到上海来了。

我们谈着谈着，谈起组织已经无处去找，联系不起来了。

他说：“我来的时候，父亲要我告诉你，现在，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事做好要紧。他说：‘书店很不容易做，不进则退。’”

当时我觉得真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乔年又说：“现在，你们要带灰一点才好。书还是要做，有时打打小牌，也很好。犯红，最要不得呵！”

他来时，总和精益一道来；也有时，只他独自一个人来。我却不曾去看过他们。

他来的次数不少，一谈半天，一坐半天。谈什么，也想不起了。大概总是问问怎么做书，怎么出书；又谈谈千万红不得，要灰，否则还会惹出事来。

我当然很闷，但是也下决心，“重理旧业”要紧。所谓“旧业”，无非是我所喜欢的标点旧小说方面的工作。

我第一次回上海，江泽涵兄和他的夫人住在我家，后来同上北京了。我再到上海时，他们已经走了。好象适之兄那时也到上海来住家了，住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的一个弄堂里。我第二次回上海后，去看过适之兄的。我们见面，我不提到过哪里，适之兄也不曾问过我是从哪里回来的。

我常想：乔年忙，将来时局稍好，他或许又会给我们进组织的。他们父子认为店事要紧，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十章 盗版、禁书及其他

亚东的销场很大的书，出版后不久，就有人盗印翻版。首创的标点本，跟着做的也很多了，而且又有什么“一折八扣”本出现。这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至于几难立足。加之那时的反动政府又时常要禁书，我们的损失更大。

那几年里发生的乔年被捕牺牲等事，也是要记叙的。

重排《红楼梦》

我“重操旧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排《红楼梦》。这一版，有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序》，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及其跋，附蔡子民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胡适还新写了一篇《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序的开头云：

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件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故我愿意给他做这篇

新序。

这篇序，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于上海。当时，适之兄一家住在极司非尔路。

为这个重排本，我写了一篇《校读后记》。适之兄对我说：“你写的时候，要越详细越好。举例最好要多，愈多愈好。”所以这篇《校读后记》可以算得是最长的一篇，差不多有两万字，包括：1. 重印的缘起；2. “程乙本”的说明及校读；3. 新本与旧本的比较；4. 从前校读时疑问的解决；5. “程乙本”里的问题。

乔年牺牲

有一天下午，我害伤寒，躺在床上。乔年来了。他一气上了楼，便进了我的房间，笑着说：“怎么？病倒了。身体不太行呵。”我告诉他病的经过，很想起来，他说：“不要动，依黄先生（黄钟医师）不错。”他便坐在我的床沿上谈谈。

正谈着，门口有汽车声，停了下来，打门，进来是适之兄。他听说我病了多日，顺路来看看我。

乔年听见下面说是“适之先生来了”，立即站了起来，说：“我去了，再来看你。”可是他知道直接下楼会碰见，嘴里说着“不好”，立刻跟着我的大哥进了客堂楼，又进了我的大哥的南面厢房。这时适之兄已经上楼，进了我母亲的房间（我的厢房的后面），又进了我的房间了。

适之兄去后，我问起乔年。大哥说：“他在我那边坐了一坐，听见适之哥进了你的房间，他便打房间后面转到楼梯头，下了楼，从后门走了。”我道：“他不比仲翁。他和适之哥又不

认得。他不要见面，只好听他。”

日期实在记不清了。有一天下午，是乔年走后又过了一些时，我的大叔回家，面孔上很着急的样子，叫大哥和我去，说：“不好！不好呵！乔年给巡捕房捉去了！”

大叔要我和大哥快到昌之那里去耽搁几天再说。说是已经和昌之谈好，他那里挤一挤住得下。大叔连声说：“唉！不好！不好！乔年性命难保了！一切情形，晚上再告诉你们罢。我还要去找人哩！”

这天晚上，大叔到了昌之家，说：

“据说乔年在新闻路上一个什么学堂里开会，穿黑长衫的人突然进去，一下子把他捉住。那时乔年手上拿着一本杂志，里面夹有文件，连人带书，立刻带走了。据说乔年在巡捕房讯过，他说他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

“这是彭礼和来说的。他一面说，一面守住店里楼上的电话。他的意思，巡捕房如果有电话来，一定要承认乔年是亚东图书馆的编辑。可是巡捕房始终没有电话。

“礼和要我想办法救乔年。我说：‘我要到几个地方去商量一下。’我出门看了两处，回到店里，礼和还没有走。我告诉他：‘今天晚上没有办法了，明天早上去看许世英先生。他和仲甫很要好。’礼和这才走了，明天再到店里来讨回音。

“凶多吉少！我看不好！唉！我明天要起早，大家预备罢。”

第二天，我的大叔看到许世英先生以后，到店里去看了一看。彭礼和正在店中，见面便迎着我的大叔说：“情形很不好！乔年已经解到龙华去了！”

我的大叔便把许世英很热心、同情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

说：“他今天一定要去找一两个朋友，请他们设法营救。”

第三天，彭礼和到店，哭着，告诉我的大叔：“没有用了！乔年已经牺牲了！你也不必再跑了！……”^①我们心里都很难过。

店里和编辑所，都没有出事。过了几天，我们也回家了。

再过了一些时，我们惊魂甫定，有时还是要谈到乔年的：

“仲翁真难过！两个儿子都很能做事，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而且死得多苦！惨！……”

“乔年他们出国求学，学成归来，正好干一番事业，竟这样的牺牲了，真正可惜！”

“要他们那样忠于社会主义，很少！”

“他们不朽呵！不朽呵！”

延年，1898年生，1927年死，年三十岁。^②

乔年，1901年生，1928年死，年二十八岁。

① 1927年底，陈乔年由武汉调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6月6日遭杀害。

② 陈延年 1927年4月调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26日被捕，但身份并未暴露。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市公安局寄来的一封信，从字迹认出是延年写的，内容说到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被拘押于拘留所。汪孟邹急于营救，即乘火车到南京，径去访问胡适，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胡适问明是陈延年后，表示“我一定营救他”，要汪回上海等消息；随即把信交给了吴稚晖，吴立即报告蒋介石（一说密报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汪孟邹左等右等，等不到胡适的消息；陈延年同志7月4日英勇牺牲的噩耗却在报纸上刊出了。（参见《红旗飘飘》第23集《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4日《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

他们牺牲时，年纪不过三十左右！

上海解放后，我才知道乔年是在枫林桥就义的。恰好有一天，我因事到那里去，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只见一车车的游行汽车队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飞驰而过。我曾口占二十八字道：

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

回头再说当初。

我的大叔有次谈起陈仲翁，说：“‘八七会议’上意见很多，有人说他是机会主义。问题很复杂，一时也谈不完。有人说他对国民党太软弱。有人说他放过地主不斗争。有人说他对资产阶级让步。有人说他更不应该放下武装。有人说他不发动群众。”

有次大叔又谈起：“共产党真好呵！将来，一切都要由共产党来解决；只有共产党能解决一切。”

接着又说：“不过我常常老老实实的告诉仲翁：‘我实在害怕，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怕，我真怕！’仲翁老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他很知道我的。”

依我看，仲翁和他是无所不谈的。譬如“八七会议”，我的大叔知道，而我一点也不知道。

有一次，我的大叔又说过：“1927年学校里用的课本，早已预备。政治课方面的，听说商务印书馆印的，书后有几个相片：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陈独秀。‘四一二’来了，仲翁的那一页照片一概取消，要装订作切去了。”这件事不知道确否，想来商务印书馆当时的职工里是会有人知道底细的。

乔年牺牲以后，我相信，我的大叔和仲翁还是有时要见面的，总是他去看仲翁，而不是仲翁到长沙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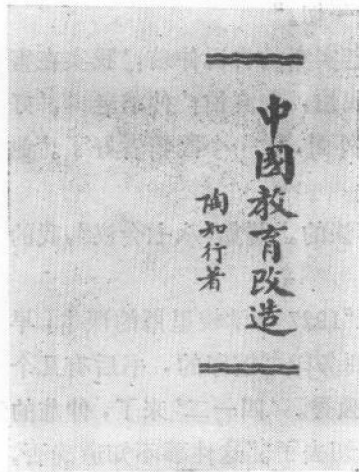
五年新出的书

下面先扼要地讲讲从1927年到1931年这五年间亚东出书的情况。

1927年，我们出版的书不多，一共只有七种。其中有蒋光慈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他和他已故的恋人宋若瑜的通信集《纪念碑》；有汪静之的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有日本丘浅次郎著、刘文典译的《进化论讲话》；还有杨之华著的《妇女运动概论》等。《妇女运动概论》不曾登广告，也不曾上书目。一月出版印三千册，四月再版便印了一万册。这是亚东再版印到一万本的第一部书。如果不遭禁，还要印不少

本数的。

1928年，出的新书有十七种。其中有陶知行（即陶行知）的论文集《中国教育改造》；鲁彦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多数是弱小而受压迫的民族的作品；房龙原著、任冬译的《上古的人》；还有洪灵菲的长篇小说《转变》，杨邨人的长篇小说《失踪》，钱杏邨的短篇小说集《义冢》等。



陶知行《中国教育改造》书影

这年亚东举行过一次十五周年纪念“全部特价”，从9月下旬到11月底止。大体和1922年十周年纪念的“全部特价”相同，只是出版的书籍的种数多得多了，列入特价书目的有八十种。

在一则特价展期的广告中，还列出“重版书五十二种”。其中十版以上的有：《胡适文存》初集，《白话书信》，《短篇小说》第一集，标点分段的《水浒》、《儒林外史》，《尝试集》。五版以上的有：《胡适文存》二集，《吴虞文录》，《科学与人生观》，《三叶集》，《国文作法》，《中国语法讲义》，《少年漂泊者》，以及标点分段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

这种广告，后来竟发生了很不良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起了一种很要不得的“副作用”了。市上渐渐的有翻印、偷印、盗版出现了。这是后话。

1929年，亚东出书有二十五种之多，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不过大书少、小书多；也就是说种数多，而页数并不能算多。这一年出版了“社会科学新书”，广告说：“我们已经感觉到现代青年的要求，已由一般的学术的涵养进而为社会科学之具体的探讨。”为满足“读者急切之望”，“已约定海内外专家从事翻译”云云。所列书目有《社会经济发展史》、《法国革命史》、《康德的辩证法》、《斐斯特的辩证法》、《产业革命》、《社会农业及其根本思想与工作方法》等。

1930、1931年出书少下来，1930年十四种，1931年十种。其中有：

《胡适文存》三集，胡适从三部文存中自选的《胡适文选》，还有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他在序文中推崇南宗第七祖神会和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

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

丰子恺的《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

《文木山房集》，吴敬梓遗著。

《两个女性》，中篇小说，华汉著。

《两朋友》，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刘大杰译。《印度七十四故事》，印度昇略著，汪原放译。《一千〇一夜》，汪原放译。《我的童年》，高尔基著，林曼青译。

《辩证法经典》，依据河上肇氏所辑马克思、昂格斯（恩格斯）、列宁三氏原文译出，程始仁编译；《柴霍夫书信集》，程万孚译；等等。

以上总计 1927 年到 1931 年五年共出书七十三种。

这几年营业总在七万左右上不去。我的大叔有时要说：“书店真难做呵！这个行业比不得别的行业。这个行业，一家要有三副资本。栈房里要放一批货，同行手里（本埠、外埠）又要放一批货，门市部又要放一批货，真正困难呵！”

我的大哥有时也和我说：“他们说生意做不上去，总是在七八万左右，再也做不上十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故？”

我也有气，说：“怎么做得上去？这些书上赚进两个，那些书上出去两个，怎么做得上去？这只手进来，那只手出去。还要不好哩，进来的一只手还会少下去，出去的那只手还会多起来哩！”

我的大叔有时又会说：“真古怪！想不通！适之的书，本人的，行；介绍来的，都不很行。高（语罕）的，本人的，也行；介绍来的，也不行。（蒋）光赤的书，本人的，好，行；所有介绍来的，也都不及他自己的。”

我说：“恐怕是有版税的都还不错；凡是买稿的，都不很行。生活不安定，写作不会有很好的。”

店里的人也有议论，有时会听得见。亚东 1929 年出过鲁彦译的小说《苦海》，又出过何植三的新诗《农家的草紫》。有的说：“《苦海》真是一只‘苦海’呵！”又有的说：“《农家的草紫》真是‘草纸’呵！”他们看见销场不好，没有多少人买，便会气愤愤地这样说的。

还有人说：“书总要通俗。不通俗的书，少出的好。看都看不懂，一般人，谁要？谁来买？”

又有的说：“‘和尚书’倒很好，不过来买的，坐汽车的多。象《胡适文存》、《胡适文选》好，也有坐汽车来买的，也有普通的学生来买的。”“和尚书”是说《神会和尚遗集》。

又有的说：“总要做教科书！”

又有的说：“标点分段的旧小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长沙路编辑所也有闲言闲语：“汪先生收的稿子，有的还要得，有的实在是要不得，‘拉屎不通’的句子也多！”还有激烈的话：“汪先生天天叫生意不好，其实，去年不是赚钱的吗？”“薪水又不月月按日子发，没有钱用，只有到店里去拿一点，真正不便当，又耽搁工夫！”“分红，年年是八成、九成，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十成、十一成！”

出现了盗版

1929、1930 年，有一件可怕的事发生，就是忽然发现偷印、翻版、盗印。

有一天，我的大叔回来说：“今天，我对黄老四不客气了，

要他把翻印的纸型拿出来给我毁了。他太不讲交情，竟翻起《白话书信》（高语罕编）来了。”

我道：“广告上打出二十版，看来又好又不好。他眼红了。”这是指广告写明《白话书信》已经印了二十版。

又过了一些时，芜湖科学图书社来信了，说：“有人寄样书来，有《白话书信》、《少年飘泊者》等等，折扣很低，只二、三折。我们上海发来的是六折。进他们的货又不对。应该怎么办？”

于是立即调查，才知道有翻版的人，专做盗版，生意做得很大。不但翻小书，大书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等都有盗版。虽然纸张、印刷不好，但是价钱很小，折扣又很低。而且他们的规模很大，不单是翻印、盗印亚东的书，别家的，如北新等的，只要版次多、销数大的，无不翻印。我们要付版税和稿费，又要很大的开支，而盗印翻版的没有这种负担，所以他们可以比我们卖得便宜得多。

面临着这一大威胁，我的大叔当然用全副精神对付盗版。他联合了几家被盗版的，如北新等，又公请了一位史佐材先生专办这个工作，又聘请了律师。

这件事只有由我的大叔来说才能仔细，而今不可能了。我只有把当年听到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

盗版的人非常阔气，常在东亚、永安那种大旅馆里开房间，吃、著、嫖、赌，无所不为。他们翻印时，只拿一本书交给印刷局，要他们照排，也不校对，只由印刷局一校算了，所以错字很多。

史佐材先生到上海了，那些翻版的人立刻会知道，他们知道要吃官司了。如果盗印的书很多很多，他们可以包几节火车，一夜运到天津、北京。等到史先生得信，赶到天津、北京，

他们又可以一夜工夫，起运到广州去了。你赶到东，他们逃到西；你赶到西，他们又逃到南边、北边去了。

他们到一处，就找小书摊代卖、泻货。摆小书摊的有的不敢做，他们也有办法，说：“你全家每月要多少开支？你说来。你卖，如果吃官司，捉去了，坐牢，一切有我们担任，家用按月照付。至于打官司、坐牢的一切花销，都由我们完全承担。”“有钱使得鬼推磨”，小书摊放胆做起不正路的生意来了。

亚东首创的标点本旧小说，跟着做的也很多了，而且又有什么“一折八扣”本出现了，以致我们的销场突退了下来。

做标点本的，有大达、广益、中央等几家大做，还有群学社、大中、扫叶等。当年听见说：“广益预备拿出十万元做资本，专做标点本。”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我们店里的同事到编辑所来常说：“他们门口，天天有大箱大箱的标点本运出。很大很大的大书包也很多。”他们不单出标点本《水浒》、《红楼梦》、《三国》等，也出其他笔记小说等等，文言、白话的都做。

记得我当时想：“这也很好，标点、分段通行了。这是进步。这是好现象。我们原来只说‘不许照样翻印’。”又想：“中国大，大家做，不妨。我们规模不大，只求能立足就是了。”

有一次，北京的老同行来，谈话中他们说：“老实说，有人上柜台来买，我们总是拿出‘一折八扣本’以及其他便宜的本子给顾客。如果是八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成功，一定要‘亚东本’，那时候我们只好再拿出来。他们是骗不了的。”

盗版，多家做“标点本”，禁书——这三件事，使亚东很受影响。关于禁书，下面再谈了。

禁书种种

书刊遭禁，早就发生了。前前后后，一并在这里说一说。

秋桐先生（章士钊先生）主编的《甲寅杂志》是亚东出版的第一种遭禁的期刊。原因是发表了反对袁世凯的一篇《帝政驳议》。前面已经讲过，不重提了。

书籍遭禁的，早先有《胡适文存》、《独秀文存》。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刊》“零碎事情”第一项登载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

“《天风堂集》和《一目斋文抄》忽于昌英之妣之日被
ㄣ一ㄣ出了！”这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作者别署“隻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罢。“ㄣ一ㄣ出”也许是禁止。……但什么是“昌英之妣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妣”是个什么字。啊，有了！字典……注着：“……夫之兄也。”中国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午吗？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

胡适曾经别署“天风”，《天风堂集》就是《胡适文存》。陈独秀曾经别署“隻眼”，《一目斋文抄》亦即《独秀文存》。

1924年7月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专载”刊出《胡适之给张国淦的一封信》。张国淦，字乾若，1918—1924年间先后任平政院院长、内务总长、司法总长等职。胡适的

信如下：

乾若先生：

六月八日见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时，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蒙先生允为访问；过了两天，梦麀先生代达尊意，说已代询过内务部及警厅，据云：“《胡适文存》及《独秀文存》并未曾禁卖。”并云：“前次向各书店收去检阅的，均已发还原告了。”当时我自然很觉得满意；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厅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前次没收的书也并不曾发还。

我曾把先生转告的话说给一两家书摊掌柜的，他们信以为真，就试把一两部《胡适文存》摆出来看看。不料各区警察署仍派便衣侦探干涉此书，不准售卖。

我想再奉托先生再为一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非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我所知道的，南城有一家书摊被收去《胡适文存》三部、《独秀文存》七部。西城锦什坊有一家被收去两种“文存”约十几部。）我很盼望先生替我一问，因为现在各书摊的掌柜的疑心我说谎；我既然不便疑心梦麀先生和先生说谎，自然只好请先生再为一问了。

最奇怪的是现在警察厅禁售的书不但有这两部“文存”，还有便衣侦探把一张禁售的书单给各书摊，内中有什么《爱的成年》、《爱美的戏剧》、《自己的园地》等书。这真是大笑话！《爱的成年》是英国著名老宿嘉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名著，世界各国文字皆有译本，不料在中国竟遭禁卖之厄。《自己的园地》乃是周作人先生评论文学

的小品文字的结集，为近年文学界希有的作品，亦不知为何遭此灾厄。这些书固然于我无关，但这种昏谬的禁令实在太可笑了，我连带说及一句，也很盼望先生们能设法消除这种笑话，不要太丢中国的脸。匆匆奉闻，乞恕琐屑。

胡适敬上

十三·七·三。

《民国日报·觉悟》就此事还登过一则邵力子的“杂感”：

我看到胡适之先生给张国淦的一封信，里面有两句话：“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我想，张国淦即愿受胡先生之托“再为一问”，但胡先生终于不会得着答复的。

“要禁便禁”，我想这便是北京警察厅所恃的唯一的理由，胡先生要寻根究底地去问，未免太不聪明了。……

从以上可以约略窥见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所受的迫害为何如。胡适的信发出以后如何呢？当然是无结果。那时政府禁书的策略，显然可见，采取一种非公开的形式。而且还有“警察厅定期焚书”的记载。实在吃不消！我们的损失当然不少！

1927年，又有一些书遭禁。杨之华的《妇女运动概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其中列出亚东被禁的书如下：

《义冢》（钱杏邨著，误为蒋光慈著）。

《鸭绿江上》（蒋光慈著）。

《百花亭畔》（高语罕著）。

《两个女性》（华汉著）。

《少年飘泊者》（蒋光慈著）。

《纪念碑》(蒋光慈著)。

《白话书信》(高语罕编)。

《转变》(洪灵菲著)。^①

鲁迅这篇后记中关于国民党查禁图书部分,后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该书注释中所列亚东被禁的图书除以上外,还应补上一种《爱的分野》(蒋光慈译,误为蒋光慈著),算来不止八种而是九种了。

现在把我们在那一年写给本外埠代售处的信全录于下:
逕启者:

敝馆奉到三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一五九二号内开:《白话书信》、《少年漂泊者》,以上二种严予禁毁,以绝流传;《义冢》、《两个女性》、《转变》、《爱的分野》,以上四种,内容宣传普罗文艺……应予禁止发售;《纪念碑》、《鸭绿江上》、《百花亭畔》,以上三种,或含有不正确意识者……应暂禁发售等语。敝馆分别遵照,将前两种纸型及存书呈会缴毁;《义冢》等四种已不再发售;《纪念碑》、《鸭绿江上》、《百花亭畔》三种,暂行封存,一俟中央政府撤销禁令,再行通告发行。因恐远道易滋误会,敬此奉达,尚祈注意为幸。贵处如有此项存书,务请全数退回,其余仍恳鼎力推销为荷。

此致

台鉴

上海亚东图书馆谨启

民国廿三年三月卅一日

① 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第457页。

针对大批查禁出版物的情况，当时上海各书局曾一再呈文给市党部。呈文有云：“窃思商店等均系小本经营，一书之成，自收稿以迄出版，经过时日，常亘一年半载，所投资金不下四五百金。故印行之际，不敢不慎之又慎。此次奉令查禁各书，自信绝无干犯法令之处。……今不分轻重，一律禁毁，际此教育衰颓、商业凋敝之秋，商店等勉强维持，已觉万分竭蹶，受此重大打击，势将无以自存。”因而提出“请求重行审查，分别从轻处理，以苏商困而维文化”。后一次呈文并提出：“如何设法禁绝翻印，俾免拖累而端趋向，实为德便。”这些“请求”的结果，不用说是石沉大海的。

叔 侄 相 左

我的大叔孟邹先生回忆亚东历史时说过：“到了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我看见营业有渐落的情形，打算要做一个分家的手续，一面是想着要从事节省了，可是并不曾实行做到。”

这里我有些话要补充。我们叔侄之间，多年来，意见总是不合的、相左的、不同的，真可以说是背道相驰的，不是一朝一夕了。

回想得起来的有：

1. 我的大叔口口声声的说“要节约”；我老要说：“单单节约，不讲生产，不顾生产，非常不好。”

2. 他从来以为薪水不改也不妨，分红不加也不妨；我以为这是一个大毛病。我以为要便要加薪，要便要加分红，一点不动，不能引起积极性了。

3. 他自己的薪水定得低，把我的薪水定得比他高，分红也是他少、我多。我很不以为然。为什么？他除薪水与分红之外，可以“交际”、“公益”等名义用钱，超过薪水与分红不知多少倍；而我，除薪水与分红，不能再动用店里的钱了。他总想把我做成一个“箭垛”。我的意思，要做“箭垛”，应该是他。

4. 同事常常批评“家店不分”，他置而不问。

5. 不分工，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作主。明明有发行所、编辑所，其实都是他一个人在问。不但亚东本身，芜湖科学图书社他也要管，搭股的店他也要管。如何管得了呢？

6. 收稿，收与不收，要与不要，都是他“一言为定”、“一言而决”。他只相信他所相信的几个熟人，只要是他们介绍来的，总是收、买。他只把编辑当校对，有时要希吕兄、昌之看看，说的话又没有用。

7. 大家都说重版书的价钱应该减低，他以为万万不可。

8. 发行方面，外埠同行来结帐，他都要自己直接处理。有时有的同行要抹几文零尾，如几元、几角，他总不肯。有时批评人，批评得受不了，有的同行很不满。店里同事说：“让抹一点小数，他代卖会起劲得多。”

9. 店里加同事，他并不和人谈谈，说用就用了，说来就来了。做事合手不合手，他不问、不管。有些并做不长。

10. 付版税给作者，拖拖拉拉，烦言不少。

象这样的事，写不了，只能略述如上。

我最不满意的还有一桩，就是他从事储蓄，而且为着利息厚，储长期的。他开始储蓄已经多年了，后来我也知道了，常想：“不怪哩！生意再也做不上去了！又不用银行的钱，又不用钱庄的钱，有余，还要搞长期储蓄，有死无生了！”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储蓄的好处来了，我只管说储蓄不得的理由。他很不以为然。

有一次，他又说起储蓄来了。我说：“你常说生意不好，做不上去，我看是由于储蓄的原故。你多多印书，比储蓄好。”从此，他再不曾和我谈论储蓄了。我也知道，他只管储他的，我只管反对我的就是了。

因为营业渐落，又因为意见相左，1930年1月，我的大叔和适之兄商量商量，由适之兄介绍，请梅华铨大律师做顾问，于1930年1月24日，做了一个分家的法律手续。

立书据人是汪孟邹，见证人胡适。书据开头说：“余于民国二年(1913)与师友创办上海亚东图书馆，随后师友自行退出，亚东遂为我个人所经营，辛苦艰难，不可言状！至八年(1919)，营业始有转机。十一年(1922)，财政始能自立。近年虽不愁生计，但亦未置有别业。只有根据亚东去年年终红帐总册结存现洋、货物、帐目、生财等等，除去欠人者外，两比计有财产值洋贰万四千元有零。余年已五十有四，老境渐臻，应为分析清楚，以免后来纠纷。”下面分几项：1. 资本额定为九千元。大叔四千五，我和我大哥乃刚、妹妹协如各一千五。2. 家庭其他成员共得七千元，多的一千，少的几百，但只许支用利息。3. 给同事八千元，各得三百、四百不等，四年付清，作为另开新书店的资本。

我的大叔曾把草稿给我看过。我道：“不如想想好的办法。请律师，一定搞不好。”他说：“我不能改动，一定要办到。”后来他叫了汽车，把适之兄请来，再要我们一道去签字。我想：“这回的手续，真叫人不明白。据我看来，无非是一个‘紧缩计划’罢了。”适之兄只听我大叔的一面之词，又急他自己的

版税恐怕要靠不住了，所以赞成“紧缩计划”，实在是上当了。

1933年1月2日，我妻子秋霞患肺炎去世。家事、店事，都不顺心。同年3月8日，我大叔又请章士钊做证明律师，立了一个法律手续，宣布他退出股本，把亚东让给我和乃刚、协如兄妹三人“共同接办”。章律师说过：“孟邹，事情还是让年轻的人来做的好呵。”但是，我的大叔绝对不和我们兄弟姐妹合作，亚东图书馆交给我们负责，他只要了一个芜湖科学图书社。4月1日，他带着我婶母就动身回老家去了。离开前，他说：“我回去，很放心。店里的同事都是老同事了，很熟识，发行方面有鉴初、啸青等，编辑方面有希吕、昌之等，店事是可以照常进行的。”

大叔回家乡后，我的大哥、二妹和一店的同事都赞成我立刻下店，我便去代理。店里有长期储蓄近万元，先后都设法拿了出来，办纸印书。一面又向银行借款，把缺的书补齐，把已排成的纸型也一概印出。同时又把薪水一律略略提高。大家做工作，真的很努力。起初生意还不坏，可是到了后来，突然大差，开支也太大。到了第三年（1935年），已经周转不灵，只好托章士钊律师再要我的大叔回店。陈独秀那时已在牢中，也帮着写信要我大叔重新回店。这些都是后话。

又去北平

适之兄在上海住了几年，记得在光华大学教过课，又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有一个时期，为了要编一部《白话文选》，我天天到他那里去。记得适之兄选的已经不少，我们也做过标点、分段、校读的功夫，也开好一个目录了。可是，这部书并没

有完成，后来连目录和稿子也不见了，也许是当废纸卖掉了。这是很可惜的。

1930年适之兄一家回到北平去了。适之兄曾经对我说：“原放，我走了，你最好搬到这里来住，房租比温州路便宜。我的家具都不带了，都给你们用。”不过，我觉得太远，跑印刷所、装订作，种种不便。后来适之兄要动身时，又劝我全家搬到北平去住。我的老母又嫌太远，结果也去不了。

那两年，店里的生意没有进展，营业额有逐渐降落的样子了，我的大叔有点着急。1931年初，恰好适之兄来信，又有希望我到北平去的话，于是大叔提出要我到北平去一次。他说：“有许多书，排成了，没有新序、考证等，又不能出版。”意思是让我同适之兄面商解决。我当时身体不好，他叫我到北平上协和医院去看看，说：“适之是协和的董事。”

我要鉴初兄一同去。1931年4月19日到了北平。一到北平，马上雇了汽车到后门米粮库胡适家。胡适新搬的房子是一个朱漆大门、有花园的洋房，汽车直开进门，到住处才下车。我们住楼下书房后面藏书地方的门口一间，看书很方便。藏书的屋子可以叫做书库。书库后面还有一间，罗尔纲兄在那里办公。适之兄的书房就在书库前面。楼上房间是徐志摩先生住着。

我和鉴初兄到北平不几天，适之兄就介绍我们到协和医院看病，他主张我们住院全身检查。检查的结果，我并没有病，给了我一张“康健证明书”。

我们在北平时，适之兄和我们随时谈谈出书的事。我记下来的书名不少：

《红楼梦》古本。

《西湖二集》。
《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
《西湖拾遗》。
《龙图耳录》。
《清平山堂》。
《中国古代思想史大纲》。
《诗经新解》。
《藏晖室劄记》。
《我的信仰》。
《文选》。
《诗选》。
《聊斋志异》。
《醒世姻缘传》。
《杂剧西游记》。
《蒲松龄散曲》。
《缀白裘》。
《十二楼》。
《文木山房集》。
《四十自述》。……

只好一步步的来准备。首先是《醒世姻缘传》和《十二楼》已经排好，纸型现成，只要加上新序等等便可出书了；可是适之兄又访得了更好的木版本，于是鉴初兄和我动手用新本复校。其他只好放后了。《醒世姻缘传》，除适之兄写一篇序，志摩先生又答应也来写一篇。《十二楼》，孙楷第先生允写一序。

又一天晚间，与适兄谈到一时才睡。他谈到《聊斋》已得一初本，可以用来校读。又谈到《隋唐艳史》新得一好本，《隋

唐演义》是在《艳史》后做的，《艳史》的好处在不背正史。还讲起《女仙外史》也得一好本。

有一天，志摩先生接到他家里的电报，要他回上海。志摩先生外出回来，说：“我真决不下哩。我又想坐火车回去，可是有一个朋友要送我一张飞机票。我不知道还是坐火车好，还是坐飞机好。”

我是心直口快的人，说：“徐先生，坐火车去罢，不要坐飞机。”

他说：“为什么？”

我道：“飞机愈做愈好，将来坐的机会多哩。”

这趟他来回都坐的火车，平安无事。

是“九一八”前，我先于鉴初兄回上海了。忽一日看报，惊悉志摩先生另一次坐飞机失事，竟焚身而亡！诗人这样丧生，实在是可惜、很可伤的！

后来鉴初兄回上海了，谈起徐先生。他说：“那一次徐先生回上海，大家事后都说：‘怪哩，往常，徐先生走就走了；这一回，怪，到一个个的面前说：‘我走了，再见。’’大家想想，说：‘唉，那是告别了！’”

徐先生是 11 月 13 日由北平回上海，18 日离开上海去南京，19 日由南京乘飞机返回北平时在济南附近遇难的。《醒世姻缘传》的长序，他写成后再动身的，想不到竟成了他的遗作！

第十一章 狱中来信一束

一九三二年十月，陈仲翁又一次被捕了。翌年初夏，他寄来一个明信片，说病了。我到南京牢里去看望他。从此，仲翁时常有信给我，或买药，或买书，或谈店事，或谈我的续弦问题。

陈仲翁又被捕

民国二十一（1932）年十月十五日，仲翁又一次被捕入狱。

实在记不清了，这件案子大概还是见报才知道的，解往南京，报上也有报道的。

我的大叔说过一句：“完了！这一回，仲翁的老命一定难保了！”

当时章行严（士钊）先生在上海设有律师事务所。记得有些消息，是我的大叔到他那里去打听来的，有时听说仲翁很危险，有时又听说不会有性命之忧。

仲翁这一次被捕，大家只着急，并不象过去几次，十分惊慌，十分害怕，天天要东逃西躲的。一来 1927 年后，他在彭礼

和家住过一些时，后来搬到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二来我的大叔曾对他说明，一家人都害怕，因此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到过店里和我们家里了。

从前，陈独秀曾具名“隻眼”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云：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那是 1919 年发表的。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曾经把他抓起来，坐过监牢。而今，又遭《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殃，被捕入狱，岂不可叹！

后来法院竟判他十五年监禁。^①

我们听见，又很高兴，又很难过。为什么高兴？因为可以善终。为什么难过？十五年之久，不已经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人了吗？还能再做什么事业呢？

去南京看望

有一天，我接到仲翁在南京牢里给我的一个明信片，说他病了，要我去看看他。我立即把工作交给鉴初、啸青二兄，便到南京去了。我事先到章律师事务所去看章行严老伯，他给了几张名片，说：“你拿片子去就可以看到仲甫的。”

^① 据《陈案书状汇录》，江苏高等法院于 1933 年 4 月 26 日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

我到了南京住在南仓巷岳家，问了问，第一监狱在大石桥，出门不多远便到。门岗看了章律师的名片，立刻放我进去。有人带我到一处，进了门是一个小厅，有天井，天井里还有花台，但是没有花草。我看到了仲翁和彭述之，他们同住一处，有床，有桌，有长凳子。

仲翁说起肠胃老病复发，法医看不好，不及黄钟先生摸得清楚。我知道他很想黄先生一诊，他才放心，于是说：“我回去和黄先生一谈，他大概可以来看一看的。”仲翁随即写了一封信，交我带给章行严老伯。

我回上海，看到黄先生，他竟一口答应到南京一行，真令人感激。他只要章律师给他一封信（这是一种保障）。

我到章律师事务所，恰好章老伯出庭回来，下了汽车，立刻问我仲翁的情形。我说了。他看了仲翁的信，也不上楼，立刻在事务所的写字台上动手写信给黄先生。信如下：

应君先生左右：积年违教，时切驰想。近以陈独秀先生在京患病，非得先生为之诊治，不足以起沉痾，而坚病者之信。原放兄来言，从者慨然愿往，不胜佩仰。顷以俗冗未克趋教，一俟台驾返沪，定当肫诚奉谒。余不一一。手请
台安。

弟章士钊顿首

七月十八日

这是1933年夏的事。记得这封信是挥汗写成的，他的一个老随从还用芭蕉扇替他打着扇。

好象是当夜，我便陪黄先生搭了沪宁线卧铺到南京的。因为怕耽搁别的病人的病，所以次日午后便要回上海。

黄先生在牢里替仲翁细细的看过，开了打针的药，又开了常服的药，又讲了一些饮食应该怎么注意小心的话，我们便出监狱了。随后便同回上海了。开的药在南京都买不到，结果都是由上海办好寄去或托人带去的。

黄先生对仲翁说病不妨，要他放心；出监狱后，对我也说，仲翁是旧病、老病，不很严重。我放心了，立即发信到徽州告诉过我的大叔的。

仲翁和黄先生是老熟人了，他很佩服黄先生看病看得很好，医德又好，他曾介绍过不少的朋友到黄先生那里看过病。瞿秋白同志有肺病，也由黄先生看过不少次数。还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是三三两两、先先后后的，到黄先生那里检查，出了证明书，才出国去的。这是那时的上十年前的事了。

这次去看仲翁，他对亚东店事很关心，可是只能略略一谈。最后我说：“我下次再来细说一个大概罢。”他很高兴。

从此，仲翁时常有信给我，我预备择要录一些在后面。这批信都是 1933 年到 1935 年三年中，独秀先生在南京第一监狱中写给我的。1936 年以后，他有信只写给我大叔了，我那时已经不常在上海，时常来去于徽州故里了。信有几十封，有的是明信片，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年份已不可考。内容主要是请问医生，买药治病；次之是买中、英、日文书籍；次之是问问亚东的情况；次之是对我续弦的事提出意见；也有的是其他事情。这里录的主要是有关亚东的事和买书的事，还有别的比较重要的事。

关于章律师的答辩

1933年8月1日仲翁给我的信（他的信称我“方泉兄”，这是他替我取的别名，他自己则署名“弟季丹”）说：

羽兄寄来《大美晚报》（汉文的）、（登载“上诉状”的），未曾收到，大概未由信封寄，被没收了，可否再觅一份寄来？（用信封寄，或托人带）

……

望与行严先生一商，是否可将其中“清共而后……罪胡为乎来哉”这一段删去？

“羽兄”，是高语罕先生，他号一羽。

记得有一天，我到南京狱里去看仲翁，他一见面便气忿忿的，光着眼，对着我说道：“唉！行严真糟！你回去，马上去告诉他，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你看罢！……”

他在书架上拿出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来，翻到一页，说：“你看！这成什么话！”

我当时一看，仲翁已经在“清共而后”那一段改掉了不少的字句了。我看后，说：

“这一本，我可以拿回去给章老伯一看罢？”

他说：“好的。”

我记得他是要把“反对派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江西，成为‘犄角之势’”（非原文）的意思完全删去。这很明显，他无非不赞成说他和江西是对立的。

我希望行严先生将来可以找出那本《陈案书状汇录》来，那是我面交给他的。上面改的句子，都是仲翁的亲笔字（毛笔

写的),熟人一见便会知道是仲翁的笔迹。《陈案书状汇录》是
经我手付排付印的,记得是印一千册。

关于买书

仲翁来信中,托买书的事是很多的。

前述 1933 年 8 月 1 日来信末尾说:“莫尔干《古代社会》
(南强出版吧?)望购一部寄来,能购一部英文的更好。倘英文
购不着,望商之季子兄可否暂借我一读,如他此时不用。”8 月
9 日的来信说:

望到内山书店代购以下各书:

1. モルガン 古代社会(上下卷)(如购得此书,前函所
请购中英文本,均可作罢。)

2. レーニン 组织论。

3.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

4. 伦理と唯物史观。

5. マルキシズム 方法论。

以上五书均日本改造社出版,其定价共计日金不过
二元余,务望购齐,寄刘女士处。

“季子”,是李季。“刘女士”,是刘梦符女士。

同年 9 月 12 日来信说:

所托购买各书已购得否?又有两种书:

一、何礼所著几本小册子,内容是主张共和政治,香
港出版,以前上海广学会出售,书名已不记得,只要是何
礼著的便得。

二、《中亚细亚游记》(书名大致如此,其详已记不

清。)上海时务报馆出版。(不过十万字左右)

右二种书,均是三十年前的古骨,但此古骨却有不朽的价值。望兄自己或乃刚兄亲到广学会(基督教的)和各石印书店详细搜寻,如能寻得,等于获得宝物,因此二种书均极有价值,恐均已缺版了。倘购得,亚东大可重印出版,可请多人作序(弟当然要作叙)大吹一下,这种书真值得一吹也。

所购买各书,大部均可交邮局寄刘女士,只很少部分须托赵带也。

又,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此三种刊物均已连续出数十册,中多名著(商务印书馆已选译数种出版了)。请函托日本书坊,尽所有的全部购来。我以为亚东亦可于其中选择几种出版,因其有永久价值,且多系二、三万字的小册子,费成本并不多,虽然销数不能很多很快,而却有永久性也。亚东如有意办此事,我可为寻可靠而价贱的日文译手,由我选编指导为之。此事如商之适之兄,彼必然赞成。

“赵”,是赵健,号畏天,是刘梦符女士的丈夫。从前是柏文蔚先生部下的军官,那时在慈幼协会工作。

同一天又有一信,末有“又白”: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及清华《国学丛刊》,亚东曾代售否?能觅得若干册否?全部当不易得也。

罗振玉著《殷虚书契》前后编(珂罗版影印本),此书不知何处出售?哈同花园仓圣大学不知有售否?便中可问行严先生知道此书售处否。书价倘能在廿元左右,请为我购一部,特恐无此便宜耳。

一打听，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每部要二百三十二元。仲翁 10 月 2 日信中说：“罗书既如此之贵，当然不能买，即有钱亦不必买。如有二百三十二元，再加若干，可购一部《廿四史》了，何必买此。已设法托人借一部来看看，或者可以有望。”

经过黄钟先生诊治，仲翁服药、打针，经过一段时期，病才大好，他竟可以天天读不少时间的书，到后来，又竟能从事著作了。最后，他还开始学德文了。他原来懂日文、英文、法文的。他还懂别国文字不懂，我不知道了。

10 月 5 日一信托买英德、德英字典等。内容如下：

方泉兄：

前日由邮局寄上一函，已收到否？致行严信，望便中交去。

中美图书公司或他家，如有英德及德英小本字典（没有汉文的），望各买一册，有小本合印者更好。我以前曾见过此类小本字典，小小本子，纵约三英寸，横约二英寸弱，一册中，英德及德英各半，解释少而单字并不少，价钱不过一元左右，不知此时上海能觅得否？如觅不着，望询之行严先生，他如有，请他送我一本。

再者，日本有一种各国语独羽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过一、二角，想必现在还有，或者比从前的更好些。兹开一单，请寄东京托购（其书纵横不过二、三寸，不过一百页）：

- 1.《蒙古语独羽》。
- 2.《西藏语独羽》。
- 3.《缅甸语独羽》。
- 4.《暹罗语独羽》。
- 5.《朝鲜语独羽》。

- 6.《安南语独羽》。
- 7.《马来语独羽》。
- 8.《土耳其语独羽》。

或者先去内山一问，他那里有也未可知。……此祝健康！

季丹手启

10月10日一信告我，已收到赵君带去的一批书，计有日文书十一本（内《第一インタナショナル史》只有第二部，要求补购第一部，并嘱如函购要注明“改造文库本”），《中国革命史》一本，《传(?)尔文传》一本，《不如归》一本，《书信选辑》一本，《马克思传》三本。

10月11日又有一信，讲到：“前托你到中美图书公司购英文的《世界地理新字典》，有否？那里如有L. T. 的What next, 望代购一本。”13日又在信纸顶上加批说：“《中亚游记》（时务报馆出版）各石印局都没有吗？兄处如有《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二集，望检出觅便带来，此时需用甚殷。最好托适之带来。”15日添了几句“又启”：“亚东和有正书局，以同业名义购书，如有折扣，望代买《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珂罗版印）一册，托便人带来。（书重，邮寄太贵，不合算。）倘无折扣，则勿购。”

仲翁10月13日在11日信上加的批还说到：“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从他写信托买的书单子看，确实如此。

11月15日一信，要代购汉译的《反杜林》。

11月19日一明信片，则讲收到代购书籍的事，计有“日文《古代社会》上下二册及汉译《经济学批判》、《工资、价格与

利润》和石印书目”。接着指出：《经济学批判》等四种，他要的是英文本，汉译他已经有了；《工资、价格与利润》也买错了，他要的是李季译的、商务出版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并嘱我下次购买，“将原名细心看明，以免错误”。

仲翁的信散失的实在很不少。以致 1934 年，到 8 月才有信。中间大概少掉了不少的信。只好拣在手的一一录下。

1934 年 9 月 22 日一信，讲收到《独逸文法教程》一本，“极好，正合用”。信末又提出：“V. Sanint Martin: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eographie universelle. 《世界地理新字典》不知中美图书公司有此书否？如有英译本，那便更好。”

10 月 10 日仲翁又有一信云：“近日上海印两种全史：一，开明《廿五史》，预约价四十元；一，书报合作社《廿六史》，预约价廿八元。后者比前者价钱少十二元，是否内容太差？倘二者内容不相上下，当然购书报合作社的《廿六史》；倘合作社的太投机、撒烂污，则应购开明之《廿五史》，虽稍昂贵亦无可如何也。”结果是代仲翁定了开明的《廿五史》。

11 月 8 日一信说《汉晋木简汇编》一大册已收到。又提出：“《玉函山房辑佚书》如有石印本，请代购一部寄来。务求派人到各石印书局一问，并求向各石印书局索一书目寄下。”

之后，还有 1935 年的几封信，关于买书，只是催问开明《廿五史》，并询及商务百衲本《廿四史》售价和是否影印等。此外讲到亚东营业情况等，下面再分别摘录。

关于亚东的出书和经营

对亚东的出书和经营，仲翁一直是关心的。

前面提到过,1933年9月仲翁一信提议亚东重印何礼的小册子、《中亚细亚游记》,选译日本的几种刊物等,认为销数虽不能很多,却有永久性。

1933年8月9日一信有一节专讲译书的事:

《马可波罗游记》可请洪孟博或刘仁静(季子可寻着他)翻译。据我所知,他们二人英文均可靠。其中人名、地名部分很难译,此方面,弟可尽力考证。此书在近代东方史(特别是中国)极有价值。

《古代社会》,莫尔干的,亦有重译的必要(最好请季子译),此书和《资本论》及《人类由来》为近代三大名著之一,皆世界不朽名著也。

《马可波罗游记》后来由李季翻译,亚东出版了。1935年2月11日仲翁信中还讲到:“季子所译《马可波罗》倘不即时付印,能带给我校阅一下也好。”

1933年10月13日仲翁讲到撰写自传的事(是补批在11日信顶上的)。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写(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述。)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①

① 亚东图书馆于1940年出版陈独秀的《实庵自传》。卷首有1938年3月7日《实庵自传刊者词》云:“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已可从而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现在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

有时仲翁在信里对亚东的出书发表一通议论。1933年10月11日的信说：“我以为《今古奇观》、《诉状》（章行严先生拟编的）、《适四集》（《胡适文存》四集）都能销行，勿过虑！”1934年12月7日的信说：“亚东近出二书，书名及作者之名均不能号召读者，不知何以要印那样的书？^①行翁《论衡》及李译《马可波罗》都要行销些”。

那一段时间，亚东经济上相当困难。与仲翁书信往还中也曾屡屡涉及。1933年11月15日仲翁来信说：“店中经济既如此困难，眼前救急，除节省开支外，实无其他办法，令叔以前谨慎小心的办法，未必无理由，兄现在身当其冲，已领略其中滋味，我以前极力怂恿令叔把店交给你管，亦有必须使你早日获得经验之意。惟兄却不可以此自馁，应该加倍努力为之，谨慎为之，天下无不可战胜之困难也。惟节省开支，必须以身作则，始能见谅于同事及家人，此层望兄特别注意。”

1934年还有仲翁为亚东事给柏烈武先生的一封信，如下：

烈兄如面：

久未晤面，谅一切均好。原放顷来谈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嘱弟为一言，特此，敬祝

健康！

贱恙已渐良好，知关注，特闻。

弟仲手启

十二月十八日

① 所指是哪两本书不明。

这是我录在小册子上的。我到南京后湖 48 号柏园去看柏先生，却不曾看见，只投了信，园中人说是柏先生到安徽去了，一时不回南京。

在经济困难中，亚东曾筹划招股增资。1935 年 2 月 11 日仲翁来信谈及此事说：“店股款事，谅必无望（我以为章、胡都无法），则只有自己努力，极力开源节流，以勉强支持此不景气时期。年关不知如何过去？好在全上海市面都不佳，即信用欠好，也不算什么特别希奇，望勿以此愁坏身体！”几天之后，1935 年 2 月 18 日，仲翁又有一长信论及店事，还出了很具体的主意。摘录如下：

书店改组后，孟翁只任董事，推鉴初任经理，我甚以此见为然。如照此办法，兄可一面帮助店中进行改组后的出版新计划（此事十分必要），一面帮助行翁做点事，兄以为然否？

店事，兄之借款主张，全是幻想，切勿再作此打算。股份公司亦不可能，不独招股不易，而且以书店历史关系，诸多窒碍难行也。唯一的办法，只有二三好友，集资合办。此制度中外都有。合资之人，当以行翁及黄（钟）先生为最相宜，章、胡（适之）如能合作，胡亦应加入；惟此事务必慎重，不可冒昧邀胡加入，是为至要！

新资五、六万元即足用（能多更好，恐不易得）。章、黄二人如肯出任董事（合之旧资代表孟翁共计三人），五、六万元谅非绝对不可能，虽然不很容易。据我观察，此事非孟邹到沪，便无从谈起。我看章、黄二人都有此意见，所以速催孟翁出来为要。他虽然答应出来，兄还应继续函催，……孟翁未出来以前，兄应拟一详细的改组后整顿出

版及发行计划。……惟此计划必须守秘密，宜力囑章、黄勿轻示人。

这里，“孟翁”即我的大叔汪孟邹，当时在安徽家乡；“行翁”，即章行严（士钊）。

关于重印《独秀文存》

《独秀文存》初版印行于1922年，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便不曾再印了。六年中一共印行了两万九千部。

1933年，我到南京看仲翁的时候，他谈起：“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可以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帐结清才好。”

不久后，《独秀文存》就重印出书了。这次重印，不敢在日报上登广告，但在我们的小本书目上却加了说明云：“此集所收为著者在民国十年（1921）以前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之作品，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内容乃提倡文学革命，改进伦理观念，讨论宗教问题。读此可见著者十余年前之思想与主张。九版后有蔡子民先生的序，说‘本书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洋装两册，两元七角。平装四册，两元一角。”

1933年我们先印了一千部试卖，销场不差；于是次年又印，一次又印了两千部，在三月间装成，等禁书的风浪过去再行发售，倒不曾出岔。这就是《独秀文存》的第九版和第十版。当时有的同人说：“这部书，六年不印，真正可惜！”

关于欠亚东钱的事，也是仲翁来信中常提到的。1933年6

月16日信中说：“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1933年10月11日收到亚东寄去的一纸账单后，又有一信问起：“另一账单，是《文存》的账，写的商业方式，我是外行，不大看得懂，账上的账是《文存》的码价吧。15%是版费吧。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二百六十四元余，是这样吗？所谓透支，是在以前的版费账上，我多用过三十余元，是这样吗？《文存》还可再印吗？《字义类例》，未卖出多少，还有多少呢？”

仲翁的小儿子哲民在上海读书，学费和零用由亚东按月给他。这类事也在信中时有提及，不一一赘述。

在狱中，仲翁曾撰写文稿，托章行翁售稿于书店。谈及此事的信，摘录几件于下。

1934年10月10日信：

文稿已动手，题为《道家概论》。此一种稍冗长，一时不易写完，拟先写一短文，题名《老子考略》，写好即寄由兄处转行翁，乞兄先告行翁，不知合用否？行翁收到拙稿，系售诸书局出版，或暂存行翁处以待价，请兄询明行翁示知！

1934年11月3日信：

兹托静带上文稿一册，请交行翁，无论能用与否，尚望寄还。倘能用，俟全部写完誉清后再寄上转送行翁处。倘不能用，亦望示知，以便另写别稿。

弟拟在二、三年内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家》、
《耶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关于朋友交往

仲翁来信中，有些是朋友之间转托的事或转交的信，其内容有的关乎著译出版，有的反映友情冷暖，饶有兴味。略摘几件如下。

1933年11月8日一信，仲翁只写了一句话：“此信望与季子一阅。”是把胡适给他的一封信，转给李季一阅。胡适的信全文为：

仲兄：

手示敬悉。

《资本论》，此间已托社会调查所吴半农、千家驹两君合译，已脱稿的第一册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册已在四月前付商务排印。此二人皆极可靠，皆能用英德两国本子对勘。其第二册中 Rent 的一部分也已译成。此间与社会调查所已订有契约，不便再约季子重译。季子译书能力，自然能胜任此书。但我听说中山文化馆有约季子译此书之说。如此则季子另译一本，已有着落。如不归商务发行，则两书并无冲突。如两本均归商务印行，则商务不能不因此间契约关系，继续接受此间吴、千二君之译本。

“国语稿本”，已于四月前亲交商务。顷晤云五先生，

他说，稿本字太小，不便影印。排印则有许多困难。他已与馆中商如何排印之法。迟印之因在此。

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

敬祝

安好。

适之

廿二、十一、二。

这是胡适 1933 年 11 月 2 日给陈独秀的信，落款日期很明确。不多久后，仲翁给我一信，讲到同胡适绝交。这一段文字如下：

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说关于老胡之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这是 1933 年 11 月 15 日的信，上海 11 月 17 日收到的，邮戳很清楚。从内容看，涉及此事的信当不只这一封，可惜散失了。次年，适之兄还是到牢里去看过仲翁的。据适之兄说，他是同那时的教育部长段锡朋一道进监牢里去看仲翁的。仲翁最重感情，适之兄去看过他以后，他又不生气了。

1934 年 9 月 27 日仲翁给我一信：

原放兄：

静回沪所托寄书，谅已达览。兹托静转上宣纸一条，请即送交行翁，请其大笔一挥，写好仍交兄觅便寄来。并

请兄转告行翁，最好能写他的近作诗词，愈速愈好。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兹托行翁书即此四幅之一，望以此意告之行翁。

此祝 健康

明宜手启

九月廿七

“明宜”，是陈仲翁自署的另一别名。

此信交给行翁后，过了一些时，行翁已经写好。我问起时才知道他新做了诗，写成便拿去裱去了。这张屏条真裱得好，是绫裱的。

当时我把行翁所写的抄下了，今录于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之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扞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觴。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樯目尽迎。（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樯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甲戌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

标点是我现在随写随加的，也许有误。原来是并没有标点的。

第十二章 江河日下

一九二六到三〇年，每年营业在七万元以上。“九一八”以后营业渐落，一九三二、三三年落到四万元左右，一九三四、三五年陷于支大于收的局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更是只能勉强支持于竭蹶之中。抗战胜利后也未见起色，出书日少，靠卖存书度日。真正是江河日下！

一九三二到三四年的出书

1932年，我们一共只出了八种新书，其中有李季著的《我的生平》、译的《妇女自然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刘剑横著的《史的唯物论之伦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唯物的宗教观》，孙俚工编的《唐代底劳动文艺》等。

1933年，亚东创办二十年了。2、3月间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全部大廉价”。除在日报登小广告，列出书名外，还印了单张广告。文云：

本馆自民国二年(1913)创立，迄今已二十周年。此二十年中，虽因种种关系，未能扩大猛进，为文化事业多所尽力，但就此小规模之经营，历年努力，未敢自馁，所出新

书或翻印旧籍，务求适应潮流，切合适（实）用。如新文化书籍之推行，著名旧小说之整理，新书则着重抉择，旧籍则着重校讎，印刷装订，皆不敢稍存苟且。故二十年出版书籍，数量无多，而内容质量，差堪自信，并蒙学术界之相当赞许。兹值二十周年纪念，本馆既庆微渺基业之幸存，尤感各方人士之爱护，特将全体各书举行大廉价，以答惠顾诸君之雅意。谨此通告。

所列书名，按人分栏，如胡适、陶知行、丰子恺、李季、蒋光慈、高语罕、鲁彦、刘剑横、孙俚工各几种以及旧小说等等。

这年新出的书有十六种。以后一年出书再没有超过此数。十六种中较重要的略举几种如下：

《四十自述》，胡适著。著者原定分三个阶段：留学以前为一段，留学的七年为一段，归国以后为一段。但因事务纷繁，种种打断，只写成了第一段的六章，作为第一册先行出版。卷首有序。

《达尔文传及其学说》，德国海尔博著，李季译。1933年4月18日，是达尔文五十年忌日^①。译者觉得国人介绍达尔文学说的工作不曾做好，又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应当懂得达尔文主义，故把这部专论达尔文的生平事业与学说的书译成。

《不如归》，日本德富芦花著长篇小说，林雪青译。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杰作，林琴南曾译成文言本。林雪青译笔忠实而流利，明白晓畅得多了。

《短篇小说》第二集，胡适译。共六篇，美国哈特两篇、

^① 此处所记年份和日期有误，达尔文卒于1882年4月19日。

哦(欧)亨利一篇,俄国契诃夫两篇,英国莫理孙一篇。

《现代文明史》,法国薛纽伯著,王慧琴译。记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陈仲翁,谈起要出《现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说:“那部书可出,序,我想,可以请高一涵先生写一篇,一定妥当。”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应,由邮寄了一篇序给我。后来高语罕先生看见了高一涵先生的序,他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说王慧琴的译笔是很不错的。我问起前面有几章是仲翁自己译过发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说不错,可是他要王先生译成,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工夫来译完它了。

还有平万编的《俄罗斯的文学》,鲁彦译、俄国郭果尔著的《肖像》,平万译、美国辛克莱著的《求真者》,蔡雪村著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江常师译的《欧洲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从维也纳会议到凡尔赛和约),标点本小说《今古奇观》(有孙楷第先生序)、《醒世姻缘传》(卷首有徐志摩先生的长序和胡适之、孙楷第先生的两篇考证)等。

1934年新出的书有八种。其中有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包括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原始基督教史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费尔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译者依据的是在巴黎某报馆的地窖里发见的三部著作汇印在一起的法文旧本。除第二部的正文外,其余都未有中文译本。其他还有李秉之译、郭歌里著的《俄罗斯名著》二集,绮纹译、俄国朵斯退也夫斯基著的《小英雄》,戴自俺著《教师生活速写》等。

1933年和1934年共出新书二十四种,总共约五千五六百页。其中有四千五百页是从前排成,已经打好纸型的;其余

是那两年中陆续新排的。每种印数，除《四十自述》、《短篇小说》第二集各五千册外，多的两千部，少的一千部。

这两年重版的书有四十九种。印数大的有《短篇小说》（初集）五千册，《独秀文存》三千部，《少年飘泊者》五千册，《鸭绿江上》四千册，《胡适文选》四千册，《老残游记》四千部，《国文故事选读》二千五百册；其余从五百到二千不等。

大约算一算，两年初重版共印十七万多册，大概用掉两千多令纸。我们从来用瑞典纸、加拿大纸，东洋纸是不用的，故书籍定价稍高。

亚东出版的书，到1934年，除遭禁的以外，有一百四十多种仍在发行。有的有存书，有的已补印，所以在1934年年终，大体没有一种是缺货的。

再说排书。1932年只排了五百八十页书。次年（1933），却排了一千六百页。再次年（1934），店里财政上发生困难的一年，却还努力排了不少的书，算来有二千七百多页，差不多和生意好的1931年一样。当时拟排和正排的书有：

《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

《胡适文存》四集，

《藏晖室劄记》（胡适），

《给志在文艺者》二集（任白涛），

《聊斋十一种》（散曲）（马立勋标点），

《西厢记》（标点本），

《十二楼》（标点本），

《醉醒石》（标点本），

《图格涅夫书简》，

《二灵集》（书信），

《论衡》(章行严注释),等等。

其中,《崔东壁遗书》开排于1924年,尚未排成,到1936年才出版。其他的,有的排成了,有的不曾排成(如《论衡》等)。

1935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出书都很少。有的下面还会讲到的。

营 业 很 差

先说1934年的收支概况。

收入:

批发 9,033,523 厘

门市 2,137,722 厘

邮售 1,128,880 厘

邮批 2,402,193 厘

门批 4,106,375 厘

合计 18,808,693 厘

而支出是:

23,155,527 厘

支出超过了收入。

1935年收入更跌到10,642,118厘。1919年全年营业额是12,943,001厘,十六年后颠倒少了二千三百多元。而1935年的开支是13,240,674厘,1919年的开支却只有4,425,689厘,就是说十六年开支增加了八千八百多元。

说江河日下,完全是实情。

我的大叔这年重新回店后,老要对人说:“店事给原放搞

坏了！他只要大，大，大，不要小。搞得真不象了，我真没有办法了！”

我总想：生意不好，势所必至，其原因很多，举其要者，不外：

1. “九一八”。
2. “一二八”。
3. 禁书。
4. 翻版，翻印，盗印。
5. 购买力弱。

为了渡过难关，想过一些办法。这里先看一封适之兄写给王云五先生的信。这封信是我面交的，我有留底。信如下：

云五先生：

亚东图书馆事，今晚承先生关切，甚感甚感。今晚汪乃刚、原放昆季谈了甚久，他们都很想商务能与亚东合作，不但可以救济亚东眼前的一个难关，还可以发展一个有点基础的小基业。所以我和他们商量了一个详细的办法，我已写了出来，可惜我不及与先生细细谈商了。现在请原放兄来看先生，并将一些参考资料带来与先生一看。

他们的意思甚诚恳，我很盼望先生能用先生的大力与大才替他们计划考虑一次。

匆匆告行，敬祝

大安。

适之

廿三年十一月十夜

办法：

一、亚东的原有生财、存书、纸版、版权、未出版之稿本与纸版等等，作为股本五万元。

二、亚东欠人约 元，人欠约 元，其欠人之款有六千元银行借款及透支，应于廿三年年底还清。

三、由商务加入两万元至五万元，作为新股。其中除一部分用作还债欠外，余作为新资本。

四、旧股与新股，自新组合成立之日起，均以官利每年六厘计算。

五、还旧欠之 元于亚东股本官利项下每年拨还一部分，约当官利之一半。其旧股每年应得之红利，全数拨还此项还欠之款。此款还清之后，官利、红利均与新股一律待遇。

六、亚东原有编辑、发行两部的人员，由新旧股东协商，酌裁一部分。其留者由新组织重定其俸给与待遇办法。

七、新组织之经理与会计由新股东委任。

八、亚东已印之书有版税者，由新组织照原有版税办法订立新契约继续支付。

廿三年十一月十号夜

结果如何呢？看看我给章行翁(士钊)写的“说帖”便知。

适之兄回北京之后，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章律师事务所去的，有时是为了银行接洽的事，有时是为了担保的事，有时是为了仲翁的事。有一次，行翁问起适之兄来时有什么意见，我大略的说了一说。他说：“你去写一个‘说帖’来罢。”

现在来把我的“说帖”的留底再录于下(略有删节)：

亚东图书馆自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后，收入

即已不能适合。二十二年(1933)二月由原放经理后，栈中存货，批发帐面，均能极力保持常态，惟现金周转之不易，一日加甚一日。……在过去之二十三个月中，如不随时将储蓄未用部分以及到期与未到期(约九千元)一概调出周转，如不向长者、亲戚、朋辈乞贷维持，则自创立以来不退一张支票之信用，时刻有丧失可能。今将原放接手后至现在止所负各方之债列表于下：

一、银行方面，计二万三千元。(原放手所加为一万元，余为以前所透。)

二、亲友方面，计一万二千六百元。(乃刚、协如手共四千元，余为原放手。)

以上共计洋三万五千六百元，多数已付利息，未付者甚少。

查现在之资产与负债，幸尚在产多于债时期。……时局稍好，友朋中亦不至有存心负吾馆者，故银钱人存、人欠两抵，亦有多无少。

在此情形之下，如有机会得一关心文化事业之银行家以稍低利率放款三万至五万元以维护与帮助之，则原放可以对出版与营业努力从事，随时就教于学者与专家。但吾国银行界愿以一个无不动产之书店全部或局部资产作抵押者，恐未必有，故此念恐终成虚愿。

此次适之先生南来，对馆事异常关切，十一号之夜为作一函介绍去看王云五先生，请他用他的“大才与大力”为亚东“计划考虑一次”。王先生允于十五号夜间八时去会。他是现代出版专家。承他费二小时之光阴细看帐目(盘货簿等)，并加以指导如下：

1. 现状并不怎么坏。
 2. 加入三万元,以两万元出书,以一万元作流动资金。
 3. 或用改公司办法,或用借款办法。
 4. 五马路市口不好,最好是迁上四马路。
 5. 可省的应省,生意能再做上八万元便好了。
 6. 已借得之款亦可商作股本。
 7. 责任终须自己负,因为有多年的历史了。
- 借款较难,改公司较易,创办人又在故乡,大概非他到不能有妥善的办法了。

原放

廿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章先生曾把我的“说帖”寄到浙江兴业银行与徐新六先生一看,回信是暂不放款。

1934年阳历年关和阴历年关,是难过的两个“关”,总算都安然渡过了。

最急的急事无如银行借款、透支,已经快要到期的,纵然还不出,也要转期才行。而且,假如原先是行严先生替我保的,不能再由他转,一定要由别人转;如是适之兄替我保的,也一样,一定要找别人转。事先布置很重要,我一面告诉行严先生,一面写信托适之兄;那时程士范兄做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也和他谈了一谈。真可以说是门路走尽。

最怪的是适之兄并无回信。忽一天,接他一电,说几日早车到沪。时已近阳历除夕。

到日子,我和大哥等去火车站接他,同到新亚旅馆。安顿后,他到温州路我家里时,我们已经把应该转期的八千多元的

表列好。他说：“一会，我到各家去一去，接洽好，再请他们打电话给你去办。我明天再来。”

午后，有电话：

“你是汪某人吗？今天适之先生来过，你来转期罢，办一办手续罢。”

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还有别家，同样来了电话。这一来，大概半年无问题了。

前几天，行严先生和我说过：“适之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要和他谈谈。”于是我给他们约好时间，在我家聚谈。他们谈了不少时间，先谈了许多别的事，后来再谈到亚东。他们决定先联合打电报，接着各人写信，要我的大叔速来。他们的信的留底寄给仲翁看过，仲翁也曾加信催我的大叔早来沪。

阳历年关已经可以过去。适之兄又动身走了。除夕（阳历）夜饭后，忽然浙江兴业银行的老师傅拿了送银簿送了伍佰元来，说是徐新六先生照胡适之先生的话，在行里打烊后叫送了来的。于是我盖章收下了。

阳历年一过，不几天又是阴历腊月了。我的大叔还没有出来的信到，所以我不能不赶紧作过旧历年关的布置。大处倒不妨，银行借款已转期到六月。但是生意毫无，开支大有问题。有的同人在店里稍松时，拿了一点钱，照例上徽州过年去了，倒叫我松了一口气。

行严先生那里，我还是天天要去。他的事务所先在小沙渡路，后迁大西路美丽园。我去得多了，章先生的侄儿们、外甥们以及工作的人、老佣人，都很熟了。会客登记，也已经免掉了。

除夕夜，我还有一点事要看行严先生，我上了二楼，章先

生立刻下来了，问问事情已经布置好了没有。临走，他忽然给我一个红纸包，我笑笑，谢谢，心里想：“老古派！”

店事已经安排好了，只管回家吃封岁酒了。我在母亲面前说：“不错，还有一个红纸包。”母亲问：“哪里来的？”我说：“章老伯给的。”我边说边打开一看，是一张壹仟元的即期支票！大家高兴极了。

母亲道：“古语‘有货不愁贫，没货愁煞人。’这笔钱，你还是拿去印书罢。”

总算是营业很差中的“如意过年”。

“群益”的保发生问题

1935年，群益书社已经到了后辈手里，不能维持，只有收歇了。可是在陈子寿主持时，我的大叔曾替群益做过房租的保人，要赔款五千元左右。

群益书社的后辈是陈汉声兄。在章士钊律师事务所，我会见了，谈过房租担保的问题。我知道房东不久便会寻到亚东门上来的，非常着急。

有一天，我走过棋盘街、泗泾路口，看见群益的大门旁有一只高高的凳子，有法院里的人坐在上面拍卖群益的书籍与生财等等，我更着慌了。

于是，急电促我的大叔返沪。可是没有回音。群益的保事，一日紧似一日了。我决到绩溪老家一去，看看究竟。2月28日，我由杭徽公路到绩溪。我的大叔的条件是：“你们要回家，我才出去。”就是要我和我母亲和我的三个孩子回绩溪，他才返回上海店里。我认为没有问题，答应了他。于是，我大叔于

1935年4月下旬回到了上海。

给群益做保的事，后来还是由章士钊出来了此案。亚东损失很大，由群益拿《新青年》给亚东重印一版便算了。

重印《新青年》，计十六开本八大本。有现成纸型，只要纸张、印刷、装订费了。内封有“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行”字样，因为群益已经歇业了；当日的“求益”，陈汉声兄还是有关系的。

《新青年》这次重印，有蔡元培、胡适的题词。蔡元培题云：“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日期是1935年8月20日。胡适的题词是：“《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两个题词都是制成锌版印在卷首的。

在群益收歇前一年，我的大叔搭股开的京货店正和号也忽然倒掉了，当然又只得贴钱进去。我的大叔欢喜东搭股、西搭股，说是帮助肯做事的人，后来常吃亏，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他不单单努力做书店。

那时候，经济往来总要有担保。1935年我代表亚东给舜兴渔业公司担保与德士古煤油公司往来账款四千元。不但保单条件苛刻，还规定“该保人设或病故，则一切保人责任即应归其承继人”，保人是要子子孙孙负责的。记得保单签字那一天，有一个洋人和一个中国人坐着小汽车来亚东对保。洋人四面看看，和我开谈了，他只管说外国话：“你担保吗？”“是的，我担保他们。”我也只管说外国话了。

“你知道吗，你们的店，依我们看来，不值四千元哩。”

“不止四千元。”

“除掉这里，还有别的地方没有？”

“还有栈房。”

“还有不少书吗？”

“比这里多得多。”

“恐怕也不到四千元哩。”

我有几分生气了，问：“你看能保不能保？”

他反问：“你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们还有版权。”

“版权，有多少？”

“不多，有一百多部书的版权。”

“你们可以印？”

“当然。”

他和那个中国人又谈了一会，要我签名，再握握手，客客气气的下楼去，上了汽车，自己开走了。

同事问我谈了些什么。我说了一遍给大家听。我又说：“真厉害！真厉害！问得真仔细。他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帝国主义者！”

舜兴的保是章先生要我保的。我知道他是一肩可以挑得起大担子的，非比我们。

这都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于今写来，只不过说说过去办事，又要费时间，又要惹气，又要想方设法，又要东跑西跑的艰难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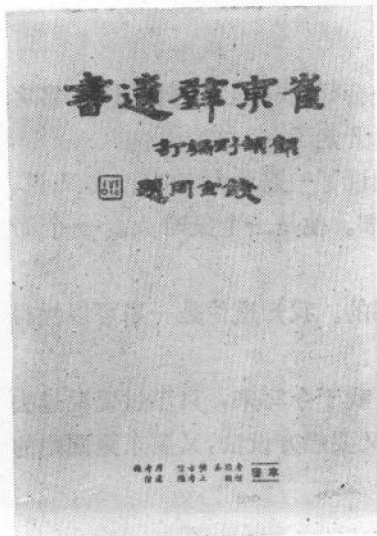
大叔回店后

就在我回绩溪催请大叔返沪的期间，1935年3月12日，我母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

料理好母亲的后事，大叔已经回到上海店里，我就带着三个孩子回绩溪老家了。那一年，我儿子无级九岁，无功七岁，女儿恒之四岁。无级、无功原在上海西区小学读书，是陶知行主张送进去由幼儿园读起的，这时只好退学。

我的大叔孟邹先生回店，一面了急债，一面紧缩，回掉了一些房子，后来又有许多同事先后自动的走了，到别处去做事。他只和几个老同事，卖货，收钱，可是有些债一直不曾还清，至于他借出去的钱又都收不回来。他又出了一些书，销场却很不好。

当时我在家乡陆陆续续的看到报上登的小广告，一批批列出我们出版的各类的书。也有新出的书。这里只一提《崔东壁遗书》，已经开始卖预约，半价，1936年5月底出书。说明里有如下的话：“由顾颉刚校勘标点，使读者开卷了然。虽历时至十余年之久，始竟全工，而材料之博，编校之精，定有以慰读



《崔东壁遗书》书影

者之渴望也。”三十二开本，全书二千中页。

这部大书，实在不能不出版了，排校的时间已十多年了^①。当时我想起，有本什么书里说过一句：“出书比造铁路还难”。大意是说：造铁路，造了几十里就可以卖票开车；紧接着造下去，造了多少里便又开车、卖票。可是出书，一部大书也要等齐全才好出版，下的本钱太多。

1936年初又看到亚东图书馆发行所由五马路迁到四马路晷锦里口的广告。我想：王云五先生的意见，看来我大叔很以为然了，心里很高兴。

同时，编辑所也迁到了西藏中路475弄6号。编辑所是“五四”时期在牯岭路租房子开的头，后来迁长沙路正贤坊正式建立，又迁到新闸路鸿祥里、温州路，再迁西藏路。这时，亚东只有四马路一个底的门市部和西藏路的一个两楼两底，其他的房屋都回光了。就连房子也今非昔比了。

① 《崔东壁遗书》，系清代古史家崔述的著作，由顾颉刚编订，全书分“前编”、“本书”、“后编”三部分，共十六册。卷首有蔡元培题词和胡适、钱穆、顾颉刚的序。顾颉刚在序中讲到编订校点的过程说：“当民国十年，适之、玄同两先生和我计划《辨伪丛刊》时，我们都以为这部书亟应表章，就由我自告奋勇，担任标点。十一年，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先生和我会面，约定由馆中出版。自十一年起，到十四年，我在业务余闲，把这项工作做完。到十五年，馆中已排印完成了，照例作一篇序文即可出版。不幸我的好求完备的癖性总觉得应当把有关本书的材料辑出，列为附录，作‘论世知人’之一助；这样一来，范围就放宽了，出版之期就延长了。”加以大学经费积欠，不得不为衣食而奔走，生活不能上轨道，读书且难，何论作文，以至时隔九年，才得出版。可以自慰的是收集的材料逐渐增多了。原先只见到道光本《遗书》，后陆续发见嘉庆本《书抄》和《书抄》的改订本，又发见东壁先生的《知非集》、《菽田臆笔》，以及他的夫人和弟妹的诗文集等，“使我们对于东壁先生的学问进展得到更清楚的认识”，“他们的家庭状况也更明瞭了。”

因为我大叔管钱很紧，我不得过，在上海、绩溪，绩溪、上海间跑来跑去，又没工作可做（大叔也不要我做事），很不定心。1936年，我又到章律师那里去，要把我的标点本与翻译本，连存书与纸型，一概划归我名下，一来可以供给子女求学，二来也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但是我大叔要根据法律手续，作为退股，并且要脱离叔侄关系。章律师认为叔侄有血统关系，不可做。可是我一概答应。1936年6月11日立了一个我与亚东图书馆脱离股份及一切权利义务的字据。当事人是我和我大叔，证明律师是章士钊和彭渊恂，彭是章先生的帮办律师。从此，我就不是亚东图书馆的什么股东了，差不多等于出店的人了。

到了后来，由我的舅父说说，所有我标点和编译的书卖完以后，仍由店中印行，打一点版税给我。可是以后，不但版税没有，连书上卖出的钱，我也拿不到手。虽然为了打版税，1937年1月又托彭渊恂律师做过一个手续，却毫无用处，只是一纸空文罢了。

此后，我在西藏中路新屋里的楼上长厢房后半安排了一间，只顾埋头翻译一些小说，标点一点书，编一点书，以后有机会再来出版。对于大叔怎么做店，怎么出书，我概不过问。

又一次北平之行

下面又要记一些 1936、37 年间，同陈仲翁、适之兄之间的一些交往。

1936 年间，茅盾先生写给我一封短信，要我请仲翁写一篇《五月二十一日》，并附有几张《〈中国的一日〉征文简章》。我 5 月 6 日到南京，11 日回来。在南京曾到监里去看过仲翁几

次。《五月二十一日》仲翁写成寄给了我，我按照茅盾的嘱咐，于5月28日把仲翁的文稿寄给生活书店徐伯昕先生，转交给茅盾先生。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中国的一日》一书。

1937年我又一次去北平，是6月29日夜动身北上的。动身前，我的大叔要我过南京，下车去看看仲翁再走。我到监里看到了仲翁，在里面一同吃了饭，谈了足足一整天再辞出。

我对仲翁说：“报上说向你求字的很多，你写了不少给人。我想请你在有空的时候，给我写一张小屏，裱起来挂挂。”他没有响。后来他给了我两张，是托人带到店里的，都没有上款，却写了真名字，还盖上了图章。

第一张小屏写的是《古诗十九首》里面的“冉冉孤生竹”那一首。

第二张小屏写的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下面写的是“独秀书于金陵”。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文章，就不知道了。

从南京北上，我坐的是直达北平的一个二等睡车。一个车厢房间四个人，旅行社在车厢外面的牌子上写了旅客的名字。

“汪先生是不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了许多很好的小说的？”

“是的。先生到哪里去？”

“郑州。我们到徐州转车。先生现在到哪里去？”

“我到北平。”

“有什么贵干？”

“去看朋友。”

“要看胡适之先生吗？”

“要看的。”

“唉！唉！胡先生的学问真令人佩服，可是，近几年来，他的思想实在太旧。青年人对于他，实在很不满意。”

“是的，是的。先生府上哪里？”

“辽宁。……关外沦陷以后，我们都到上海做事了。流浪的人呵！……”

“你将来如果到北平，我希望你去看看胡先生。……先生可以对他发表你们大家的意见。”

“好的，好的。我们是亡省的人呵，对于他，更不满意呵。”

“我看到他，一定把诸位的话告诉他。一定，一定。”……

这是“七七”之前不多天，我和车上同房间三个朋友中的一位的谈话。

过去，章行严先生同适之谈谈的时候，也说过：“适之，一般青年对你很不满哩。你的言论，大家都不以为然。”

我7月1日到了北平，住于前门外正阳旅馆。当天下午看到行严夫人弱男女士。她说行严先生明天在旅社（大概是北京饭店），约我再去。次日也不曾看见行严先生，弱男女士说：“日本人是一定要进城的！”

7月2日下午才看到适之兄，他说他要把我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我很欢喜。他问起我：“你来的时候，看过仲翁吗？”我说：“看过的。”他又问起：“你看到吴弱男，她说了些什么？”我又把日本人一定要进城说了。适之兄说：“我看不很要紧。至多是 small clash（小冲突）。”

7月4日，我移居罗尔纲兄家中，到适之兄家很近，到独立评论社章希吕、胡铁岩二兄处也很方便。希吕、铁岩二兄

1933年为《胡适文存》三、四集和《藏晖室劄记》事北上，后希吕兄就留在北平做了独立评论社的事，铁岩兄也于1937年初去北平同希吕兄一道工作了。当初同我一起搞亚东编辑所的一个希吕，一个昌之。昌之后来先做金城银行的事，后做淮南铁路的事了。

7月6日夜，我们几人打小牌到天亮。是天亮时，忽然有飞机声音，抬头一看，是漆了太阳旗的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机上的人都看得清楚，凶神恶煞似的。“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了！

一会，门口喊口号的声音很响，开门一看，是小学生示威游行，声声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夜到米粮库，才知道适之兄一大早到清华大学演讲去过。他说昨夜写成给王云五先生一信，交给了我。

7月9日夜，适之兄往天津转上海。他和我说：“原放，我有几个外国朋友一道走，你也一道去，到天津换车罢。”我斟酌了一下，说：“适之哥，你先走罢，我决买通车票。”后来看报，才知道他到了天津，便坐“飞剪号”到美国去了。

好容易到7月21日我才上车南归，7月23日上午7时40分才回到了上海。到时才知道这是最后的一部通车了。

我离北平时，记得尔纲兄正在卖掉大部的木版书，预备全家回广西；希吕、铁岩二兄正在忙着替适之兄把许多书籍装箱运出北平城。

回到上海的当天下午，我就到商务看到云五先生，把适之兄的信交给他。

适之兄的信如下：

云五先生：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援助一个人。

你认得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他是很能做工的人，曾标点十部大小说，曾译四、五部书。他做工能日夜不辍，颇能吃苦，有先生之风。他不是能独当一面的人，他嫌亚东办理不善，曾自己经营两年，闹的焦头烂额，才还给汪孟邹先生。此中历史，是我曾略为先生说过的。

现在他想寻一件事为生，事体不拘大小，工作不嫌烦重，薪俸也不计较，他只希望在先生的指导管理之中做一点有规则的工作。

他对于标点校对是很内行的。他虽不能自信标点古文旧书的能力，但他对于校看别人的标点，整理行款，或标点白话与清浅古文的书，他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我本不应该拿此事来麻烦你，只因为你见过他，所以我先介绍他来看你。如果他能得先生的援手，我真要说“感同身受”了。敬问

大安。

适敬上

廿六、七、七

在商务见到王云五先生。他须发皆白，穿一身广东式的中装，绸的。他看了信，笑着道：“好的，汪先生的事，我和适之都应该帮忙。不过战争恐怕免不了，我正在打算紧缩裁人，但是对于汪先生，必定要拿最早的机会给你。眼前不能不等一等，这一点要请原谅。”

“是的，局面是不很好的。”

“汪先生住在哪里？”

“我在亚东编辑所可以耽搁。”

“请把地址写给我罢。”我就在适之兄信封上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

“汪先生的事，要等一等。我议一议以后，再通知汪先生。”

我说“再见”，他送我到办事间的门边而别。

记得王先生还说过一句：“我看见你的叔叔的时候，一定劝他替你卖标点本。我相信汪先生是一定可以立足的。”商务的事，必定无望了。

“八一三”以后

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战火燃到了上海。

那时候看看情形，四马路上的发行所也只有收歇了，并到西藏中路编辑所来。从此亚东只有西藏中路一处，再没有别处了。每月省去房租一百多元。有些老同行还是会到西藏中路来添货的。

把四马路的门市部停歇掉，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门市部很小，不能住多少人；同人大多住西藏中路，白天下店，晚上回来。有一天午后，几个同人一阵下店，照例由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到石路（今福建中路）转弯到店。岂知刚到石路口，碰上日寇的飞机在日升楼（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丢炸弹，又扫机枪！同人都面无人色，连魂都吓掉了！我们在编辑所的人连忙打电话问，才知道他们侥幸都已到店。我的大叔道：“真险啊！性命交关！真正是如天之福。要是出了一个性命，我真不好交代呵！”不多一会，同人都回到了西藏路，纷纷理理东

西，往杭州、徽州逃难。大叔说：“沪杭路上也炸得厉害，还是迟一步动身的妥当。”可是大家只管冒险走了，侥幸都平安到达徽州老家。西藏路只剩下四五个人，门市部也无法再开下去了。

“八一三”后，商务总管理处迁长沙，上海、香港各设办事处，中华书局也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亚东自然也不能不努力挣扎，1939年只有派同事先到金华，再到广州、昆明去设办事处。和我们有联系的有亚光舆地学社、东方书店。

到金华、广州、昆明（记得也到了重庆的）设办事处，虽然是跟在别人家后面，可是新打开一个局面、一条出路，实在不很容易。首先到金华去的是华一鸣兄，再是许柏年兄，再是滕维钧兄。广州是后来由陈啸青兄去的。华、许、滕三位是我的大叔的老友黄长源先生的老同事。黄先生有病回老家时，把他们三位一一介绍给了我大叔。

一鸣兄很年轻，身体很好，很能干，很会办事，看看他那么年富力强、生气勃勃的样子，谁都知道是“天下去得”的。他来了不多时，我的大叔就要他和有联系的几家一道出发去金华了。起初带去的书籍不很多，不久便把卖下的钱汇来了，又催发货。金华的生意不差，于是决定前进到昆明（金华已有不稳的消息）。好象是一鸣兄到了昆明，许、滕二兄才先后去金华的。昆明的生意更不差，于是常有汇款到来，又时常有挂号信和添单，又时有电报来往了。

关于金华、昆明等办事处，《我的割记》中还有些材料，摘录于下：

廿九（1940）．三．十二：

店自设金华、昆明两个办事处以来，营业日有起

色，已能立足了。

新书目已付印，标点本旧小说大概不至于没有相当的销路。

廿九(1940)。三。十四：

昆明办事处的货卖完了，因滇越路被炸，车不通。本月二日，一鸣兄来信，只急无货应市。如由邮局走香港寄不通，今年的营业会大受影响了。大家只望在路上的货早日到昆，这里的货又可以运得出去。

金华、昆明两个办事处成立以后，亚东已有起死回生之望。我不曾佩服过大叔，这两个办事处的设立，是有识的成果。和同行往来，从众行事，大有好处。

廿九(1940)。三。二十：

自金华、昆明两办事处成立以来，营业上已经大有进展。今已准备在香港再设办事处了。

廿九(1940)。三。廿四：

金华、昆明两处，只发已经由亚东重印、只打版税的标点本，而不替我寄一点存书去卖。

有许多书还是二十二、二十三年(1933、1934)印的，不曾卖完；如大销，卖完，真可说是“绝处逢生”了。

廿九(1940)。四。十一：

今天早上，滕维钧兄上船赴港设立香港第三办事处。书已先去，房子已经先租一个月了。(四十元港币，合国币一百五十四元，东方、北新、我们三家分派，各出五十一元一月。)

廿九(1940)。四。廿九：

四月九日，一鸣兄又来信催发标点本，但大叔仍旧

不发，只发亚东重印、只算版税给我的那几种。他时刻都在对付我哩！

廿九(1940)。十。一：

前天，敌机廿七架去炸昆明。办事处如不能立足，……钱，又要成问题了。桂林、衡阳恐怕赶不上昆明，但可代替昆明。

廿九(1940)。十。十七：

昆明、金华都遭轰炸，桂林、曲江两办事处不得不试办了。

三十(1941)。二。十二：

和老宓(太平洋老友)谈谈，他说：“一折八扣本已经没有人可以印了。纸张贵了，他们无法再做了。”我说：“我们的本子也不见得可以抬头的。”

三十(1941)。三。九：

一鸣兄到去年才有上规则的分红，每百元有三元。他今年得分红六百元，实在不能算多。

这里说的大概是指做了两万元生意，得分红六百元，不是指薪资，薪资决没有那么多的。

1941年，到仰光的海路已经不通，不能去货了。

提起“亚东本”同“一折八扣本”之间的竞争，1938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一本《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有一节讲到：“谨慎独步的亚东图书馆，仍在胡适之先生协助之下，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造成铅粒的‘亚东版’。对这‘亚东版’的谨慎工作，我们不能抹杀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为一部小说的校点费一年、半年的时间，和十次、八次的校对，是常有的事，这是‘亚东版’之所以可贵，但也是被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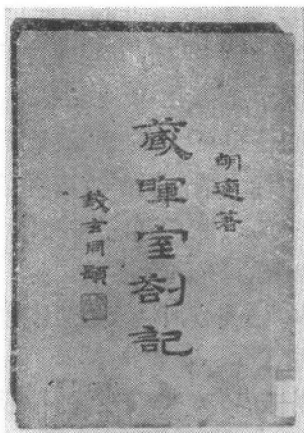
书商粗制滥造所打败的致命伤。”

后来张先生在汉口的时候，好象在《读书与出版》上面（记不得是哪一期了）还写过一篇长文，其中又极力说“亚东本”的好处。这真是知己了。不过我当时想：也可以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哩！对于“亚东本”“被标点书商粗制滥造所打败”，他是愤愤不平的。我在绩溪老家的时候，亚东曾举行“标点旧小说，暑期大廉价”，登在《申报》上的广告，标题是：“劣本虽廉，不堪卒读；稍增代价，便得佳本。”这十六个字，是还不错的。

1939年的4月20日，我有一则日记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亚东的标点本的销场已经落到百分之一了！最多的时候，每年能销码洋三万元左右，而今每年只能销出三百元了！可是这个本子还是有它的功用的，只可以说是暂时的失败。云五先生说‘必能立足’，静庐先生说有‘致命伤’，这种同情，可感！”

前面讲到过，1936年以后我差不多是出店的人了，不过问店事。大叔也不许我过问店事，也不要我的稿子。不过我译的一本《事业与成功》却是他拿到生活书店去卖稿的，得了近三百元，很得力。至于亚东的书稿，只能就所知道的略述一二。

1937年，我大叔把《缀白裘》的纸型卖给中华书局了，得洋一千七百多元。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缀白裘》是适之兄和我们商定整理的。说这本书的销路不会好，不如卖去纸型，实在是不懂得这部书的价值。协如妹和程健行兄等为这部书花掉的时间与精力实在不少，所得的标点与校对费是：标点，每页二角五分；校对，每页一角五分。中华书局要求有一



《藏晖室劄记》书影

篇胡适之先生的短序，当然做到了，于是《缀白裘》由别家去出版了！

1939年4月亚东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劄记》。这部书费了七足年的时间，希吕与鉴初二兄花的精力最多。《中流》一卷二期（1939年五一节出版）有一篇书评，说《藏晖室劄记》“详细记录着胡适之形成为中国布尔乔亚思想代表过程”，“无论是胡适之的赞成者或反对者，都有一读的必要”。卷首刊有胡适写于1936年7月20日的《自序》云：“这十七卷劄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记和杂记。”“整理这一大批劄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劄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的）”。“最后，我用十分谢意把这部劄记献给我的死友许怡荪。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晖室劄记’在《新青年》上陆续登载。这部劄记本来是为他记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仲甫从出狱到病逝

“八一三”以后不几天，天气很热，我正在楼下书架当中的空处睡一睡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进来问我在家不在家。我出去到厢房里一看，是彭述之！

他一见面便说：“我是打南京走路来的。仲甫也走了，到

汉口去了。”

他的脸上一脸的灰尘，衣服也很脏了，有不少烂泥，白小褂裤已经变成灰黑的了！我立刻给他洗脸、揩浴、吃茶、吃一点东西。

一面洗脸，他一面就问碧兰的地址，鉴初兄便抄了一个给他。碧兰在亚东出有小书，故有地址。

他休息了一会，急急的要去家里，说有地址，会找得到的。

后来不多时，仲翁有信给我的大叔，是从四川江津寄来的。

1939年7月间，仲翁有信给大叔，有东下的意思，他想去重开芜湖科学图书社。

科学图书社于1938年芜湖沦陷时完全毁于日寇。三十多年的老店，就这样结束了！第一个说是要去重新开办的是我大叔，第二个就是仲翁。他们为什么对于芜湖科学图书社那样恋恋不舍呢？我想他们都想起从前在那里办《安徽俗话报》的往事了吧？

1922年科学图书社印过一本精装的《廿周纪念册》，其实和一般的“袖珍手册”差不多，不过卷首的几篇文字值得录来一看：

一、芜湖科学图书社的话

我们自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设于芜湖，到现在(1922)已经二十年了。有的说我们是安徽的第一家新书店；有的说我们的书籍、杂志和仪器、文具也是安徽最完备的第一家；更有的说是安徽风气之开通、文化之进步，我们都有关系。

这样的盛誉，我们万不敢当；但我们因此不敢不更加

努力，——顺时代的思潮，搜集最新的书籍、杂志；应各界的需要，采办最精良的仪器、文具。——以答诸君的盛意。

二、陈独秀的话

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然当时为热烈的革新感情所趋使，居然胡胡涂涂，做到现在的状况。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当日社中朝夕晤谈的好友，章谷士、曹复生，可怜如今都没有了！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书此以志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年纪念。

三、高语罕的话(略)

四、胡适的话

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五、陶知行的话

赈济了二十年学术的饥荒。

这本《廿周年纪念册》，是我在牯岭路时期，到印刷所、装订作接洽排制成功的，所以我比任何同人都感到特别的亲切、珍视。在科学图书社被毁于日寇之后，看见这本纪念册，真有限的感慨与伤心！

仲翁在江津有一首诗：“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是送给一个欢喜吃酒的朋友的。

他想东下，重开科学图书社，大概想起“文章瘾”来了。

亚东生意不好的时候，他对我说过：“加文具部，很要紧。文具生意的利息也不错，和书籍同做，财政可以活泼得多。”

他也许想起卖卖铅笔、墨水、信封、信纸来，很有味，又可以解决生计问题，糊口了吧？^①

他终于没有东下，1942年5月，传来了陈独秀病死于江津的消息。他的生卒年是1879—1942。

故 乡 四 载

1943年，我在沦陷了的上海；我的子女在徽州老家，那里不曾沦陷，按当时的说法，是“自由中国区”。儿女长大，无级已经要考大学了，为照应他们升学，我不得不上徽州了。

先我返乡的大哥，和我的两个儿子无级、无功也来信催我回去。我大叔说：“你看，无级的信写得好多好，梦里梦见你进了弄堂了！这里四个人，我和鉴初、啸青，都可以死得了，你还年轻，还死不得，只好让你回去。”

我和一个同乡是由南京、芜湖回绩溪的。经过关卡，两句日本话倒还得力，不曾遇到危险。我们一脚踏进“自由中国区”，立刻便把日本侵略者的上海的“市民证”毁了。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有汪孟邹 1938 年 10 月 21 日致胡适函云：“仲甫于七月二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讯，现住离渝百二十里之江津县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时胡适任驻美大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

1943年4月14日到家。我同无级谈：“上海去不得，没有从自由中国到沦陷区去求学的道理。重庆一时也去不了。不如到屯溪新塘先进‘大学先修班’的好。”无级和他的两个同学都赞成，于是一起进了先修班，到1944年3月辗转去重庆，考进了医学院。无功则在屯溪万安徽州中学读书。

在老家，有时还译一点书。我去时，带了几种英文小说和别的书；过关卡时，日本鬼子查查，倒不曾拿去。有一本美国经济学教授司各脱·尼尔宁的《中国革命》，从1840年写到1927年大革命为止。在上海时，我已经开始译了；回里后，决心早日译完它。在里，有时会收到《群众》等杂志，有的甚至一期不断。不过始终不知是谁寄给我的。问问上海店里，却不曾替我订过。

一次整理家里书橱里的书，想不到在木版书中，忽然看见有几本不全的《安徽俗话报》。我高兴极了，连忙把它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听大叔说过，《安徽俗话报》上陈仲翁用“三爱”、“由己”的笔名发表文章。这是他二十六、二十七岁时写的文章。算来当时我只有八、九岁，正在蒙童馆里读书，有许多实在是看不懂的，于今可以细读，再好没有了！

我们店里已经重印了《新青年》，很好。我把《安徽俗话报》细读一过之后想到，如果把《安徽俗话报》二十三期访求得完全，实在也是应该重印的。抗战胜利后，我回上海，至少要出一部《〈安徽俗话报〉辑存》。我这个主意自信很要得。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是在家乡获悉的。1945年12月间，我妹妹协如去上海一次。她来信说，大叔告诉她，上海各书店要组织一个公司，顾颉刚先生充总编辑，一共四、五家，亚东也并入，这样前途尚有希望，否则死路一条。不过，这个

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

第二年5月,无级由重庆到了上海,无功转学进南京的青年中学,我也准备带恒之到上海治病、升学了。1947年4月29日,我回到了上海。这次在故乡一住就是四年。

回 到 上 海

4月底回到上海,5月6日见到《大公报》文艺栏里有云:《尝试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等,大概是“五四”时代名作中顶有名的,但是买不到,也借不到,大概“藏之名山”了!……

我想,亚东还应该再登广告。不过存书实在太少了。书架上的书,依我看来,卖得掉的少,卖不掉的倒多。翻版、盗印当然是致命伤。大叔裹足不前,也难怪。

5月14日夜,大叔同我谈起《节本新青年》,是仲翁在牢里编的,要我看看。

当时我也问问“文存”和“标点本”的情形,我说:“存书太少了。至少每一种应该有一千部。”我算算,要报纸三千令,照二十万元一令算,要六亿元,其他的成本还不算。如果借得到低利的款子,还可重印;否则无法再印了。

大叔后来又和我谈到亚东同别的书店合并改公司的事,说是最好是在他生前成功。我说不易。我道:“如果亚东把资产估高了,人家不答应;如果估低了,自家又不肯。”

日常我照旧读书、点书、译书。一本《鲁滨逊飘流记》,我离上海时已译成四分之三,回上海后立即续译。刚译完时,我大叔托朋友拿去在建文书店出版了,倒也得了几十石米的钱,

对于我苦学的儿女不无帮助。

1947年8月10日《大公报》的《出版界》(第四十四期)有萧聪的《汪孟舟——出版界人物印象之一》一文。他把“邹”作“舟”了。文如下:

在二十五年前,当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艳情小说和黑幕大观的时候,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严肃地出版着性质纯正的书籍的,除了故赵南公先生所经营的泰东图书局之外,还有一家亚东图书馆,它的主持人就是汪孟舟先生。

汪先生以出版家的姿态在上海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左右的人,他的早年的身世不详,笔者只知道他是皖南绩溪人。皖南一向是产生学人的地方,自宋代以来,理学家、考据家、古文家等,人才辈出。汪先生的从事出版事业,自然也不能说是出诸偶然的了。

亚东图书馆的创设大约在“五四”以前,初期出版的书,有陈仲甫(独秀)的《古书辨伪》、《虚助字典》等等,软性的读物似乎只出过诗僧苏曼殊的几种文言新体小说(《绛纱记》、《非梦记(?)》、《焚剑记》等)。“五四”以后,它首先运销北大新潮社的各种出版物(?),开始出版胡适之的《尝试集》、高语罕的《白话书信》、《人生观论战》(?)、《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等,这些书在当时的青年思想上有过相当大的影响。此后,由汪先生哲嗣(?)原放标点、胡适作长序的《红楼梦》、《水浒》、《三国志》(?)、《西游记》等书陆续出来,开了标点书的先河。

在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前夜,亚东首先出版了革命文学倡导者蒋光赤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和《鸭绿

江上》。同时，在租界当局和军阀政府双重压迫之下，敢于经售革命政党的机关刊物（如国民党的《政治周报》，共产党的《向导》和《中国青年》等）的，除了国民党的民智书局和共产党的上海书店之外，恐怕也只有泰东和亚东两家。笔者还记得，为了某一期的《向导》，亚东还一度被英租界捕房提出控诉，而由会审公厅判处过二百五十元（在当时是一笔相当的数目）的罚金。——这些地方都显示着汪先生的胆识。

北伐成功以后，新书店纷纷（纷）茁起，竞争渐烈，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狂潮中，亚东稍稍落后了一点。

此后文网渐密，整个中国出版界开始遭到厄运，汪先生似乎采取守势，亚东不甚出版新书了。但胡适的《藏晖室劄记》倒是这个时期出来的。

抗战开始时，亚东困守沪上，没有撤退到内地去（？），因此分享不到廿七、八年（1938、1939）武汉时期的战时景气，反而因受着敌伪的打击，支持不住五马路上的店面（？），不得不搬到西藏路上的一条小巷子里去，在胜利了两年后的今天，依然谈不到恢复。

汪先生治事谨严，丝毫不苟。据接近他的人说，连一张广告稿子，他也必定规划妥善，算准字数，并且请人誉正，然后付排。在他这种精神熏陶之下，亚东的同仁也保有了这种优良作风，无怪乎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也特别优美了。

从年龄上说来，汪先生今年该七十多岁了，但前些时在四马路上碰到他，他的精神还很矍铄，态度也很乐观，说起话来，声音依然响亮得很。但愿天假以年，度过艰苦

的时期,等更好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读到一些亚东版的好书。

三六. 八. 灯下

同年8月24日的《大公报》的《出版界》第四十六期发表了汪孟邹的《我与新书业——答萧聪先生》如下:

八月十日,《大公报》附刊《出版界》发表了萧聪先生一篇文章,蒙他把我当做出版界人物来评论,文中有许多地方又蒙他过奖,实不敢当。萧聪大概是笔名,作者似是亚东图书馆来往的朋友,因为他很知道我们书店的历史。不过文中有几个地方不尽符合事实,我今天想来辨正一下,顺便补充一点材料。

先说我为什么从事新书业的。我少年时候,科举还未废除,我也跟着当时的知识青年学做八股文。那时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刚过去,中国战败了,大家都认为非改革内政,国家就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几位先生发起了维新运动,各地方志士都赞助他们,我的业师同邑胡子承先生就是最热心的一个,他教我们八股之外,还教我们历史和地理,而且劝我们节衣缩食,购阅当时出版的新书和新报。这就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也就是我对于新书业发生兴趣的原因。

民国前四、五年(?),有一种新的运动,即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代替维新运动兴起来了,青年人志气更加蓬勃了,那时我已经在芜湖开了一个书店,名叫“科学图书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办的,直至此次抗战,日寇占领芜湖才闭歇),代售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又发行了一个白话文的半月刊,名《安徽俗话报》,老友陈仲甫(独秀)先生

编辑。到了民国二年(1913),我就从芜湖来上海,另创一个书店,即是现在的“亚东图书馆”。民国成立以前,上海书业还是那些石印的,专印科举用的书、古书或小说之类;出新书的只有“作新社”、“广智书局”、“新民丛报支店”、“商务印书馆”等数家。外埠新书店更少。石印书店常常讽刺和嘲笑新书店。到了科举废止,辛亥(1911)光复以后,石印书店遂一蹶不振了。亚东图书馆可见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

我们出版认真,不肯苟且,一半是由于个性使然,一半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我与同业群益主人陈子佩、子寿昆仲,泰东主人赵南公,太平洋主人张秉文诸老友时常要闲谈,都说:“我们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大家都大笑起来。

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愈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象亚东图书馆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记得民国八年(1919)秋天,中山先生要办《建设杂志》,同那些大出版家商量代为印刷和发行,每家都拒绝了,最后,朱执信先生来同我们商量,我们答应了下来。《建设杂志》出至二卷六期,另外还有小册子,如《孙文学说》,也是我们印的,销路都很好,海内外都很风行。那时北洋军阀虽然专横,而国民党这些书报并未被人查禁。当时文网不似现在之严。除《建设杂志》以外,我们还发行了许多与中国文化有重大关系的杂志,如《甲寅》、《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等。至于标点小说,那是原放一手做的。原放是我的侄

儿，不是我的儿子，这一点，萧聪先生弄错了。

萧聪先生还有几点弄错了的。陈独秀先生未曾有《古书辨伪》和《虚助词典》二书。（《虚助词典》是有的，是施括乾先生编的。）他的著作在我们这里出版的，除人所共知的《独秀文存》以外，还有《字义类例》，以及早年出版、久已缺版的《英文教科书》（用CC生笔名）。诗僧曼殊，也是老友，他在我们这里的几种文言小说，本不是单独印行的，后来一起收集在章行严编的《名家小说》之内，那里面还有别的许多人的小说。我们确曾代售《向导》周报，同当时民智和泰东一般，但未曾为代售《向导》而受当时巡捕房控告和罚款。控告和罚款，记有两次：一次为郑佩刚寄售的书；另一次是为了新式标点的《宋人话本八种》，其中有“海陵王荒淫”一篇，据说有风化问题，其实不过是帝国主义巡捕房借端生事罢了。

新书业与中国文化关系很密切，我从事此业四十余年，闻见和感想颇多，如今同业老友凋零殆尽，我也老了，很想写出点来，借（以）给后来研究新书业历史的人做材料。但不知能否如愿。

本文是用文言文写的，请友人某君译成白话如上。

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四日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这几年当中，亚东新出的书只有两种：一是《马克思给顾格尔曼的信》，一是协如标点的《十二楼》。《十二楼》是1949年3月间出版的。这部书，搁置多年了，孙楷第先生写的《十二楼序》，很长，还是1934年写成的。那时亚东的生意很不好，一直无力印行。现在有机会出了，当然非常高兴。1948年决定重印标点本，到1949年春，差不多

也都印齐了。

1949年初，胡适曾到过上海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楼上工作，楼下叫我，说适之兄来了。我连忙下楼，他笑着说：“我来查一个英文字。”我道：“我去拿字典来。”他说：“你在楼上做工吗？我上去罢。”我拿出《韦伯斯脱大字典》给他，他查了一查，说：“呵，知道了。”

适之兄在上海耽搁了好几天。我大叔在大新酒楼请他吃饭。我有时也去看他。谈到的事情，想得起来的，有以下是一些：

《十二楼》的出版，他是极力主张的，说实在是一部很好的短篇小说。

有一回，谈到《醉醒石》、《西游补》、《西厢记》、《娱目醒心篇》都已经排好多年了，没有序，不能出版，搁掉本钱不少。他说：“我来写信给楷第、颀刚，请他们写罢。你可以要孟邹也写信接头。”

一次谈到《胡适文存》等移到商务去了。他说：“亚东资本少，大书难印，不如移到商务；小书还是放在亚东印。”

有一回，他问起《藏晖室劄记》的几本原稿。我说：“店里都收好了。”他道：“我很想带到美国去。”后来又说：“还是放在你们那里罢。”

有一次，我又去了。那一次他那里人真多，真忙，我都不认识，就走进里间了。一会，他到里间来，说：“原放，我决定走了。他们已经把票子都买好了。我到美国，马上来信。我来写一个地址给你，你可以写信。你告诉孟邹，大家都不要来送我了。我明天动身。”于是我们分别了。

这时候，亚东这个店已如“明灭的残灯”！

从解放以后到歇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那几天，无级、无功和他们的同学，有时来西藏路亚东这里，略坐即去，我知道他们很忙，也不多问多谈，耽搁他们的时间。我知道他们有了办事的地方了，我道：“真好！真好！”

1950年，亚东加入了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通联书店。通联书店经过五个月筹备，于1950年4月成立，起初股东书店是商务、北新等六十二家，后来中华、亚东等加入，增加到七十四家。亚东是这年8月加入的。

当时填写的书业公会的情况调查表，列为亚东职工的除大叔汪孟邹外，只有陈啸青、周道谋和烧饭的老韦了。既没有门市，更没有分支店。在“资金周转情况”一栏下填的是：“倘要印书，资金周转困难。”“今年书刊编辑计划”一栏，则是项项空白未填。

解放后，我的子女都先后做了工作，一个个都能自立了，我也安心得多。所以我一面译译小说，一面还下了个决心，要把《诗经》读通。结果，竟写了一大部《诗经今读》。后来一首首都用白话译成了，我又改名《诗经今读并译》。这书实在太太，所以我又编了四册《诗经今译》，把割记抽掉，篇幅小多了。这部书，说来说去，我大叔才答应由亚东出了第一册，1951年8月出版，印一千五百册。事后，他虽恨销场不大，却常说：“顾颉刚先生倒说还不错，往后去，读的人一定会多的。”1951年11月一次会上遇到顾颉刚先生，他当面对我说：“《诗经今译》

很好,最好早日出全。”我觉得很惭愧,拿出来的只不过是校读的一点小小的成绩罢了。

后来我又劝大叔出我译的高尔基的《我的旅伴》。他起初不肯,说:“《诗经今译》已经把两个钱都亏完了,还能再出书吗?”以后答应印一千五百册。那里知道,不到两天,通联书店又要二千册。他再也不信,跑去问,怕弄错了,而后再三斟酌,决定印三千册。那里知道,不两天,又卖完了。于是又印了五千册。接着我又忙着排高尔基的《流浪人契尔卡士》了。排这本书,大叔爽快地答应了。《诗经今译》次年不到年底也卖完了。

1952年12月22日夜間,大家將睡時,有人打門,原来是军管会来检查。

当夜军管会来检查的同志同我谈话,除了问问姓名、经历、做什么工作等之外,还问到1927年去武汉和离开武汉的事。我一一作了回答,关于离开武汉,我说:“我接到陈独秀的命令,要我设法秘密陪他回上海。”同我谈话的同志说:“现在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陈独秀是一个托派。你现在担任编辑,所有托派的书籍,你要负责。”我申辩说:“我不能负责。我虽然是编辑,责任是有限度的。出版书籍,我不能作主。”他问:“谁作主呢?”我回答:“自然是我大叔。他是经理。”

来检查的同志也查问了我的大叔。我走过他们谈话的门口,听得我大叔说的话当中有“王凡西、郑超麟”一句,其他都听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这次检查是为了什么事情了。

在检查期间,军管会的同志们问:

“托派的书,你们究竟一共是印了多少部数呢?”

“书是有几十种。现在存的,已经不多,近来也已经没有

人来买了。”我道。

“这许多书，散在外面，坏影响有多么大！你们怎么竟会印这许多托派的书？”

这是我无辞可答的。1936年以后，我差不多等于出店的人了，店事是不许过问的了。1943年我离开上海回徽州，算来有四年，在那个时期里，店里出过些什么书，我委实一点也不知道。

后来我说：“现在散在外面的，也无法收回了。眼前可以做得到的，只有把所有的存书一概缴出，再把纸型也都缴出来毁掉。”

同志们要我们把托派书籍先开出一个详细的目录来。包括这些人成为托派以前的书籍。所以关于陈独秀的书，从《独秀文存》、《字义类例》一直开到他所著的最后的书。别的托派的，也一样照办。

又一天，一位女同志同我的大叔和我谈话。她先说：“你们这个店，年份实在很久了，过去，‘五四’时代，你们出的书，都是进步的，很有成绩，很有贡献；可是后来，你们走错了路子了！你们要知道，你们出了许多托派的书，这是犯罪的。”

我的大叔唉声叹气地说了一番他是怎样怎样和陈独秀认识的经过，又说了一番后来他和王凡西、郑超麟怎样怎样的发生关系的经过。

后来，这位女同志让我们就亚东从创办以来的主要情况写一个材料。在这份由我大叔口述、我笔录的材料中说：一九三六（民国二十五）年到一九三七（民国二十六）年间，王凡西和郑超麟都在牢里。他们的朋友后来把他们的稿子送了来，商量印行。一来因为本子很小，二来又不要稿费，所以我竟很盲

目的、很麻痹的，替他们印行了。（王凡西笔名有张家驹、李书勋、郭和、许庸、凤冈。郑超麟笔名有林超真、绮纹、林伊文等。）我竟印了《从苏联归来》、《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苏联党狱之真相》等等托派的书，实在是犯了重大的错误！抗日后，王凡西出牢，逃往武汉，又由武汉来上海。郑超麟也出了牢，逃往徽州，一九四〇（民国二十九）年也来上海。因为是熟人，所以要常来走走。……可是他们那一系的书，又没销场，我也无意再印。然而我的大错已经铸成，不可挽回！^①

检查的结果，1953年2月13日宣布军管会的决定：亚东图书馆歇业；反动的书籍一概要没收；存书可以交别家去卖（封面可以不换），卖完以后可以交别家出版；职工由汪孟邹安排，新闻出版处可以帮助你们安插到通联书店去。

亚东图书馆创立于1913年，歇业于1953年，恰恰是四十年。

一九五三·八·四早

汪原放

一九六五·四·四·修改补充一次

原

① 汪原放的《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文说：“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〇年这个期间亚东出版大量托陈取消派的书籍。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三十年代访苏后，写了一本《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政治有所指责。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在南京狱中译成此书，于一九三六年交亚东出版。一九三七年，郑又翻译出版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王凡西用李书勋、张家驹的笔名译了《苏联党狱国际舆论》、《苏联党狱之真相》交亚东出版。亚东还出版了托洛茨基的《真理在前进中》、《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战士·朋友》。一九三七年，还出版了陈独秀和彭述之写的一些小册子。”（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五期，刘建整理）

收 尾

我的大叔曾经口述过亚东图书馆的简史，我写的只可以算是“简史”的一个补充。

我原想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奈事实上有不少困难。

在“五四”时，亚东图书馆只有五马路一个发行所，样样事情都还可以知道；后来牯岭路有了栈房，长沙路又有了编辑所，因此，发行所方面的情形已经有些隔膜了；到了我有了家以后，经常在家中工作，不但是发行所方面的情形，连编辑所方面的情形也有些隔膜了：所以要说得全面，实在是不可能的了。

亚东图书馆是一个独资经营的店，自始至终，是我的大叔一人负责，发行、出版、印刷等等，都是他一人作主，再老的同事，也只是帮工、助手。我现在想来，要是他在生前不曾讲过一番“简史”，我要想来写一个补充，实在是更不容易的。

我的大叔在出版界服务几十年，我现在想来，芜湖科学图书社除专售新书、新报和文具、仪器以外，又还出过《安徽俗话报》，对旧民主革命，不无贡献；后来在上海，“五四”、“五卅”前后，对于《新青年》的出版，也尽过一点力量，至于亚东本身，也曾出过一些前进的书籍和期刊，也不无微劳；不过后来，他年

纪大了，精力已差，思想赶不上时代了，竟出过一批思想很不正确的书籍，落得前功尽弃，实在令人惋惜。

我年来所写的，仔细想想，只不过是亚东图书馆的一鳞半爪罢了，好在亚东的同人有的还很健好，将来有机会，我很想约他们再写一些资料来，让我汇集一处，再作为“补充的补充”罢。

党给我机会写亚东图书馆的回忆，衷心十分感谢！惭愧的是，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在还研究得不深不透，还要学习再学习，现在便想把亚东图书馆写得够得上说是“解剖一只麻雀”，距离实在还是很远的！

汪原放

1965.4.7

附 录

亚东图书馆出版物目录^①

I 杂 志

名 称	编 者	刊 行 年 份、期 数
甲寅杂志	章秋桐主编	1914年,约刊行一年,出1—10期。
新潮	北京大学新潮杂志社	1919年1月—1920年6月。
少年中国	上海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7月以后,约刊行二年。
建设	上海建设社	1919年8月后,约刊行二年, 出1—24期。
新群	上海中国公学编译社	1919年11月—1920年2月, 共出4期。
少年世界	上海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1月—12月,约刊行一年。
同德医学		1920年
自觉月刊		1920年
嚶鸣杂志		年份不详,只出2期。
大众知识	顾颉刚主编	1937年,约刊行一年。

又,1936年重印《新青年》合刊本(1—7卷)。

① 这份目录为作者1961年所编。内容并不完全准确。例如1939年出版胡适的《藏晖室刳记》,就漏列了。较多的是出版年份不准确,如李季译的《马可波罗游记》,按有关材料,出书年份在1931年以后;也有的出版年份或著译者等,同这本回忆录正文前后不一致。杂志所列刊行年份,可能是亚东特约发行的年份,有的实际出版年份还要长一些。尽管如此,这份目录还是可以大体反映亚东图书馆出版工作的面貌,而现在要一一订正困难很多。因此,仍按原稿列为附录。目录内列入二种未出版的、一种寄存的,也一仍其旧。

II 书 籍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中华民国地理新图	胡晋接编、程敷错 绘		
中华民国分类地文挂 图	胡晋接编、程敷错 绘		全份四张
中华民国地理讲义	胡晋接著		以上三种在 日本印
英文教科书(第一册)	陈 仲著		后转给群益 书社出版
昭昧詹言	方东树著		
名家小说	章秋桐编著	以上1913 —1918 年出版	
孙文学说	上海建设社	1919	
短篇小说(第一集)	胡适译	1919	
尝试集(新诗)	胡适著	1920	
三叶集(通信集)	田寿昌、宗白华、郭 沫若著	1920	
水浒	汪原放标点	1920	
儒林外史	汪原放标点	1920	
胡适文存初集	胡适著	1921	
吴虞文录	吴虞著	1921	
中国语法讲义	孙俚工著	1921	
红楼梦	汪原放标点	1921	
西游记	汪原放标点	1921	
法兰西学术史略	李璜译	1921	
白话书信	高语罕编	1921	
先秦名学史(英文本)	胡适著	1922	
独秀文存	陈独秀著	1922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国文作法	高语罕著	1922	论战文集
三国演义	汪原放标点	1922	
新诗年选(1919年)	北社编	1922	
草儿在前集(新诗)	康白情著	1922	
蕙的风(新诗)	汪静之著	1922	
冬夜(新诗)	俞平伯著	1922	
科学与人生观		1923	
屈原	陆侃如编	1923	
红楼梦辨	俞平伯著	1923	
虚助词典	施括乾著	1923	
镜花缘	汪原放标点	1923	
渡河(新诗)	陆志韦著	1923	
流云小诗(新诗)	宗白华著	1923	
实生论大旨	杜里舒演讲, 江绍原译	1923	
胡适文存二集	胡适著	1924	包括新诗与小品
普希金小说集	赵诚之译	1924	
踪迹	朱自清著	1924	
我们的七月	O. M. 同人编	1924	旧体诗
中国(古)文学概论	徐嘉瑞著	1924	
水浒续集	汪原放标点	1924	
河上集	康白情著	1924	
西还(新诗)	俞平伯著	1924	
胡思永的遗诗(新诗)	胡思永著	1924	
实用心理学要义	郑康明著	1924	
孟和文存	陶孟和著	1925	
雪夜(短篇小说)	汪敬熙著	1925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俄罗斯名著（短篇选集）	李秉之译	1925	
我们的六月	O. M. 同人编	1925	
戏剧作法讲义	孙俚工著	1925	
俄宫见闻记	〔瑞士〕伊里雅著， 李秉之译	1925	
字义类例	陈独秀著	1925	
三侠五义	俞平伯标点	1925	
儿女英雄传	汪原放标点	1925	
老残游记	汪原放标点	1925	
音乐的常识	丰子恺著	1925	
市政制度	张慰慈著	1925	
人类的性生活	程浩著	1925	
节制生育问题	程浩著	1925	
白话书信二集	高语罕著	1926	
应用新闻学	任白涛著	1926	
少年漂泊者（长篇小说）	蒋光赤著	1926	
小雪（长篇小说）	超超著	1926	
致死者（小说）	张维祺著	1926	
恋爱心理学研究	斯丹大尔著，任白涛、朱维之合译	1926	
国文故事选读	陶孟和辑	1926	
教育的理法问题	苏儒善著	1926	
海上花	汪原放标点	1926	
短裤党（长篇小说）	蒋光赤著	1926	
进化论讲话	丘浅次郎著，刘文典译	1927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长篇小说)	汪静之著	1927	
鸭绿江上(短篇小说)	蒋光赤著	1927	
纪念碑(书信)	蒋光慈、宋若瑜合著	1927	
近代恋爱各论	任白涛辑译	1927	
官场现形记	汪协如标点	1927	
妇女运动概论	杨之华著	1927	
通俗资本论	李季译	1927	
现代的公民	高语罕著	1927	
冲出云围的月亮(长篇小说)	蒋光慈著	1927	
上古的人	房龙著,任冬译	1928	
给志在文艺者	任白涛辑译	1928	
中国文学杂论	杨鸿烈著	1928	
牺牲者(短篇小说)	戈鲁阳著	1928	
中国教育改造	陶知行著	1928	
失踪(长篇小说)	杨邨人著	1928	
三民主义	汪协如标点	1928	
流离(小说)	寒星著	1928	
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	胡宣明著	1928	
仆人(短篇小说)	汪原放译	1928	
宋人话本七种	汪乃刚标点	1928	
义冢(短篇小说)	钱杏邨著	1928	
转变(长篇小说)	洪灵菲著	1928	
世界短篇小说集	鲁彦选译	1928	
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	魏兰女士译	1928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优生学与婚姻	威廉鲁滨生著, 高方译	1928	
世界科学新谭	孟寿椿编述	1928	
最后的微笑(长篇小说)	蒋光慈著	1928	
丽莎的哀悲(怨)(长篇小说)	蒋光慈著	1928	
前夜(长篇小说)	戴万叶著	1929	
明朝(长篇小说)	林曼青著	1929	
伊所伯的寓言	汪原放译	1929	
欧洲近二百年名人情书续集	魏兰女士译	1929	
知行书信	陶知行著	1929	
语体应用文作法	钱杏邨著	1929	
水晶座(新诗)	钱君匋著	1929	
孤坟(短篇小说)	志行著	1929	
现代情书 1、2、3	高语罕著	1929	
雨点集(散文)	田言著	1929	
苦海(小说)	先罗什伐斯基著, 鲁彦译	1929	
大黑狼的故事	谷万川编	1929	
爱的分野(长篇小说)	罗曼诺夫著, 蒋光慈、陈情合译	1929	
社会经济发展史	莱姆斯著, 李季译	1929	
宋玉	陆侃如编	1929	
语体应用文范本	钱杏邨编	1929	
波斯传说	章铁民译	1929	
都市之夜(短篇小说)	平万著	1929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法国革命史	威廉布洛斯著, 李季译	1929	正文作孙望涛译
农家的草紫(新诗)	何植三著	1929	
产业革命	毕尔德著, 王雪华译	1929	
康德的辨(辩)证法	戴博林著, 高语罕译	1929	
斐斯特的辨(辩)证法	戴博林著, 高语罕译	1929	
社会农业及其根本思想与工作方法	〔俄〕恰耶诺夫著, 李季译	1929	
一千〇一夜	汪原放译	1930	
新文学概论	〔日〕本间久雄著, 汪馥泉译	1930	
两部失恋的故事(中篇小说)	林曼青著	1930	
两朋友(中篇小说)	屠格涅夫著, 刘大杰译	1930	
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	丰子恺著	1930	
神会和尚遗集	胡适辑	1930	
两个女性(中篇小说)	华汉著	1930	
紫洞艇(短篇小说)	祝秀侠著	1930	
辨(辩)证法经典	高语罕编译	1930	
印度七十四故事	〔印度〕昇喀编, 汪原放译	1930	
理论与实践	高语罕著	1930	
胡适文存三集	胡适著	1930	
我的童年	高尔基著, 林曼青译	1930	
胡适文选	胡适自选	1930	
模范文选	程演生编注	1931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柴霍夫书信集	程万孚译	1931	
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	丰子恺著	1931	
西藏的故事	[英]谢尔顿著, 程万孚译	1931	
文木山房集	吴敬梓著	1931	
忏悔	波加奇次著, 鲁彦译	1931	
童年的悲哀(短篇小说)	鲁彦著	1931	
够了及其他(中篇小说)	屠格涅夫著, 效洵译	1931	
红叶童话集	一叶编	1931	
国文评选第一集	高语罕编	1931	
马可波罗游记	李季译	1931	
国文评选第二、三集	高语罕编	1932	
我的生平	李季著	1932	
妇女自然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德]海尔博著, 李季译	1932	
史的唯物论之伦理哲学	刘剑横著	1932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刘剑横著	1932	
唯物的宗教观	刘剑横著	1932	
唐代底劳动文艺	孙良工编	1932	
醒世姻缘传	汪乃刚标点	1932	
曾文正公家书	周道谋标点	1932	
欧洲近百年革命运动史	江常师译	1932	
肖像(中篇小说)	郭果尔著, 鲁彦译	1933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俄罗斯的文学	平万编	1933	
求真者(小说)	辛克莱著,平万译	1933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蔡雪村著	1933	
百花亭畔(散文)	高语罕著	1933	
短篇小说第二集	胡适译	1933	
四十自述	胡适著	1933	
六裁判	汪原放译	1933	
达尔文传及其学说	〔德〕海尔博著,李季译	1933	
书信选辑	严约编	1933	
不如归(长篇小说)	〔日〕德富芦花著,林雪清译	1933	
现代文明史	〔法〕薛纽伯著,王慧琴译	1933	
今古奇观	汪乃刚标点	1933	
青年女子书信	高语罕著	1934	
荒唐游记(长篇小说)	〔俄〕沈都夫著,绮纹译	1934	
俄罗斯名著二集(小说)	郭歌里著,李秉之译	1934	
辨(辩)证法的唯物论	伏尔佛逊著,林超真译	1934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著,林超真译	1934	
实验蚕卵稀盐酸人工孵化法	中井五二著,汪协如译	1934	
美俄复交之观察	王庭珊、翟宗文、黄大中、李执中合著	1934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军缩会议之史的检讨	周咸堂著	1934	以下十几种 在日寇侵 入租界时 自行毁 去。出版 年月不详。 有的书似 是1937年 抗战后出 版的。
国际政治之危机	杨玉清著	1934	
小英雄(小说)	朵斯退也夫斯基著, 绮纹译	1934	
教师生活速写	戴自俺著	1934	
西桥小孩(?)创造记	西桥工学团编	1934	
申报读者顾问集	高语罕著	1935	
作文与人生	高语罕著	1935	
王独清诗歌代表作	王独清著	1936	
从苏联归来	纪德著,林伊文译	1936	
阿比西利亚与意太 义(?)	何伟译	1936	
烽火归来	高语罕著	1936	
崔东壁遗书	顾颉刚编订	1936	
民族野心	陈独秀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	陈独秀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陈独秀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 抗战前途	陈独秀		
中日战争论集	曾恭		
中日战争论集续集	曾恭		
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	陈碧云		
铁蹄下的故乡			
泛滥华北的游击潮	王耀晨		
国际政论家之论文			
战时良好读物	曾恭		
抗战的理论与实践	谷华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战地随笔	王耀晨		未出版
显微镜下的日本	刘海生		
抗日战争之意义			
几行血泪	高语罕		
道德与辩证法	李书勋		
国难教育面面观	胡立民、邢舜田合编	1937	
从军回忆录	胡立民著	1937	
中国思想界的奥伏赫变	王灵皋著	1937	
人类在自然界的特别位置	夫里登达著，李季译	1937	
从唯心论到唯物论	蒲列汉诺夫著，王凡西译	1937	
辨(辩)证法易解	〔苏〕郭列夫著，西流译	1937	影印八幅
劳动价值说易解	马克思著，西流译	1937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著，郭和译	1937	
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	杜威等编，李书勋译	1937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纪德著，林伊文译	1937	
苏联党狱之真相	张家驹编译	1937	
真理在前进中（托案报告与讲演词）	杜威著，江维亮译	1937	
现代妇女问题丛谈	陈碧云著	1937	
日本能否独霸远东	许庸译	1937	
中国经济情势		1937	
南宋胡处海上元行	陈独秀书	1938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 九一八后 俄罗斯革命逸史 英日之对立	托洛茨基著, 许庸译	1938	未出版 寄存
顾颉刚通俗论著集	顾颉刚著	1938	
和平与国联	谭辅之著	1939	
日本企业与太平洋		1939	
太平洋的争霸战		1939	
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 途	陈清晨	1940	
海南岛与太平洋	陈清晨	1940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凤冈	1940	
美国操纵的世界大战	刘少严	1940	
大英帝国的两块基石	刘少严	1940	
奥国是怎样失败的	欧伯	1940	
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 势前途	欧伯	1940	
论世界大战	刘少严	1940	
恩格斯评传	李书勋译	1940	
儿子·战士·朋友	托洛茨基著, 李书 勋译	1940	
实庵自传	陈独秀著	1940	
恩格斯等论文学	赵季芳编译	1940	
马克思给顾格尔曼的 信	林超真译	1948	
十二楼	汪协如标点	1948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	林超真译	1949	
诗经今译(第一册)	汪原放编译	1951	

续 表

书 名	著、译、编或标点者	出版年份	备 注
我的旅伴(短篇小说)	高尔基著,汪原放译	1952	
流浪人契尔卡士(短篇小说)	高尔基著,汪原放译	1952	

亚东图书馆同人名录^①

芜湖科学图书社申庄时期:

经理: 汪孟邹

张衡山 章式如 程宝书 鲍惠卿

上海亚东图书馆时期:

经理: 汪孟邹

许潜如	°汪原放	章洛声	胡鉴初	°胡竹林	程本海
章洪澍	吕可侯	胡铁岩	汪福社	刘广植	周观清
胡邦彦	°葛湘三	周孟余	周亚伊	舒祥照	章友贤
汪焕如	°章希吕	°余昌之	°周道谋	°程健行	°章舍予
°周肃侯	°周育和	°周竹庵	°汪乃刚	°汪协如	°程敷铎
°章 燧	陈啸青	程世杰	章馨如	°章近江	周懋宾
°章志金	°章焕堂	°吴嗣民	胡国芳	章致治	程敷信
°汪菊农	汪培根	胡振武			

(以上姓名前有“°”的是在编辑所工作的, 其他都是在发行所工作的。)

① 这份同人名录为作者 1961 年所编。

1919 年至 1935 年亚东图书馆收支情况

(单位: 厘)

年 度	收 入	支 出
1919	12,943,001 (内批发7,525,858;余为零售,下同。)	4,425,689
1920	36,069,711 (内批发26,602,152)	6,883,267
1921	40,902,016 (内批发28,740,303)	10,423,342
1922	67,524,440 (内批发48,497,908)	13,044,784
1923	68,045,942 (内批发50,045,176)	18,163,045
1924	65,011,042 (内批发47,785,986)	22,166,887
1925	64,596,632	27,239,620
1926	70,676,920	25,686,917
1927	76,279,934 (内批发59,876,996)	28,770,628
1928	79,690,017 (内批发51,704,525)	33,546,792
1929	70,388,245	34,920,040

续 表

年 度	收 入	支 出
1930	70,837,071	29,631,494
1931	67,233,598	29,898,988
1932	39,330,390	29,056,444
1933	44,945,088 (内批发22,159,952)	31,513,484
1934	18,808,693 (内批发15,542,091)	23,155,527
1935	10,642,118 (内批发6,060,844)	13,240,674

1934 年亚东图书馆国内外代售处一览

辽宁省:

沈阳: 大东书局、世界书局、新中国书局、德和昶书局、东北书社。

安东: 宏文书局、文华东书局。

营口: 东北书局。

大连: 青年书局、聚胜堂书局、启明书局。

吉林省:

吉林: 万顺魁、大同书局、成文厚书局、德和义书局。

长春: 德和生书局、同文书局、中华书局。

榆林: 洪盛源书局。

双城: 精益印书局。

三姓: 三民教育社。

哈尔滨: 新大号书局、同发隆、新华印书馆、大东书局。

河北省:

北平: 佩文斋书庄、大东书局、北新书局、自强斋书局、蜜丝书店、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景山书社。

天津: 直隶书局、佩文斋书局、紫房小商店、南洋书店。

保定: 群玉山房、直隶书局。

邢台: 中华书局。

正定: 中华书局。

张家口: 中华书局。

阜城: 益生祥书局。

山东省:

济南: 东方书社、山东书局、教育书社、新鲁书社、子云堂分店。

临清: 艺林堂书局、益文书局、汶卫书店。

青岛：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荒岛书店。

烟台：福裕东书局、大华书局。

寿光：东鲁书局。

东昌：国华书店、振东书局、摄西书局。

沭阳：鼎仁书局。

菏泽：六中商店。

青州：益新书社。

惠民：砺学商店、岱北学用合作社。

牟平：申报分销处。

单县：中山商店。

莱阳：昌阳书局。

泰安：新华书局、大陆书局。

济宁：日新书局。

滕县：协华书局。

黄县：子美书局。

河南省：

开封：龙文书庄、文会山房、豫郁文书庄、文化书社、百城书局、豫文书局、北新书局。

郑州：世界书局、龙文书庄。

西平：崇文书社。

陕州：聚盛印书庄。

平陵：庆余商店。

洛阳：文林书社、世界书局。

广武：同文阁书局。

汲县：世界书局。

密县：教育用品社。

内乡：中山图书馆。

新乡：修文印刷所、平民书社。

山西省：

太原：晋新书社、同仁书店、范华公司、觉民书报社、兴业书店。

运城：新民书局、振兴东书局。

夏县尉郭镇：平民书社。

平阳：晋兴书社。

归绥：明善堂书店。

陕西省：

西安：大东书局、通泰书局、华西书局、久达长书局、树德堂、翊华书局、德厚祥书局、义兴堂、中华书局、三民书局、大公报馆。

三原：通化书局、敬文书局。

汉中：益智图书公司。

安康：新民书报社。

甘肃省：

兰州：三兴成、时顺通书局、树德堂、新兴成书局、天兴成书局、甘肃书报社、未名书社。

青海：大兴成书局。

狄道：芝义恒。

榆中：仁义元书局。

临洮：芝义恒、兴文书局。

江苏省：

南京：共和书局、南洋图书局、中国图书局、南京书店、天一书局、大中书局、建国书店、益新书社、萃文书局、燕子书社、中南书店、中央书局。

苏州：文怡福记书局、小说林书社。

无锡：文华书局、大同书局、乐群书局、无锡书局。

南通：三友书社、兴中教育用品社、翰墨林书庄。

江阴：新澄商店。

徐州：民治书局、大东书局、普育书局。

淮安：警钟图书馆。

清江浦：弘道书局、淮北书局。

如皋拊茶市：友益商店。

松江：醒醒书局、松江书店。

泰县：怀德堂书局。

常州：文化书局、世界书局。

镇江：东华书局。

浙江省：

杭州：问经堂书局、苍山书店门市部、星星书局、青布出版社、开明书店、大东书局。

严州：元丰泰书纸庄、教育图书社。

金华：潘记书庄、新民书馆。

衢州：聚奎馆书庄、聚秀堂书庄、慎言堂书庄。

寿昌：松山图书馆。

宁波：新学会社、文明学社、汲绶斋书庄、明星书局、振新书局。

温州：中华书局。

富阳：时新图书馆。

湖州：有正书局、五洲书局。

江山：星星书局。

海门：文化书局、台州书店。

泽国镇：文林书社。

永康：姚振泰号。

余姚：普光明书局。

缙云：王富春书局。

嘉兴：嘉华书局。

绍兴：墨润堂书局。

龙游溪口：虎啸图书贬卖部。

新昌：三益书局。

安徽省：

安庆：大德堂书局、世界书局、景文书局、中华书局。

颍州：吴天成书局。

涡阳：庆祥书局。
蚌埠：宏益书局。
芜湖：科学图书社。
屯溪：科学书馆。
休宁：松山书社。

江西省：

南昌：点石斋书庄、扫叶山房。
抚州：商务分销处。
饶州：吴太极图书局。
玉山：文锦堂。
广信：益智书局。
赣州：普益书局。

福建省：

福州：世界书局、文明书纸仪器馆、宏文阁书庄、左海书局、大西山房。
厦门：开明书店、博文斋、新民书社、生活书店、现代书局。
永春：日新图书馆。
建瓯小梨山：新建书局。
莆田：人生商店。
泉州：泉山书社。
诏安：宜宜书局。
平和小溪：秋友书店。
云霄：亚东书局。
仙游：清源书社。

湖北省：

汉口：开明书局、鸿文书店、现代书局、大东书局、真美善书局。
武昌：太平洋书店、民智书局、文华书局、新生命书局、文化书局。
樊城：明星书社。
宜昌：晏文盛书局。

湖南省:

长沙: 开明书店、长沙图书局、锦章图书局、民智书局。

常德: 文华书局、商务特约所。

衡阳: 宝华堂书局。

宝庆: 中华书局特约发行所。

辰州: 启智书局。

四川省:

成都: 星星书店、益民文化社、普益文化部、求知书社、北新书局、震东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合记文具社、华阳书报流通处。

重庆: 振亚书局、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惟一书局、朋友书店、重庆书店、平民书店。

万县: 启万教育馆、中华书局。

遂宁: 文益书局。

合州: 新华书社。

合川: 义成书局。

绥定: 教育用品消费社。

广安: 安庆书局、民众书局。

绵阳: 偷(?)文书社。

中坝: 晨光书社。

开江: 启文图书社、文华书社。

达县: 通川书社、协记同茂书局。

犍为: 合记大道书局。

荣县: 旭川书局。

威远: 中华文化导扬社。

顺庆: 海清楼记、和记书庄。

仁寿: 艳阳书局。

自流井: 釜溪书局、新世界书局、新川书局。

保宁: 福记书局、醉新书局。

涪陵: 肇记书局。

竹根滩：樵文明书社。

忠县：己巳书店。

潼川：文益书局。

广东省：

广州：共和书局、大东书局、光东书局、开明书局、民智书局、会文堂书局、现代书局、环球书局。

汕头：中华书局、文明商务书局、东南书局、大东书局。

梅县：明星书局、环球书局、启新书局、中华书局。

台山：西华印书馆。

兴宁：兴宁书店、启新分局、新民书局、集福展书局、中央书店。

松口：蔚华书店。

海口：海南书局、文教书局、会文书局。

文昌：富文书局。

合浦：晨光社。

灵山：灵强书局。

贝岭：庆安号。

蕉岭：万瑞祥书局、新华书局。

嘉积：琼文楼书局。

濠州：青年书店。

广西省：

南宁：大夏书局、三管庆书馆、强华书局、岭南书店。

桂林：商务图书馆、典雅公司、桂海书局。

平乐：商务印书馆经理处。

梧州：文渊书局。

桂平：华泉书局。

云南省：

昆明：宝训书局、广益书报社、文化书局、东方书店。

丽江：云集书局。

石屏：文元书局。

宁远：光霁书庄、光桃源书店、小桃源书店。

大理：明德书庄。

蒙自：维新物品社、和平书店。

昭通：文运书庄。

贵州省：

贵阳：新文书店、北新书局、文运书局图书部。

安顺：万和书药局。

黄草坝：文萃轩。

台湾：

台北市：文化书局。

台中市：中央书局。

台南市：魁文斋书局。

屏东街：复源商店、黎明书局。

东京：汇文堂书店、文求堂书店。

堤岸：美群印务局。

曼谷：世界书局。

吉隆坡：化南书局。

新加坡：中国书局、星洲书局、中华商店、中华书局。

八打威亚：华英书局、大成书局。

马尼刺：前进书局。

仰光：南洋书局。

纽约：共和药房图书部。

汪原放先生传略

汪原放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曾用名家瑾、麟书，笔名有白石、士敏、严约、方泉等。1897年6月生，安徽绩溪人。

他五岁丧父，少年时代只读了七年书，十三岁就进了叔父汪孟邹创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刻苦自学，特别爱看邹容著的《革命军》和《苏报》等书报。1913年他到上海参加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到夜校读英文。他努力学习，知识不断丰富，后来任亚东图书馆编译。从1913年起，他长期在“亚东”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1936年后，专心于个人译著，基本上不过问“亚东”的出书和店务。

汪原放先生青年时代追求光明，要求进步。1925年前他受《新青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杂志影响很大，又与共产党人陈乔年关系非常密切。1925年在上海由陈乔年、郭伯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1927年春，他在汉口中共主持和经办的《民国日报》任国际编辑，后任经理。不久，又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当时直属有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是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9月，他回到上海仍任亚东图书馆编译，从此与党失去关系。1928年6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乔年同志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前，他和叔父曾设法营救。解放后他路过陈乔年烈士就义处，情不自禁赋诗悼念，诗云：“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

汪原放先生有志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对中国古典小说用新式标点并进行分段的整理工作者，早在1920年就出了《水浒传》的标点本，以后陆续标点出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十多种名著。他还进行了

中国古代诗文的今译工作,出版过《诗经今译》第一册。同时,他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以及《伊所伯的寓言》(即《伊索寓言》)、《一千〇一夜》、《鲁滨逊漂流记》等外国小说、寓言、故事。

解放后,他继续在亚东图书馆从事编译工作,直到1953年该馆奉命歇业为止。1956年1月,到新文艺出版社工作,任编辑。同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委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之后先后调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1963年退休。他工作一贯积极,还把珍藏的中国小说研究资料《龙图耳录》手抄本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此稿在“文化大革命”后已成海内孤本,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书。直到晚年还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分段、标点了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1980年4月1日,汪原放先生因肺癌病逝于上海,终年八十三岁。

汪原放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勤奋好学。大革命时,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从青年时期起,直到晚年,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汪原放先生写的“传略”和“悼词”整理)

附:汪原放标点、翻译、编著的书目

(一) 已出版的

1. 标点本:《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老残游记》、《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海上花》。

参加标点的:《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七种》、《今古奇观》、《醒世姻缘传》、《十二楼》、《缀白裘》(中华书局)。

2. 翻译本:《伊所伯的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仆人》、《六裁判》、《一千〇一夜》、《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事业与成功》(生活书店)、《鲁滨逊漂流记》(建文书店)。

3. 编辑本:《书信选辑》、《诗经今译》第一册。

以上除注明者外,均为亚东图书馆出版。

(二) 未出版的

1. 标点本:《西游补》、《娱目醒心篇》、《醉醒石》、《西厢记》、《杂剧西游记》、《三宝太监下西洋记》、《西湖拾遗》、《元曲选》(100套)、《封神》。

2. 翻译本:法国莫泊三著《哲丽的一生》、《爱情及其它》,英国狄根司著《圣诞颂》,美国《五十轶事重述》、《三十轶事重述》,法国味伦著《海底旅行》,法国左拉著《繁殖》,美国短篇小说十几种,苏联高尔基著《二十六个男子和一个姑娘》、《在一张木排上》、《“一个秋夜”和“她的情人”》、《我的童年》、《母亲》,俄国果戈理著《外套》,《大发明的故事》,丹麦安徒生著《小美人鱼》,俄国托尔斯太著《人要多少地?》、《人靠什么过活?》、《两个老人》,俄国科洛连珂著《几个鬼魂》,俄国安特列夫著《瞎子拉撒路》,美国司各脱·尼尔宁著《中国的革命》。

3. 编辑本:《诗经今读并译》,《诗经今译》第二至四册。

编 后 记

读完这部关于亚东图书馆的回忆，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觉得：它不仅颇有价值，而且读来饶有兴味。

这是汪原放先生的一部遗稿，写于一九五三年，修改补充于一九六五年。随即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它当然没有问世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不久，汪原放先生不幸于一九八〇年与世长辞。我们谨以出版这部遗稿，作为对他的一个纪念。

在作者去世以后，按理说，旁人是不好改动他的稿子的。但是，汪原放先生的原稿长达一百多万字。同很有史料价值的材料交错在一起的，有他的家庭成员的种种情况（从他的祖父、父辈到他的子女），有不少生活琐事，有大量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的材料，等等。而且，稿件可能没有来得及进行仔细的整理，前后重复的，不能连贯的，分散零乱的，等等，可以说所在多有；自相抵牾的情况，个别的也是有的。这样，不但失之于冗长，而且有价值的材料反倒不突出了。我们越俎代庖，进行较大的压缩和必要的整理，是从怎样使这部稿子里的珍贵资料得以公诸于世出发的，实在也是事非得已。

这部回忆的主干是亚东图书馆的出版活动。我们整理的

原则是保留主干，删削枝蔓。有关“亚东”出书的情况，一些书刊的来龙去脉，部分书刊的广告、版次、印数，某些书刊被国民党政府所查禁等，都保留详细的介绍。陈独秀、胡适等人同“亚东”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活动，尽量反映得比较充分；有些事虽与“亚东”出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有资料价值的，也适当保留。作为“亚东”前身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的经过，以及陈独秀早年在那里办《安徽俗话报》的情况，按汪原放当年的耳闻，作专门的介绍。大革命高潮中，汪原放在武汉的几个月工作和见闻，虽与“亚东”无直接关系，但内容较重要，而且也属于出版史的一部分，故仍专列为一章。“亚东”后期大量出版托派书籍，造成恶劣影响，解放后因此而由军管会决定令其歇业。因为一九三六年后汪原放先生基本上不过问“亚东”的出书，所以他的原稿中关于这方面材料甚少，我们在整理中当然也就只能作很概略的叙述。

在整理中，我们力求保持汪原放先生原作的风貌。能够整段摘抄的，大都照抄原文。需要适当压缩的，也尽量保持原语句。除一些前后衔接的文字外，凡属实质性的内容，都是依据原作的；语句，也绝大部分是原话。作者在文中表露的观点和感情，以至对人的称谓，也保持原貌。为了帮助理解，我们加了若干注释。个别经过校核，发现原作与事实有出入的，在注释中作了说明。因为涉及的事很多，为各方面条件所限，我们的校订工作做得是不完备的。这只能请熟悉情况的同志给予指正。

对汪原放先生的这部稿子，原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一些同志，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任关华同志、杨天南同志，还有任建树同志、徐华国同志，曾经提出过审阅意见，摘录或复

印过若干材料。这对于我们了解这部稿件和进行整理工作，是有帮助的。其他有关方面的同志，也曾在提供资料、订正事实等方面给予协助。谨在这里一并致以谢意。

整理完成后，又蒙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同志撰写序言，并提供一九二八年亚东编辑所同人的珍贵照片，更是我们深深感谢的。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0329437